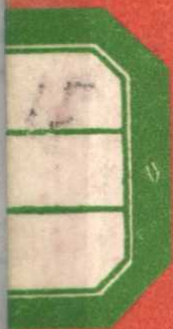


拉科西在  
法西斯法庭面前

世界知識社





# 拉科西在法西斯法庭面前

匈牙利工人運動學院編  
凌其翰、徐公肅、劉保安譯



*6716/109*

*04*

世界知識社  
一九五五年·北京

## 目 錄

序言(拉斯洛·雷蒂).....	1
拉科西被捕記(蘇爾坦·華斯).....	9
拉科西在特別法庭受審(蘇爾坦·華斯).....	13
拉科西使用他的最後發言權(一九二五年十一月十 五日).....	15
國際團結獲得了勝利(蘇爾坦·華斯).....	19
關於禁止旁聽的官方理由.....	21
拉科西的審訊記錄(一九二六年七月十二日及十三日).....	23
拉科西的最後發言(一九二六年七月二十一日).....	35
獄中書信(一九二七年——一九三四年).....	50
獄中生活(蘇爾坦·華斯).....	57
人民委員拉科西的訴訟案(一九三五年一月二十一日 至二月九日).....	64
拉科西的審訊記錄(一九三五年一月二十一日).....	67
被告有最後發言權(一九三五年二月七日及八日).....	100
拉科西的聲明(一九三五年六月二十七日).....	159
蘇聯使拉科西獲得了自由：我重新晤見拉科西 (蘇爾坦·華斯).....	191
拉科西恢復了自由(愛爾諾·芮洛).....	194

## 序 言

拉斯洛·雷蒂

匈牙利人民的領袖和導師拉科西，在向反革命政權進行不斷鬥爭的過程中，從一九二五年九月二十二日到一九四〇年十月三十日，曾落到階級敵人的手裏。在這本書中，我們將用當時的文件來向讀者重述這時期的事變經過，說明拉科西終於獲得恢復自由的這段光榮鬥爭的歷史。

依照法律的觀點，拉科西案可區別為兩個訴訟案。第一次訴訟案於一九二五年在特別法庭面前進行，繼而於一九二六年和一九二七年在所謂“普通”法庭面前進行。在第一次訴訟案中，控告的罪名是“危害國家社會秩序的顛覆活動”，也就是說，創立共產黨組織的活動。第二次訴訟案是於一九三五年在“王家重刑法院”和上訴法院面前進行的。在這次訴訟案中，英雄的公社人民委員拉科西須就他在匈牙利蘇維埃共和國時期的活動作答。實際上，只有一個訴訟案，即壓迫的剝削階級追控勞動人民和它的不可戰勝的領導——共產黨的訴訟案。拉科西之所以遭受迫害，實因反革命所切齒痛恨而欲粉碎的對象就是匈牙利工人階級美好將來和勞動人民解放所寄託的希望和保證——共產黨。如果僅從霍爾第一貝特蘭政權的頭子們的狂慾和貪婪而言，馬加斯·拉科西早就必死無疑。這從以下兩點很顯明地看得出來：一九二五年時，人們急急忙忙地把他解到特別



法庭面前，連絞刑架都已經準備好了；在第一次殺害他的企圖失敗以後約十年，人們又一次頑固地把他解到法庭，使他再度受到死亡的威脅。這個反人民的剝削政權對工人階級又恨又怕，落在它的魔爪中的敵人既然在表面上已動彈不得，它自必用盡一切方法，務須把他置之死地而後已。但進行罪惡單靠政權是不夠的。這班先生們滿以為可以自由處置馬加斯·拉科西的生命，他們的打算是大錯而特錯了。原來，在訴訟案進行着的時候，他們發現了為他們所忘記估計進去的兩種不可克服的力量依舊存在着，任何牢獄、絞索，任何反革命的壓迫機構，任何血腥陰謀都無法克服這兩種力量，而每當馬加斯·拉科西的生命岌岌可危的時候，這兩種力量總是把他從劊子手的魔爪中搶救出來；這兩種力量是：他自己的不可戰勝的勇氣和工人階級的國際團結。這本書的目的就在描繪一個具有共產主義深刻信仰的人物的不可克服的勇氣和全世界工人可敬的團結的史詩。

馬加斯·拉科西於匈牙利蘇維埃共和國被推翻以後，曾在國際工人革命運動的參謀部——共產國際——內部工作了四年。在這期間，他是列寧和斯大林的直接助手。一九二四年，他重返匈牙利去領導在秘密活動而受到迫害的共產黨的組織工作。他知道反革命政權正千方百計，務必得之而甘心。他也知道，如果他遭受逮捕，他決不存敵人會對他寬大的僥倖心。但他也知道，如果匈牙利工人階級爭取解放並擺脫反革命的血腥桎梏，則必須有一個堅強的和富有戰鬥性的共產黨。拉科西就是為了組織這樣的黨而重返匈牙利的。

在那時候，匈牙利反革命政權已經度過了最初幾年所

顯現的“激烈”階段。大地主和工業巨頭爲了要平平穩穩地對工人進行剝削，就需要秩序和安寧。反動政權依靠了右派社會民主黨人的幫助，不惜犧牲工人來挽救嚴重地遭受了戰爭損失並受到革命影響的經濟。他們藉英美借款來穩定匈牙利的貨幣。他們用極高的捐稅和極低的工資的方法，把清償的負擔和支付債務的利息都壓在工人階級和勞動農民的肩上。反動政權依靠了反革命的朋友——教會和已經有人滿之患的牢獄，依靠了警察的警戒部隊和右派社會民主黨，好像可以鞏固和持久了。然而火始終掩蓋在灰底下，沒有熄滅，工人階級的憤怒不斷地增長着。雖則政府和社會民主黨所締結的秘密協定——臭名卓著的“協定”——還沒有被人知道，羣衆對於完全被資產階級所收買的政客，如貝耶和王薩克之流，所表示的不信任情緒正在增長着。唯一的缺點是：還缺乏一種能引導這些自發的憤怒走向正確的方向並同時加以組織的、徹底的和革命的領導力量。但由於匈牙利蘇維埃共和國失敗後所連續受到的嚴重損失，由於秘密活動遭受着殘酷無情的鎮壓，共產黨還不可能重整旗鼓並足以再度達成決定因素的程度。

馬加斯·拉科西的返國和他所進行的將近一年的工作帶來了激烈的改變。由於他的活動，黨的地下機構得以組織起來並獲得了擴展。黨在首次大會中重建起來的、由共產黨領導的一個合法的革命工人黨——匈牙利社會主義工黨——成立了。在工人運動內部，社會民主黨賊禿們的專橫勢力消失了，嚴重的危險正威脅着反革命周圍的秩序和安靜氣氛。因此，當馬加斯·拉科西被奸細所出賣、落到統治階級手中的時候，統治階級懷着憤恨和惶恐交加的情緒，企圖用一切方法，以期在最短時間內消滅他的生命，這是可

以理解的。

於是拉科西一生中不朽的鬥爭開始了。他以堅忍不拔的毅力，英勇地戰鬥着。他發揮着百倍的戰鬥力，因為他知道他從來沒有片刻為個人而只是為服務於他的事業而鬥爭的，由於他對事業的忠誠，他落到了敵人的手中；他所以能發揮戰鬥力，因為他看到全世界革命的工人階級以及一切進步思想的人士都站在他的一邊。另一方面，各國進步人士和共產黨都為營救馬加斯·拉科西而起來鬥爭，尤其是由於他令人肅然起敬的氣概，他已成為一切進步和革命的象徵，值得為之生活和鬥爭的理想的象徵，任何誠實的工人都應該無條件地為這理想的實現而鬥爭的象徵，從而他們的鬥爭就更堅決了。

馬加斯·拉科西以秘密工作創立了牢不可破的匈牙利共產主義運動。由於他在被囚中所進行的鬥爭，由於他的令人肅然起敬的態度，他不僅成為匈牙利革命運動的英勇旗幟，而且成為國際運動的英勇旗幟。這就說明為什麼在莫斯科、巴黎、柏林、北京以及世界各地，凡是誠實的人們，無論是共產黨人或非共產黨人，都提出抗議並舉起狠狠的拳頭，為拉科西辯護，直到染着赤血的兇獸終於敗退才罷休。反革命政權咬緊了牙關才勉強開始這個退却的。反革命政權所聊以自慰的，是想用監禁的辦法就可扼殺匈牙利人民事業的最優秀的旗手。

當一九三四——一九三五年，第二次拉科西訴訟案開始的時候，情況發生了基本的變化。在德國，法西斯已奪取了政權，而在全歐洲，工人革命運動正實行退却。匈牙利的統治階級帶着狂歡的心情來適應新的情況：它們對於勞動

人民毫不間歇地加強經濟和政治的壓迫。人們幾乎可以這樣說：在反革命政權看來，第二次拉科西訴訟案來得恰到好處，因為它可藉着這個機會把匈牙利蘇維埃共和國、共產黨、革命運動以及一般說來在這國家裏起來反對人民的壓迫者——法西斯政權——的一切人們都拖到被告席上。

反動當局以為國際輿論既沒有時間來管拉科西事件，而馬加斯·拉科西遭受了十年牢獄痛苦的折磨，定將毫無反抗地屈服於法西斯的“司法”。在這裏，當局又估計錯了。全世界的勞動人民並沒有忘記拉科西，而他的不屈不撓的態度鼓舞着所有一切起來抗拒法西斯企圖浸沒世界的濁流的人們，鼓舞着他們加強鬥爭。馬加斯·拉科西的名字正像一年以前季米特洛夫的名字一樣，已成為國際反法西斯鬥爭的團結的象徵和標誌。人們看到一九二五年的事變經過又重演了一番：反革命政權既不敢觸犯反法西斯世界的憤慨輿論，不得不再度在偉大的國際攻勢面前，實行退却。它又一次企圖藉囚禁苦役的辦法來完成殺害拉科西的任務。季米特洛夫說道：

“向仇恨工人階級的布達佩斯的劊子手們指出：掌握拉科西的生命和自由的，不是他們而是國際無產階級啊！”

的確，在拉科西訴訟案所經歷的十五年間，全世界的勞動人民毫不間斷地提供的證據，就說明了工人的死敵，反革命法西斯的劊子手們，不能自由處置馬加斯·拉科西的生命。無產階級的國際團結從劊子手的手裏搶下了絞索。

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和其可敬佩的布爾什維克黨，在營救拉科西生命和爭取恢復拉科西自由的偉大的國際戰鬥中，始終站在最前列。當他的生命直接受到威脅的



時候，無論在一九二五——一九二六年或在一九三四——一九三五年，進行鬥爭最頑強的就是蘇聯人民。蘇維埃勞動人民在數以千計的城市和鄉村裏，組織了抗議的示威運動。他們募集了辯護的基金並選舉了拉科西為無數團體和地方蘇維埃的名譽委員。蘇聯的報紙，特別是“真理報”和“消息報”，幾乎每天都登載訴訟案進行的記錄。而尤其是由於斯大林的動議，蘇聯政府藉直接交涉的途徑，用全力來營救拉科西，以期從匈牙利法西斯野獸的魔爪中把他解放出來。蘇聯政府除了盡到一切努力以外，還在一九二五年和一九三四年發動了談判，不惜重大犧牲以營救拉科西。然而，無論提供給匈牙利的經濟利益或是兩個鄰國間改善邦交的建議，都未能使匈牙利的反革命政府決定從監獄中釋放這個法西斯所最害怕、同時也最憎恨的敵手。布爾什維克黨和蘇聯政府始終不放棄這個鬥爭。當一九四〇年在國際關係上出現了新的情況，蘇聯和匈牙利之間有了某種暫時接近的時候，蘇聯政府又試圖營救拉科西。這一次，激烈的鬥爭獲得了勝利：一九四〇年十月三十日，拉科西獲得釋放並能前往蘇聯的自由領土。斯大林把匈牙利工人階級最優秀的兒子、最偉大的戰士還給了匈牙利的工人階級。馬加斯·拉科西又能再度貢獻他的生命，為了匈牙利勞動人民的解放而領導鬥爭。

以“拉科西訴訟案”為名的一本書早於一九三五年出版了。但那本書和本書之間沒有什麼關係。在一九三五年的版本裏，為了能夠刊印拉科西在公審庭上所發表的演說（原文並且經過了改動），人們不得不假意把關於辯護的法律過程和檢察官的侮辱也編印在內。該書只刊載了三個演說。

該書出第二版時，人們把上訴法院的辯論材料補充進去。那本小冊子不可能把關於一九二五——一九二七年訴訟案、獄中生活、訴訟案的影響和國際意義、尤其是蘇聯營救拉科西的鬥爭各方面給讀者以一個清楚的概念。

本書把長期研究和調查工作的成果提供給讀者。但我們還遠不敢肯定說本書已經完備。我們知道有很多與拉科西訴訟案有關的文件還沒有被發現。例如，我們還沒有獲得一九二五——一九二六年辯論的記錄。根據我們所得到的線索，當最高法院受理一九三五年初審的訴訟案時，法西斯檢察處所起草的起訴書，由於小心過度，竟附上重達九十六公斤的卷宗。而這批卷宗連同拉科西在獄中所寫的大多數書信至今還沒有找到。將來我們可能找到目前我們根本不知道的許多文件。

匈牙利工人運動學院仍認為有刊印本書的必要，因為匈牙利的工人階級、勞動農民和知識分子既在目前進行全面的改造事業，都願意知道拉科西生平的傳記，特別是他的最艱難的階段。他們願意熟稔可歌可泣的反對反革命政權的鬥爭史，而這一部鬥爭史正是反革命政權所誓欲抹煞的。既然我們向着社會主義的道路前進並建設一個新的世界——社會主義世界，我們就有絕對必要創造新的人、社會主義的人了。若要實現這個目標，除了拉科西生平所給我們的榜樣以外，還有更好的、更接近理想的榜樣麼？對於參加社會主義競賽，建設社會主義，保衛祖國、和平與自由的城鄉勞動者，除了拉科西在法西斯劊子手面前所表現的不可動搖的態度外，還有更好的鼓舞性的題材麼？我們可否在學校裏和在學習的工廠裏向受着共產主義教育的匈牙利

新青年，指出拉科西的史詩般的鬥爭，以期更好地教育他們呢？這本書，這個拉科西訴訟案的經過把不屈不撓，準備為祖國、為人民、為自己的階級而犧牲一切以至自己生命的戰士的典型，啟發大家。同時，本書把拉科西在一個學者，具有廣泛知識的政治家、博學家和勞動人民的真正領袖的形象綫條下，介紹給我們。

匈牙利工人運動學院竭盡一切努力編成了這本書。這本書把這光輝的榜樣展示給匈牙利的勞動人民，這本書將是為創造社會主義的人而鬥爭的很好的武器。

深願這部著作將對數十萬勞動者的工作和鬥爭帶來新的鼓舞和新的興奮，幫助讀者們更好地完成他們的任務，從而這部著作對於匈牙利的社會主義建設就有了貢獻。

## 拉科西被捕記

蘇爾坦·華斯<sup>①</sup>

一九二五年九月二十二日星期二

前天晚上，我們的聯絡員通知我：拉科西要和我接洽。

約會定於今天上午十一時在高茲拉克塔路。

我經過很多曲折迂迴並且是冗長而很少有人來往的路才到達了約會地點。因為如果被警察尾追着，這實際是被發現的最好方式。

沒有人尾追我！

我確實知道沒有人尾追我！否則，我會自己覺察的。

到了高茲拉克塔路，我仔細地察看了周圍的情況。只在舊路的另一端，我才看見了人：正在拆換路基的工人。

我走上前去。稍候一下以後，我看見拉科西出現了。

他轉身到路上的時候，偷看了一下工作很忙的修路工人。他以頭部輕微不易覺察的動作察看了周圍情況：他也想知道有沒有警察尾追他。那時候，他單獨一人在路上。

拉科西靠近我的時候，矮小身材，走時兩臂作滑稽式的搖擺，很像在布達佩斯常見的、數以百計的那班欣賞晨間散步風味的市民模樣。他的闊邊呢帽、闊邊大眼鏡、留得像毛刷一樣的濃鬚把他的面貌幾乎全部掩蓋起來。

<sup>①</sup> 蘇爾坦·華斯曾和馬加斯·拉科西一起做地下工作，任何匈牙利共產主義青年團的書記。——編者



如果我不認識他的話，我就要把他視作拿大薪水的職員了。

對啊，拉科西絲毫不像小說中所描寫的那種革命英雄的典型。誰能懷疑這個向我靠近的人就是霍爾第的警察所欲得而甘心的匈牙利蘇維埃共和國領袖之一呢？

但這種外表不可能蒙蔽我。我知道當他出現在我的面前的時候，我就可看到他那副帶着笑容而閃爍着革命者的決心和不屈不撓的意志的眼睛。

在這時候，拉科西瞥見我了。

直至現在，我裝做單獨散步的人。但既然拉科西已能識別我了，我就站在一條橫路的角落裏，掩藏了一半。從這個據點，我可以很好地觀察整個高茲拉克塔路。

這時，路上很熱鬧。一輛兩匹馬拖着的搬場大車轉彎時作出格格的響聲。我看見人們從車門下來。他們閒談着或沿着人行道走。

一輛公共小汽車迅速地趕上了拉科西。

我忽然聽到巨大的爆裂聲。這可能是車出事了。離開拉科西約二十步光景，公共小汽車停下來了。

司機先從車中出來檢視發動機。繼而乘客也走出來，靠着揭開了蓋的發動機，檢視了好久。

我的印象是：靠着車頭而掩藏着面容的人使拉科西感覺到不愉快。

他停了下來，低下頭好像要縛鞋帶的模樣，向四周張望了一下。

繼而他又前進，想迅速地趕過汽車。

我等候着並注視着。我所看見的事情使我緊張得連呼吸都透不過來：靠着發動機的人竟用手臂把拉科西抓住了。

立刻，司機也擋住了他的去路，並拿出手槍向他瞄準。

直到這時候，我還不能看見神秘乘客的面貌。現在我認出來了，原來他是專捉共產黨人的著名警察大隊隊長彼得·漢。

一個可怕的思想使我癱瘓下來：這是對付我們的啊！但是，儘管我被迅雷不及掩耳的事變所驚呆，一條閃電却呈現在我的腦海：必須營救拉科西啊！

哎啊！我毫無能力。適才走上人行道的人們都是警察啊。他們都跑到巡官用手臂抓住的拉科西那裏，並把他包圍起來。

但拉科西還不想屈服。他向打手們掙扎。他喊叫了兩次：

——你們搞錯了！

——好吧，拉科西。我知道這只是因為誤會。安靜些，拉科西，安靜些！巡官以譏嘲的口氣向他說。

但拉科西繼續表示憤慨。他終於向我做了一個暗示的標誌：要我設法逃走。這位真誠的同志在自己大難臨頭之際，仍不忘記給我一個謹慎的警告，希望至少我能夠得救。

拉科西所遭受的逮捕是注定而絲毫不可挽回了。我只好讓他受命運的安排吧，我的心碎了。

我逃了。

我沒有其他辦法可施。

我迅速地往那條橫路上走。但那條路被攔阻了。在路的盡頭，我看見人們跑來跑去，手裏拿着手槍。

我立刻退回來。

——止步，否則我們就開槍！他們向我喊叫着。

我不服從他們的命令。我知道我的生命要靠我的腿能

否跑得快了。我就用盡全力奔跑着，以期達到“公共倉庫”大廈周圍的鐵柵。我打算爬過鐵柵，然後沿着倉庫走，從多瑙河碼頭的方向消失。

當我走到高茲拉克塔路的時候，一羣警察正帶着拉科西。我不願把他們的注意力轉移到我的身上，而只想儘快地加緊我的脚步。但不久，我爲了擺脫這班追逐我的人們——他們很迅速地塞住了那條橫路，我又開始奔跑了。

枉費心機：我不可能脫險。我正要到達鐵柵的時候，修路工人從路的盡頭跑過來攔住了路，拔出了手槍。

原來他們也是警察，他們僞裝着工人，先佔了路角的位置。

同時，剛剛到達的搬場大車開了門，一羣警察蜂擁般跳下來，向着我猛撲。

道路被小心地圍起來。無論拉科西、我或任何人都不能逃脫警察的包圍圈。警察們還盤問那時偶然在被包圍的路上出現的人，我看見他們還把無辜的路人弄上了搬場車。

## 拉科西在特別法庭受審

蘇爾坦·華斯

一九二五年十一月十四日星期六

早上約八時三刻，人們把我的牢房門打開了。警衛來找我，領我到橫走廊裏。奧里、戈古斯和哈芒已先在那裏。我立刻明瞭公審日已經到來了。

我們離開了監獄的鋼門，監獄的建築是由這鋼門通到重刑法院的。我們每人由兩個警衛和一個警官特別隊跟着。

沿着走不盡的和曲曲折折的法院走廊，警察佈置了警戒綫，在警戒綫的後面，擁擠着許多羣衆。

在陪審委員室的前廳裏，早已等候着我們的律師接見了我們。

拉科西和他的律師談話的時候，和他平時的習慣相反，却高聲說話。其實他的話不是對着他的辯護律師，而是對着我們說的。作爲一個良好的組織者，他已經把我們每個人在審判中應擔負的任務預先分配好。他給我們指示、說明和鼓勵。

經過這談話後，我們又等待了一些時候。律師原是一位同志，他對我們說：政府深怕工人舉行示威，已向警察方面告急。騎兵隊和步兵隊駐紮在市中心主要公共建築物的周圍。連法院也由好幾道警戒綫圍繞着。人們必須持有特



別入門證，方能進入法庭。

法庭已經擠滿了人。羣衆擠集在坐凳上和門口。警官混在旁聽席裏，我看見十個旁聽者中就有一個警官。

我們坐在被告席上，每人由兩個警衛夾着，刺刀插在槍上。我和拉科西在同一條坐凳上，靠庭上最近。我瞥見奧里、戈古斯和哈芒都在我們旁邊。

在等候開審的時候，我注視羣衆並留心看我的同志們。

拉科西保持着鎮靜和嚴肅，一似平時。他浸沉於自己的思考中。他就要進行他的一生的和匈牙利共產黨的最偉大的戰鬥之一了。

## 拉科西使用他的最後發言權

(一九二五年十一月十五日星期日)

庭長：准馬加斯·拉科西說話，作為他的最後發言。

(拉科西以堅決的步伐走近了被告席。從他開始說話起，大家都看清楚了，請求特赦是不可能的。在這次公審裏，兩個世界對峙着：正在衰亡中的舊社會秩序和正不可抗拒地走上勝利的道路的社會主義社會。)

庭長：我預先警告你：你務必避免一切誇耀的語調。你只能講控訴主題和你個人的活動。

拉科西：我注意庭長的警告。但我必須首先注意到對我控訴的種種事實。事實是文明的西方正目不轉睛地看着我們，並且會感到驚奇，如果看到人們在這間大廳裏怎樣估計……

庭長：你一開始就離題了。你須嚴格根據事實。

拉科西：我必須指出共產黨不是游手好閒之徒、騙子等欺騙人民的“集團”或“烏合之衆”。它是具有階級意識的工人的黨。剛才檢察官指摘我的那種語調自一八六〇年以來早就不使用了。在檢察官審訊我的過程中，我已經聽到像“白色沙皇”和“紅色沙皇”那樣的無聊話。但我必須在這裏指出，我們已經不再是在用這樣輕率的論據來打斷一切討論蘇聯的時代了。我警告檢察官先生及一切有關的人們，

任意侮辱蘇聯而不受懲罰的時代已一去而不復返了。英國著名學者和卓越的政治家所組織的代表團已於去年訪問了蘇聯。這個代表團對於蘇聯曾作了一番研究並對於訪問的印象發表了長達二百六十頁的出色的報告。檢察官可能獲得更好的情報……

庭長：不要管這些。還是開始向我們講你在匈牙利所做過的一切吧。

拉科西：與檢察處的誹謗相反，我必須聲明沙俄曾經是世界反動的領袖。而蘇俄適相反，它是遏制國際反動道路的最強大的堡壘和國際工人階級以及匈牙利工人階級最崇高的希望。

庭長：立刻停止說這些煽動性的話！你所要辯護的是你自己，而不是共產國際和俄國共產黨人。

拉科西：共產國際和蘇聯不可混為一談。但我們的俄國同志是共產國際最優秀的旗手。這個國際單獨為被社會民主黨人所背叛的工人事業而鬥爭。匈牙利社會民主黨沒有替失業工人做過任何事情。在全世界各國，共產黨是工人利益的唯一保衛者，因為社會民主黨人站在資產階級的立場，為資產階級服務。

庭長：這裏，你又搞錯了。

拉科西：庭長先生對社會民主黨人的活動如此滿意，這就構成對於這班社會民主黨人的嚴重的批評。倍倍爾在每次敵人表揚他的時候指出：“我很害怕我又做了什麼糊塗事……”

庭長（再度打斷他的話）：你的批評超過了可以允許的限度。我沒有表揚過社會民主黨人。這不是我的義務，而這裏也不是做這件事的地方。你把我的話作了歪曲的解

釋。

拉科西：檢察官先生曾誇談了一陣特喇農條約；他曾對我們說過去匈牙利怎樣遭受破壞。這是毫無疑問的；但他却忘記了我們共產黨人曾經手執武器拒絕簽訂一個比特喇農條約更有利得多的和約。我們曾經起來反抗武裝到牙齒的捷克帝國主義。我們曾經流了我們的鮮血。

檢察官（喊叫起來，打斷他的話）：爲了世界革命，而不是爲了領土完整。

拉科西：檢察官先生，我們曾爲了收復匈牙利人所居住的領土而鬥爭！即便按照你的說法，你也得承認革命是爲民族自決權而鬥爭的唯一能獲得勝利的手段。再者，這一事實也已經由蘇聯民族政策所證明了。

庭長：够了！不要替蘇聯和共產主義辯護，你應當替你自己辯護。

拉科西：我自己沒有什麼要辯護的。我的活動是在於幫助組織共產黨。資本主義的社會秩序正走向潰敗的道路。只要我們能過渡到共產主義社會，我們就能够拯救我們的文明。我們所走的路是唯一正確的道路。

庭長：回到本題上來吧！

拉科西：檢察官用污穢的語氣談社會主義運動，尤其是一九一九年匈牙利勞動人民革命。在反革命的匈牙利，檢察官先生可以這樣做而不受懲罰。以前已經有過一位檢察官曾把巴黎公社視作“一小撮流氓的冒險勾當”。然而公社烈士墓現已成爲全世界敬仰的聖地。勞動人民也將前往匈牙利共產黨人的墓前祭掃。刺刀、戒嚴令和暴力都無法阻止共產主義的勝利，都不能在鮮血中浸沒共產主義的勝利。

庭長：拉科西，如果你繼續用這樣的語調，我將不准你



發言。

拉科西：自一九一九年以來，匈牙利共產黨已經歷了火燄、痛苦和考驗的大洋。雖則如此，消滅它是不可能的，因為我們的黨是未來的黨、社會主義革命的黨，因為我們的黨是勞動人民的黨，並且因為勞動人民正準備爲了他們的黨而犧牲一切。

庭長：够了，拉科西！我不能容忍這些話。

拉科西：列寧講到共產黨的重要性時曾寫道……

庭長：我已經對你說過：我禁止你講列寧。你立刻坐下來吧。

拉科西：喏！只要一提到列寧的名字，反動派立刻害怕起來。

庭長：我禁止你這樣講話。巡官們，立刻把被告帶回原位！

“新三月”，一九二五年十一月，第二二六——二二八頁。

一九二五年十一月十八日“消息報”。

一九二五年十一月十八日“真理報”。

蘇爾坦·羅斯：“獄中十六年”，第一二〇——一二一頁。

## 國際團結獲得了勝利

蘇爾坦·華斯

一九二五年十一月十六日星期一

法庭開庭了。

靜寂如死。只聽到人們的心臟的跳動……或許是我自己的心單獨跳動得這樣厲害吧？

大家起立。

推事們彬彬有禮地、慢吞吞地各就他們的座位。

大家都坐好了。只有兩個警官穿着制服，站着。被判死刑的犯人就要交到他們手裏。

庭長起立。

大家也起立。

庭長手執一紙。他以令人不耐煩的緩慢態度唸道：

“謹以匈牙利國家的名義宣佈，由布達佩斯重刑法院組成的特別法庭，於聽取了檢察處和被告辯護的發言後，對馬加斯·拉科西及其同謀者事件，作出裁定如下……”

“裁定”……“裁定”——我的心臟的猛烈跳動竟和“裁定”這字眼的節調混合起來。“判決”還沒有宣讀，但“裁定”二字却是和“生命”二字同義的！

當我正在尋思這個字的意義而快活得出神的時候，庭長略帶啞澀的聲音，繼續唸道：

“特別法庭把被告等移交普通法庭，俾便進行以後的程

序，因為……”

誰也不再去聽庭長的“但書”了。大家看得很清楚，“裁定”絕不是庭長自己的作品。

在這次審訊中，匈牙利勞動人民和全世界勞動人民的團結獲得了光輝的勝利。

庭上秩序頓時大亂。新聞記者跳過了坐凳，從法庭裏跑出去。最緊張的是我們的朋友們，他們急於要向全世界宣佈：匈牙利共產黨、國際的團結獲得了勝利，拉科西和其他被告已被決定移交普通法庭了。

宣佈勝利的電訊也到達了莫斯科。

法庭裏的人逐漸散去了。劊子手也消失了。只剩下外國派來的代表們還坐在前排。他們的面容流露着快樂、欣幸、力量。

勝利！

我們無法和他們交談，然而我們充滿着光芒的眼睛好像對他們說：我們對於匈牙利勞動人民以及全世界勞動人民感激到了怎樣程度！

繼而，我們五個被告又踏上回到監獄的路。

走廊上，在警察行列的後面，擠滿了蜂擁似的人羣。

一路上，到處有人向我們揮手，揮便帽，揮呢帽作為敬禮。

這些沉默的敬禮是針對着我們的，國際團結拯救了我們的生命，使我們能夠繼續工作和鬥爭。

## 關於禁止旁聽的官方理由

王家重刑法院在公審庭上宣告禁止旁聽的裁定時，是根據以下理由的：

根據刑事訴訟法第二百九十三條的規定，如公開辯論足以妨礙公共秩序和道德時，法庭有權裁定禁止旁聽。

的確，任何犯罪對現社會秩序和道德均構成一種危害。而重刑法院的辯論公開原則之成爲程序法的基本原則這一點也是正確的。刑事訴訟法對於某些類型的犯罪，並沒有規定不遵守此項基本原則就可以遽然進行判決。

但在某一具體情況下，刑事訴訟法基於國家和整個社會的需要採取預先防範措施的理由，規定了自由裁量權的行使；除此以外，刑事訴訟法關於審判公開原則的保證是不容被忽視的。

在長期經濟危機的時代，失業羣衆爲了尋覓工作，甚至不可能找到工作而掀起的混亂情況以及由此而產生的激憤的狀態，對於國家和社會秩序形成一種永久的威脅。社會各階級間，尤其是勞資間的摩擦日益增加。宣傳的口號所給予羣衆的影響——運動的力量正毫無止境地增長着。宣傳博得了歡迎，藉口爲羣衆謀福利的思想體系產生着吸引的力量。結果，國家和社會從分裂的力量方面遭到一種狂暴和不平衡的壓力。

在這公審中，勢不能不宣讀關於闡明共產主義在實踐

中的戰略和策略並包括關於共產黨企圖的敘述等文件。國際共產主義的洪流利用世界上籠罩着的貧困狀態和窮苦大眾的本能要求來加強宣傳。共產主義的論調在於說明財富、權力和知識不是少數人的遺產，應當成爲一切人們的共有財產。

這種論調也指出除用武力毀滅現有國家和社會秩序以外，幸福的最終目的將無法達到。

王家重刑法院由於目前情況斷定尖銳的經濟危機已經發生，可以作出禁止旁聽的裁定。他們認爲，在這種情況下，若任審判公開而不下裁定禁止旁聽，則既無法阻止共產主義的錯誤思想滲入失業羣衆，也無法阻止這些錯誤的報道、這些口號和這些目標控制着憤怒的失業羣衆，從而使社會的平衡也遭受了動搖。

被告們足以騷擾公開審判秩序、損害法庭權威的態度往往鼓勵聽衆席上的某些敵視現社會秩序的分子去進行嚴重妨礙公共秩序的過火行動。在這種情況下，法庭也必須裁定禁止旁聽。

“匈牙利工人運動學院檔案文件”第三卷，第三七——四二頁。

## 拉科西的審訊記錄

(一九二六年七月十二日及十三日)

這就輪到拉科西同志了。

他在兩個武裝警衛夾持之下，昂着頭，滿懷着驕傲的心情，向被告席走去。他迅速而穩健地答覆庭長的詢問。他的話的每一個字都構成爲一個論據，一個解釋，一個教訓。好像在公審庭上所進行的是政治辯論，而不是十年或十年以上禁閉刑罰的威脅……他泰然自若，絲毫沒有示弱。他神色不變，絲毫沒有膽怯的表現，鼓着勇氣，不屈不撓，侃侃而談匈牙利共產黨的任務，絕不顧庭長一再的干涉，而庭長要他爲自己辯護，不要進行宣傳。

以下就是拉科西所說關於他生平經歷的話：

我曾在俄羅斯淪爲戰俘。我就在那裏成爲共產黨員。我在卡羅利執政時期回到匈牙利。我是共產黨創始人之一。在專政時期，我曾任人民貿易委員，但一俟紅色戰爭爆發，我立即到了前綫，因爲我認爲站在最前列進行鬥爭是我作爲共產黨員的義務。公社失敗後，我就到了奧地利，我在那裏被拘禁了九個月。繼而我到達了蘇聯。

庭長：你在俄羅斯幹了些什麼？

拉科西：我參加了共產主義國際第二屆代表大會。

庭長：你曾在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上做了關於匈牙利

情況的報告。你是向誰呈交這個報告的？

拉科西：向列寧同志。

庭長：誰命令你返回匈牙利？

拉科西：是我自己願意回來的，我回來是爲了服務於匈牙利共產黨。

庭長：誰支付你的旅費？

拉科西：匈牙利共產黨有經費可供支配。

庭長（作驚奇狀）：啊，是麼？那末，這些經費從哪裏來呢？

拉科西：在國內和國外，有足夠的匈牙利共產黨工人自願獻出金錢。在莫斯科就有匈牙利籍工人六百人，在布達佩斯有更多的共產黨工人，他們都在財政上支援匈牙利共產黨。而且我們的黨具有正常的預算。

庭長：在組織方面，第三國際和匈牙利支部之間有沒有一種聯系存在？

拉科西：這是很自然的。

庭長（用強有力的聲調）：請你不要對我作輕描淡寫的答覆。好好地適當地答覆我，否則我們不得不用其他辦法了。你剛才不是說接着你便來到匈牙利麼？

拉科西：是的，爲了進行組織匈牙利黨。

庭長：你想合法地，還是非法地進行組織呢？

拉科西：盡可能採取合法的途徑，而且所謂“非法地”這個名詞所表現的概念含有很相對的意義。我們在匈牙利的所作所爲，就是人們在全世界的所作所爲。到處都允許這樣做，只有在匈牙利是禁止的。在匈牙利，人們拿四五十年以前用來打擊社會黨人的策略來對付共產主義。人們想要單靠警察措施來消滅共產黨。誰宣佈是共產黨員，誰就被

監禁起來以至投入黑牢。

共產黨是唯一保衛工人利益的黨。在它的初創階段，每個解放運動都遭遇到當權階級的抵抗。在封建主義面前，資產階級也曾經是革命的階級。就在那個時候，這個階級最初的革命者，馬爾蒂諾維茨和他的朋友們遭受了犧牲。無數的革命階級代表被拖進監獄。但仍保持自由的那批人却繼續為資產階級奪取政權而鬥爭。像我們一樣，他們也用過假護照。隨着情勢的發展，資產階級終於上升為當權階級。

共產主義是無產階級的產物，而無產階級則是資產階級的產物。起訴書把共產黨視作殺人犯和無業流氓。我們姑且不對資本主義作類似的論證，但我們只提出以下的問題：資本主義是否瀕於破產，它是否已完成了它的歷史任務？照我的意見，資本主義已經完成了它的歷史使命，一個新的社會應該取而代之。世界大戰就是一個證明。在資本主義看來，世界變得太小了。英國、法國、俄國和中歐各帝國的資本家們已無法和平共處地發展下去，只得讓世界大戰去決定哪一個資本家集團可以優先發展。這恰恰證明了資本主義的破產。比上次世界大戰規模更浩大的新的世界大戰正逼近着，這一事實是資本主義破產的又一證明。一九二六年常備兵的數目比軍備競賽達到最高點的一九一三年的數字多一百萬這一事實，就說明了資本主義破產的真相。目前，軍事預算已大大地超過了一九一三年的數字。但人們仍不准我們像起訴書辱罵我們那樣來辱罵資本主義……

庭長，關於這點，我要你注意，起訴書是不會辱罵的。那末，你是本着這樣乖巧的思想的精神而加入共產國際的



了。

拉科西：是的，因為在大戰以前，我早就是社會黨員了。這種思想的本質在於以下的事實：資本主義已不合時宜，只有勞動大眾才能保證發展的繼續。

（於是他長篇大論地講到埃爾諾·加拉米。根據他的看法，近十年來，加拉米已經完全資產階級化了。）

匈牙利的社會民主黨已進入腐朽階段了。

庭長：社會民主黨沒有腐朽。你不要忘記你是在法庭上，在這裏你沒有權利來攻擊那些不準備辯護的人們。

拉科西：社會民主黨人至少在表面上不得不採取一種革命的策略。但同時，當羣衆正在興奮地迎接警察勢如潮湧的衝擊的時候，他們的領袖們却和歷屆政府妥協，他們和克里斯托菲、安德拉西、胡斯查爾和韋克爾妥協。

匈牙利社會民主黨是參加第二國際各黨中最不穩固的黨。

庭長：不准你侮辱一個匈牙利的政黨。

拉科西：社會民主黨人是在保衛現社會的秩序。現社會秩序也就對它盡保護的責任以爲報答。我的批評不是針對參加社會民主黨的工人，而是針對着這個黨的那些領袖。過去，連我自己也曾相信社會民主黨人會根據第二國際所通過的決議來進行反戰的鬥爭並且會利用這個鬥爭，把無產階級從資本主義的壓迫下解放出來。他們不僅沒有實踐這些承諾，反而背叛了階級鬥爭和國際主義的原則，去依附民族主義和資產階級的思想體系。第二國際僅止於在口頭上爲無產階級的利益而鬥爭，實際上它已經背叛了無產階級。（在這裏，拉科西引證了社會民主黨背信棄義的實例。）

工人階級和中等階級都沒有戰敗，失敗的是大地主和

大資本家。在戰後宣告破產的是他們，因為他們喪失了支援他們的武力。他們喪失了他們的最堅強的支柱：憲兵、警察和軍隊。

（於是拉科西簡略地敘述了一番自一九一八年以來發生的事變。他宣佈目前全世界已有四十五個共產黨，而在匈牙利，人們還用一九二一年的第三法案來摧殘共產黨。他說明對共產黨人的迫害不自今日始，一九一八年時，社會黨人已經對共產黨人進行了不少的迫害。）

一九一九年二月，警察和民兵在“人民之聲報”大廈周圍組成了一條警戒綫，藉以防備可能發生的示威行動；在黑暗中，警察和民兵開槍交射起來。結果：死八人，很多人受傷。社會黨人當場和警察一致同意把吵架的責任轉嫁給共產黨人。“人民之聲報”已經準備發表一篇文章，硬說這是由共產黨員所組織的屠殺。

庭長（打斷他的話）：你應當把你的故事縮短些。

拉科西：如果一切須由社會民主黨人聯盟和資產階級來支配的話，被拘禁的共產黨員就要遭到羅莎·盧森堡和卡爾·李卜克內西的命運。然而共產黨雖遭受了種種迫害和監禁，仍得到勞動大眾的支持。當社會民主黨領袖們親眼看見這個事實的時候，他們就參加到共產黨的陣營裏來。他們並不是由衷地站在共產黨陣營方面的，因為非如此，他們就要喪失對於羣衆的影響。他們這樣作就證明了他們缺乏骨氣。

勝利的反革命用盡一切方法來污衊匈牙利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反革命企圖在匈牙利革命運動的萌芽時期就扼殺它。然而自從反革命勝利以來，匈牙利無產階級所忍受

的一切艱難困苦只能增加它爲恢復無產階級專政的努力。  
(至此，庭長就中斷他的發言，把審訊移到第二天。)

“在拉科西受審的第一天，他對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的起源和發展以及工人運動的歷史，好像做了一次概括式的演講。他娓娓動聽地闡明了一八四八年革命、巴黎公社和以後時期的歷史。他分析了資本主義的發展和世界大戰的原因。他用興奮的字句講到偉大的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它的世界意義，並談到世界大戰以後各處所發生的革命。在這一思想的系統下，他談到共產國際的誕生、它的目標和它的任務。最後他讚揚了一九一九年匈牙利勞動人民的社會主義革命，並指出：匈牙利無產階級專政的內外政策才是爲匈牙利人民利益服務的匈牙利獨立政策。

這天下午時間晚了，庭長打斷了拉科西同志的敘述並下令中止審訊。

拉科西的敘述非常緊湊，引起了所有人——不分敵友——的注意。他利用了他的驚人的記憶力的寶庫，以無數插曲和引證充實了他的敘述。

可惜在拉科西進行‘口供’的時候，庭長不斷地要他遵守秩序，打斷他或阻擾他。但當拉科西嚴厲地斥責霍爾第政權的時候，他並未遭到制止，這是因爲他的發言把庭長也吸引住了。”

一九二六年七月十三日星期二

公審的第二天。

庭長：繼續你的口供吧，拉科西。但今天你應該只限於爲你自己辯護。不准在這法庭面前進行共產主義的宣傳。

昨天我不得不幾次警告你要遵守秩序。

拉科西：我不替自己辯護！這個指控我的訴訟案是含有政治性的。因此，我覺得需要在這裏很清楚地敘述我的信仰和我的觀點，這是很自然的。昨天我已經提到匈牙利勞動人民在一九一九年革命中所犯的最大錯誤。這個錯誤在於使匈牙利勞動人民的革命黨——共產黨——被社會民主黨所滲透，並在於革命政權的重要領導崗位被社會民主黨的領袖們所竊據，他們破壞並背叛我們的事業。他們用盡了一切辦法來破壞勞動人民革命建設的果實並打擊共產黨的威信。

另一個主要的錯誤是由於以下的事實：我們不幸竟沒有充分吸取偉大的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的教訓，沒有把大地主的土地分配給無地的農民。這個錯誤也是爲了滿足社會民主黨的要求而鑄成的。在先決條件還沒有存在的時候，我們就開始組織農業合作社了。

今天，勝利的反革命不惜用一切力量來污蔑匈牙利勞動人民的革命、無產階級專政和領導者的歷史。但是他們白費了力氣。反革命激起了匈牙利勞動人民的戰鬥性。艱難困苦只增加了他們對於社會主義革命的留戀。我們看到社會主義蘇聯的範例呈現在我們的面前，它已經實現了勞動人民的願望。我對於檢察官講到蘇聯的那種語調必須提出最嚴重的抗議。這個國家是爲自由而進行鬥爭的勞動人民和各族人民的主要支柱。

庭長：拉科西，不准講蘇聯。

拉科西：勝利的反革命只有使這個潛伏着革命的地方更加動盪起來。革命的無產階級所遭受的艱難困苦是一個教訓，它促使無產階級的心坎燃起新的無產階級專政的

渴望。

自一八四八年<sup>①</sup>以後，能定出真正革命的同時也是民族的對外政策的是無產階級專政。這個革命的民族政策的先驅者就是匈牙利蘇維埃紅軍，這支軍隊曾經勝利地打擊了捷克和羅馬尼亞的帝國主義貪婪性。統治階級滿足於民族主義者的角色：他們公開地或秘密地主張狹隘的民族主義，他們出賣了祖國的獨立給外國資本家藉以換取經濟上的緊急支援。匈牙利的民族問題只有依照第三國際列寧主義的綱領和策略，依靠國際無產階級的革命合作，才能對勞動人民作出有利的解決。

如果我們考察一下戰後的發展，我們可以看到蘇聯的經濟發展是在積極意義中前進的唯一國家，而資本主義國家則困頓在慢性的經濟危機中以致於走頭無路。在蘇聯，社會主義生產的發展保證着勞動人民生活水平經常的提高。在資本主義國家則相反，勞動人民生活情況日趨惡化。

庭長（打斷他的話）：這不是你應該進行的檢舉！還是替你自己辯護吧！

拉科西：反革命把匈牙利無產階級的革命先進部隊打倒在地上。社會民主黨背叛了匈牙利工人階級。無產階級對於革命的共產黨滿懷着戀戀不捨的情緒。

我還想講到起訴書特別強調的兩個問題。起訴書有一處指出參加第三國際就等於希望用武力來消滅全人類的文明。

檢察官：這是完全正確的。

拉科西：和它相反的東西才是正確的。可笑的事情是：

---

<sup>①</sup> 法文本爲一九四八年，疑有錯誤，暫依英文本改爲一八四八年。

——譯者

我們必須對這個控訴作辯護，而正是我們，爲了共產主義，希望保全階級文明的價值。原來現存的文明是資本主義的產物；不是進步中的資本主義的產物，而是衰亡中的資本主義的產物。在資本主義的帝國主義階段，資本主義生產既瀕於破產，這就自然地牽連到整個上層建築、人們稱之爲文明的一切的破產。恕我在這方面不多發揮。最近時期，我們已經看到不僅在匈牙利，而且在全世界，這個文明的主要角色，學者和大學教授們，都生活在貧困之中，簡直淪於乞丐狀態。今天新富翁拿一八四七年時對待斐多斐提到的“匈牙利紳士”的同樣態度來對待這個文明的主要角色，匈牙利紳士在那時候就是代表衰亡中的封建文明的。我們可以用同樣的態度說明今天的資本家，他們輕視大學教授，因爲他不懂得資本投機的藝術，因爲他不知道人們怎樣會運用匈牙利和奧地利的克郎，運用法郎或其他金融花樣，可以大發其財。

我們對待科學的態度完全不同。我們對於文明有另一種想法。蘇俄在大飢荒時代，雖處於艱苦困難之中並向無數敵人作鬥爭，却能夠找到辦法來保證學者和藝術家最大限度的福利，給予他們以科學院院士的待遇。當一九二五年九月俄羅斯科學院二百周年紀念之時，各國學者聚集於列寧格勒時，他們看到在這個工農政府領導下的國家裏，學者們在文化事業上的成就竟如此偉大，都表示驚訝。這是德國科學院院長自己在滿懷興奮中所表示的意見。匈牙利的公社雖則艱苦困難，瘡痍滿目，却也實行了偉大的文化工作。連反革命的著作論到匈牙利無產階級專政時也承認了這一點。所以，人們不能單純地說我們要消滅人類的文明。恰恰相反，我們要產生一個能成爲人類財富的文明。

社會的文明並不屬於全人類，它是統治階級用來維持政權的特殊文明。

另一個問題是革命的恐怖問題。

我們被控的首要的一點就是：如果沒有反對資產階級的武裝起義，我們的計劃就無法實現。這是正確的。我們承認我們是這個真理的擁護者。每個新社會都是靠革命才誕生的。請檢察官先生向我指出那一近代資產階級國家不是從革命中誕生的！儘管這使得檢察官先生表示怎樣遺憾，這仍然是一件事實。革命在社會發展的過程中是不可避免的。因此，取得政權的階級，爲了剛剛誕生的新社會的利益起見，不得不採取整套的自衛措施，包括恐怖在內，這是很自然的事。任何革命在其發展的某一階段都要藉恐怖以自衛。產生資產階級民主的英國革命和一八四八年的匈牙利革命完全一樣，都會利用過恐怖。法國大革命、一九一七年勝利的俄國革命以及我們的無產階級專政都是一樣。

當我們奪取了政權的時候，我們的第一個問題就在管制無數憲兵、警察和資本家，由於他們在戰前和戰爭中所犯的罪行，工人們需要向他們算賬。我們正在抵抗外來的帝國主義者的攻擊，而資產階級竟在我們的背後向我們猛撲，無產階級瀕於危岌的時候，我們就不得不依靠恐怖了。對於無產階級革命，恐怖本身不能成爲目的，而只是一種手段。在公社以後的四個半月期間，勝利的反革命所殺害的生命至少十倍於無產階級專政爲了對付反革命活動而槍決的反革命者。

庭長：講你自己的罪行吧！

拉科西：對於我創設了共產黨並爲共產黨工作的事實，我不承認這是我需要在法庭面前回答的“罪行”。這是我曾

三  
經完成的和我永久要完成的義務。法庭無法找出絲毫證據來說明共產黨在最近將來企圖發動武裝起義來推翻現政權。從一九一九年起，情況變了，共產黨的策略也跟着改變了。我和我的同志們的目的是在於創設一個合法組織。

●  
●  
我返回匈牙利，以期對於共產黨的締造，貢獻出我的一份力量。我自以為關於這個活動，我負有責任，但我只須向無產階級，向匈牙利共產黨並向共產主義國際負責，只有它們才是我的裁判員。

庭長：現在你不是在共產國際面前，而是在匈牙利王家重刑法院面前！還是講目前匈牙利的情况吧！

拉科西：在匈牙利，勞動人民的生活條件日趨惡化。蘇聯則相反，它保證着勞動人民生活水平經常的提高。這個偉大的建設工作是由蘇聯共產黨所領導的。

庭長：我警告你：不准歌頌蘇聯，不准指控資本主義，只准為你自已辯護。

●  
●  
拉科西：我無需替我自己辯護。我曾竭盡我的力量，使匈牙利的共產黨也能發展。我們的黨領導着匈牙利勞動人民的解放鬥爭，因為他們在非人道的條件下正備受苦難。

庭長：不要管這些，拉科西。關於這類事情，你講得够了。你在國外和誰取得聯系？

拉科西：我拒絕答覆。

庭長：你從事非法運動和合法運動麼？

拉科西：我們的努力旨在改變非法運動為合法運動。

庭長：你認為你受共產國際第一次代表大會決議案的約束麼？

拉科西（高聲）：是的。

庭長：這個決議案也指出勞動人民也須手執武器進行



鬥爭麼？

拉科西：爲了爭取人民的自由，手執武器進行鬥爭是我們的義務。

庭長：你剛才說到的事情構成了一個新的罪行。法庭將要充分估計你的發言。

拉科西：我認爲關於我的發言，我負有責任，但不是對法庭負責，而只是對勞動人民負責。匈牙利的勞動人民和蘇聯的勞動人民一樣……

庭長：够了，拉科西，不准再多講一個字！

拉科西：蘇聯實現了……

庭長（向警衛吩咐）：立刻把他押送原位！

“新三月”，一九二六年七月——八月號，第四一——四一四頁。

一九二六年七月十四日、十五日“消息報”。

一九二六年七月十七日“工人報”。

蘇爾坦·華斯：“獄中十六年”，第一四〇——一四三頁。

## 拉科西的最後發言

(一九二六年七月二十一日星期五)

拉科西有最後發言的權利。

通向法庭的走廊比平常防範得更嚴。

在法庭裏，無數羣衆在擁擠着。兄弟共產黨的代表們都出席，他們帶着翻譯員坐在前排。在他們後面的凳子上，記者和速記員們整理着他們的手冊並削切他們的鉛筆。如果人們不在這裏或那裏看到槍刺鋒芒的閃爍，人們必疑爲是在聽衆等候演說家的報告會裏。可是“報告員”拉科西的周圍不是同志，而是監獄的警衛。

法庭開庭了。大家起立。

拉科西在庭長命令之下，由警衛引導到推事面前。

庭長：拉科西，在你的口供中，你已經敘述了共產主義的理論和歷史。所以今天我請你說得簡短些，並專爲你自己辯護。

(拉科西好像沒有聽到庭長的警告似的，保持着鎮靜的態度，提起宏亮的嗓子，開始他的演說。)

拉科西：尊敬的王家重刑法院，我在行使我的最後發言權的時候，我要在有無犯罪的問題、具有次要性質的刑事司法問題以外，在這裏講到這個訴訟案所必然要引起的一切問題。這些問題是：共產黨的合法性、社會民主黨問題和俄

國問題。我還要講一系列次要的問題。這是必要的，因為某些同志將沒有行使最後發言的權利。

在訴訟案的技術方面，例如暴行的問題，我僅要聲明我們完全維持我們在法庭面前所說過的一切，任何證人的口供都不能削弱我們所肯定的話。至於檢察處所造的口供筆錄，我的同志中有幾位已經聲明過：正當他們在絕食，從而四肢無力的時候，他們才受到審訊的。

在控訴方面，幾乎一切也都已在我以前說過了。我們初被控告犯叛亂罪，繼被控告在最近將來企圖建立無產階級專政的蘇維埃政權。王家檢察處已經乾脆地放棄了這些控訴。檢察處也已經放棄對一九二四年和一九二五年間我們在匈牙利的活動科以刑罰的意圖，因為沒有足以說明我們對國家社會秩序帶來損害的肯定的證據，連散發傳單的形式證據都沒有。

起訴書之所以要求適用一九二一年的第三號法案，只是為了預防我們根據我們主張的原則而可能進行的未來的革命活動，或是為了在我們構成損害之前先把我們消滅掉。

我將在我的敘述的末段，講到預防手段的問題。目前，我只想指出不僅控訴已經奇怪地減輕了它的廣闊的程度，不是針對現在，却是強調未來；而且由於控訴沒有傳拉約斯·薩穆埃爾出庭，他雖然是一個證人，却沒有出面參加訴訟案的辯論，控訴也採用了預防的手段。我聲明我們確切無疑地知道他曾充任挑釁特務的角色。我看不出有什麼不傳他在這裏出席的理由，因為無論如何，今後他已不可能再被利用來担任這類的使命了；實際上工人運動將不再允許他混在工人的隊伍裏。人們避免讓他出庭，因為如果他在這裏的話，我們立刻可以識破，就是他，在我們被捕前二十

四小時，曾通風密報一切。如果這段事情不以一個秘密的、倒填日子的報告為基礎，那就毫無意義可言了；這個報告要使人相信警察在經過冗長的監視時期後才得以認識共產黨和社會民主黨間的關係，並使人相信從而警察才有了向警察廳長納多齊報告，繼而向檢察處報告的準備。我自然懂得像這樣一件事在秘密的幕帷下掩蓋起來是何等重要啊！

另外一件事：在我們被捕的前幾天，這個薩穆埃爾曾在目前出庭的被告之一的面前，和我接洽過。那時我還不知道他已經是挑釁的特務；然而他已經作出了些含有荒誕性質的言論，我聽了立刻加以駁斥。

我在這裏還必須講到檢察官對待我們的方式，他把我們視作“下流人”、“游蕩者”以及其他等等。我認為，九年以來，共產主義運動已經在地球上最大國家中領導着工人和農民；而在蘇聯邊疆以外，就有數以千計為這運動而殉難的烈士，這個運動的戰士們以沉着的氣概和豁達的頭腦，正視着絞架、法庭和資產階級，這運動，是不會受這種誹謗傷害的。我們拒絕這種誹謗，並且我們將來進行工作時也決不利用這些手段。我知道尊敬的檢察處是會用別種語調的。這種誹謗表現在起訴書裏，起訴書把公社渲染成爲“殺人犯的政權”，而把發生奧戈瓦尼村和蕭弗克村<sup>①</sup>事變的那段時期視作“立即平靜下去的資產階級憤慨”。這種形容詞和“暴行”、“游蕩者”等名詞相形之下，自然相當含有詩意了。在另一地方，起訴書在涉及資產階級時，例如在講到“富人堂堂正正賺得的財產”時，說我們這些人竟企圖掠奪他們，

---

<sup>①</sup> 這是發生白色恐怖血腥事件的兩個匈牙利村莊。——編者

同時還威脅他們的生命，在這裏，檢察官先生又在替資本主義作歌頌的詩篇了。

國家檢察官先生認為在現社會秩序裏有一種必須用一切力量來保衛的理想。他相信在這個資產階級社會裏，可以找到文明最可靠的基礎和人類將來進化的條件。實際是怎麼一回事呢？在匈牙利，幾千個大資本家和大地主剝削着八百萬人民。在生產工具還是無業流氓的私有財產的其他地方，也同樣有剝削和壓迫；但無論在哪個地方，這種剝削和這種壓迫恰恰都沒有像在匈牙利那樣的厚顏無恥。在全世界，資本主義已瀕於衰亡。資本主義在任何地方都沒有發展，到處都是腐朽和衰亡。但這個過程在任何地方都不像在匈牙利表現得那樣清楚；在匈牙利，我們顛沛流連於貧困、窮苦、露骨的野蠻之中。而國家檢察官先生所認為可以實現社會理想的社會就是這樣一個社會！不，勞苦人民決不想領教這種“理想”！

國家檢察官先生要求把我們處以嚴厲的懲罰，因為我們危害着幾百萬人民的幸福。但資產階級所支配的、檢察官先生藉口爲了保護他們而反對我們的幾百萬人民在哪裏？在匈牙利，有一萬個地主，二千個工業家、企業家和大商人，兩千到三千個大規模走私的、唯利是圖的和投機的商人，這些成份的綜合就構成資產階級的概念。所以他們的數目最多也不過一萬五千到二萬人。現政權意味着幾千個剝削者對於幾百萬勞動人民的專政。相反地，如果國家檢察官先生想去考查一下蘇聯的無產階級專政，他就會證明蘇聯的無產階級專政實現了真正的民主，勞動人民的民主。列寧和蘇聯共產黨根據大多數勞動人民的意志替蘇維埃專政和蘇維埃政權奠定了基礎，真正的民主就是如此。這個

蘇維埃政權掃除了文盲，保證了並繼續保證着勞動人民永遠不斷增長的生活水平，把土地分給了農民，國家檢察官先生既然要反對這個蘇維埃政權，那末，他可以毋須再保衛人類文明了。能為發展和文明奠定真正基礎的恰恰就是這個政權啊！

國家檢察官先生把愛國主義頌揚了一番，而把國際主義拋擲在污泥潭裏。其實只有誠實的愛國主義和誠實的國際主義，只有一種能使勞動人民得到合理生存、自由和文化的愛國主義和國際主義才值得提出。然而愛國主義在匈牙利成爲統治階級自衛的一種藉口，且統治階級對於這一事實也毫不加以掩飾。在這個國家裏，自古以來，人和民族是兩個截然不同的概念。國家檢察官先生所一再誣蔑的所謂“蘇維埃帝國主義”，就是由愛國主義和國際主義兩者同時所構成的，因爲它在國內保證着勞動人民的福利、自由和文化，而在國際範圍內，它向全世界勞動人民表現出應該怎樣爲這個福利、這個自由和這個文化而鬥爭的典範。至於匈牙利統治階級的愛國主義究竟有多少價值呢？當匈牙利統治階級在背後給在進行鬥爭中的紅軍以打擊的時候，當它敞開國家邊疆的門戶去迎接帝國主義匪幫的時候，當國民經濟渴望“緊急支援”的期間，它爲了朱達斯的三十塊金幣竟不惜把國家的經濟獨立出賣給外國資本家的時候，我們已經看見了匈牙利統治階級的愛國主義的真面目了。今天，匈牙利勞動者的集會權和工會自由被剝奪了。普選是不存在的。沒有新聞自由。城鄉勞動者生活在極端貧困的狀態中。飢荒的死網正籠罩着失業的羣衆。這是顯而易見的：匈牙利的“愛國分子”只想要一個他們可以自由地掠奪和剝削勞動者的“祖國”。

國家檢察官先生譴責共產黨員玩弄革命的口號，而沒有拿出減輕勞動人民的痛苦的具體綱領。何等天真啊！實際上，共產黨是唯一為工人階級的直接利益認真而且徹底地鬥爭的黨。只有共產黨給工人以一個具有成功希望的鬥爭綱領。我想詳細敘述一番我們在匈牙利進行着的直接目標究竟是什麼。

我們首先要求必須保證給予城鄉勞動者合乎情理的工資。與戰前的生活水平相較，鋼鐵業工人的生活水平下降了百分之五十二。礦工已被棄於飢餓綫上，他們向布達佩斯進軍。同時，各種企業的總賬却結出空前的利潤，它的數額至今還無從知道。減少利潤和增加工資吧！這就是現狀所得出的邏輯，而共產黨人願意看到這個邏輯取得勝利。

可耕土地的大部分都在大地主手裏。埃斯德哈齊親王佔有十九萬六千畝，埃格基金委員會佔有九萬畝，卡洛斯薩的總主教佔有六萬五千畝，巴拉維西尼侯爵佔有五萬六千畝。而一百十萬農業工人則恰恰相反，連一小塊土地都沒有。我們要匈牙利像蘇俄一樣，把大地主的土地無償地，在沒有任何補償的情況下，分配給無地的農業工人和貧農。匈牙利共產黨承認，由於在專政期間它沒有分配土地，它就犯了嚴重的錯誤。我們看到土地分配在俄羅斯所產生的效果。在沙皇時代，俄國農民的生活只是徭役和痛苦。他們只能到酒店和教堂裏去找安慰。根據伊思文·納吉阿塔迪·薩蒲<sup>①</sup>的話，在匈牙利，世界上“最起碼的”土地改革由於大地主的反抗也歸於失敗了。在匈牙利，只有共產黨將來能夠分配土地。

---

① 他是匈牙利一九二〇年至一九二四年的農業部長。——編者

庭長(打斷他的話):不要自作預言家,拉科西。還是爲你自己辯護吧。不准進行宣傳,並不准鼓動對於現社會秩序的反抗。

拉科西(繼續他的敘述):在今天所謂“割裂狀態下的匈牙利”,社會秩序須由二萬七千以上的警察和憲兵來維持,而在舊時的“大匈牙利”,一萬六千人就够。“保衛秩序者”的人數如此增多,對於任何細微的示威行動也就過分地鋪張揚厲起來,這豈不是很自然嗎?否則怎樣可以自居爲祖國的保衛者,並且怎樣可以證明自己是絕對不可缺少的人物呢?這就證明了負責鼓動反抗的就是現社會秩序本身(它是大地主和大資本家利益的保護者),我們這批人可毋須來進行鼓動反抗的工作了。

我們綱領的初步要求之一是:以適當的失業補貼金給予失業者並以工作給予勞動者。當白歌公司宣告破產的時候,政府立刻調撥二千億供它備用,並且政府因此發生動搖,因爲大資本的利益需要如此啊!然而對於數十萬失業工人則分文也不給。如果我們爲了正式承認蘇聯並與蘇聯建立邦交而鬥爭,這是爲了要把工作給工人做,而政府則絲毫不爲無產階級辦事啊。

我們爲爭取公共自由而鬥爭。在匈牙利,無產階級遭到最殘暴的壓迫。既無集會權和工會自由,也無選舉權和新聞自由。社會民主黨通過它和貝特蘭<sup>①</sup>簽訂的協定,就把集會權和工會自由的最後殘餘都出賣了。加寶·霍羅韋茨在法庭的供詞裏作出了一套社會民主黨的理論,他宣稱

<sup>①</sup> 伊思文·貝特蘭係匈牙利政客,出身德蘭斯瓦尼亞貴族,自匈牙利蘇維埃共和國失敗後,就由攝政霍爾第指定爲匈牙利國務總理(一九二一年)。——編者



理論和實踐不是一致的東西。至於社會民主黨的實踐呢，埃特·赫貝爾在供詞中已經加以說明，他宣稱，由於當時所決定的條件，德國社會民主黨促使殺害卡爾·李卜克內西和羅莎·盧森堡，這是可以說明的，也是可以理解的。簡單地說，社會民主黨的理論是卡爾·馬克思，而他們的實踐則是古斯達夫·諾斯克。

我們所要求的是推翻現制度。共產黨依靠羣衆，要創造新的和更好的專政。我們既爲反對現存的過渡政權而鬥爭，我們也同樣堅決地爲反對哈布斯堡王室復辟而鬥爭。在我們看來，無產階級專政本身不是目的而只是達到最後目的的一種手段。到了沒有寄生蟲來壓迫工人的時候，無產階級專政將要消逝。直到現在爲止，在已有的一切社會裏，權力和暴力無非爲了維持階級統治並延長階級統治盡可能至於無窮而服務。無產階級專政所了解的暴力的採用是在世界史上第一次旨在消滅一切階級的統治，同時也要消滅無產階級的統治。實際上，人類真正的歷史，沒有暴力和沒有壓迫的歷史，僅在社會各階級將被消滅和沒有階級的社會建立起來的時候方才開始。

國家檢察官先生要求處被告以嚴厲的刑罰，以期以這刑罰做榜樣來使將來共產主義運動陷於失望。多麼奇怪的想法！國家檢察官先生難道不知道用懲罰的措施來消滅解放運動是從來沒有成功過的麼？難道他沒有覺察到正是我們，共產黨員們，我們是不怕刑罰的麼？實際上，政府當局自己也不相信它能够遏制共產主義運動。爲什麼警察當局要如此熱心地保護告密者呢？爲什麼警察當局不願這班特務到庭呢？理由顯然是將來還需要利用他們來對付我們。拉約斯·薩穆埃爾早已信譽掃地，而警察當局仍拒絕把他

交出。

國家檢察官先生稱呼所有共產黨員爲“流氓”、“游民”、以及其他只有上帝知道的名稱。這些侮辱無法損害我們的毫末，而且我以共產黨員整個尊嚴的品質，拒絕這些侮辱。數以千計的俄國共產黨員爲了解放無產階級的唯一目的而殉難。匈牙利共產黨員也爲了促進偉大的無產階級解放事業而同樣地犧牲了他們的生命。一九一九年三月，被拘於中央拘留所的四十六位共產黨員中，在一年裏，就死了十六位，他們是無產階級事業的殉難者。共產黨員爲他們黨而工作的時候，他們不怕一切，也不怕死。國家檢察官先生所視爲“流氓”、“游民”的人們，也就是說全世界的共產黨員，這些人以蔑視的態度看着絞刑架和監獄。在他們的忘我犧牲中，他們是工人階級的光輝榜樣。在我們中間，沒有一個人不是準備爲了共產黨和共產主義而犧牲的。我們決不能從資產階級那裏來獲得偉大精神的教育的。

國家檢察官先生曾以咆哮的口吻講到革命所作出的暴行。是的，革命不能用玫瑰花的香水來進行。有時暴行也發生了。然而讚揚奧戈瓦尼村和蕭弗克村的暴行的又是國家檢察官先生……

庭長：我禁止你談到奧戈瓦尼村和蕭弗克村。

拉科西：與匈牙利勞動人民所進行的具有重要意義的偉大門爭做比較，那末，這個法庭以顛覆活動來追訴我們的這一微不足道的、如此渺小的訴訟案是多麼沒有意義呀。

另外有決定性的、生死攸關的、頭等重要的訴訟案，這就是不幸的匈牙利勞動人民向匈牙利統治階級和全世界帝國主義匪幫進行着的訴訟案。

第一件訴訟案是從喬治·多熱<sup>①</sup>開始進行的。這是日益爲貧困所迫、不惜爲匈牙利人民事業而百孔千瘡，浴血負傷的、勤勞的貧農階級反抗那班逃避一切沉重的負擔，自五個世紀以來就和哈布斯堡王朝狼狽爲奸的大地主的訴訟案。匈牙利農民要求土地。如果沒有可分的土地滿足匈牙利農民的要求，你就要倒霉！

“你沒有聽過人們講到喬治·多熱麼？你把他綁在烙鐵的刑台上把他燒死了，然而火燄却熔化不掉他的靈魂。小心些吧；有一天，或許這殘餘的骨灰還將吞吃你啊！”<sup>②</sup>

第二件訴訟案是自一九一九年三月二十一日起，匈牙利無產階級反對外國帝國主義強盜的訴訟案，它是爲着民族自決權，爲着匈牙利獨立而進行的。你可以對我口誅筆伐，你可以十次把我押送到特別法庭，却不能阻止我宣佈：自一八四九年以來，一切匈牙利的當權政府所進行的對外政策都是極端反民族的和喪盡廉恥的政策。對內方面，統治階級在愛國主義的幌子下，壓迫少數民族的情況和壓迫匈牙利勞動人民一樣。對外方面，同一統治階級把國家出賣並供外國野心的宰割。自一八四八年以來，只有一次，即在匈牙利無產階級專政下，國家才有過真正民族的對外政策。匈牙利紅軍爲了抵抗捷克帝國主義者和羅馬尼亞帝國主義者的專橫貪婪而進行的鬥爭不是依靠吹牛，而是憑着紅軍的流血。蘇維埃匈牙利曾經拒絕了史末資將軍所提出的和平條件，雖然這些條件比特喇農條約的條件好些。

① 喬治·多熱領導了匈牙利農民反抗地主的一五一四年的暴動。——編者

② 亞歷山大·裴多斐的詩。——編者

法庭可以讀一下加羅里·胡斯柴爾或古斯達夫·格拉茲的書關於描繪紅軍戰役的片段。必須補充指出加羅里·胡斯柴爾是反革命勝利時代的國務總理，而古斯達夫·格拉茲則是外交部長；我絕不誇大地肯定說，即使在這些敘述中，法庭也可以了解，自一八四八年以來，蘇維埃匈牙利反對帝國主義強盜的戰爭是匈牙利歷史上最光榮的戰績。勝利的反革命勾結了羅馬尼亞人來反對我們，背信棄義地打擊我們如此光榮地進行着的偉大鬥爭。他們所勾結的不是羅馬尼亞人民，而是羅馬尼亞人民的劊子手，羅馬尼亞的地主貴族。對於特喇農條約，啼哭叫囂，穿着喪服，裝腔作勢，都是毫無用處的；即使自早至晚，不斷地叫囂着要維持領土完整，也是徒然的；依靠外國強盜、帝國主義分子、大資本家和大地主的幫助，我們絕不會從這偉大的戰鬥中取得勝利的。

第三國際第一屆大會對於民族自決權問題採取了立場。一九二〇年第二屆大會已經宣佈必須由勞動人民和勞動人民間的合作來撕破凡爾賽、聖日耳曼和特喇農條約。第三國際第五屆大會曾經宣佈：在匈牙利和舊奧匈帝國周圍的帝國主義國家裏建立起來的共產黨應該向捷克籍、羅馬尼亞籍和塞爾維亞籍的共產黨員提出民族自決的口號，而它們參加這屆大會的人甚至還可以進一步要求領土的分離。任何其他的辦法都是欺騙的辦法，或是新災難的根源。只有通過鄰國革命工人階級的合作，通過反對這些國家帝國主義者的鬥爭，我們才能夠突破特喇農條約並把英法帝國主義者在特喇農強加於我們的廢紙撕得粉碎。我們，匈牙利共產黨員，驕傲地宣佈，在解放農奴問題的範圍內，我們是一八四八年革命遺囑的執行人。我們也同樣驕傲地宣佈：在匈牙利，只有在共產黨領導下，依照第三國際所指

示的原則，一八四八年革命要求從外國的桎梏中獲得解放的事業才能實現。

第三件訴訟案是五百年以來，匈牙利勞動人民所進行的訴訟案；在這訴訟案的過程中，統治階級或者始終採取了反對勞動者的立場，或者在劇烈爭執的時候，在背後打擊他們；這個訴訟案就是反對哈布斯堡王朝的訴訟案。在匈牙利，不知道多少污點，多少鮮血和多少貧困都是和這個外國王朝的名字聯系在一起的，對於這個王朝的各個不同方面，恕我不再在這裏發揮。但我却認為：雖有一九二一年的廢黜法案，伯爵們和高利貸者們，最高財閥和社會民主黨仍膽敢推動哈布斯堡王朝的車輪，而在匈牙利，人們把那些不敢說“蘇維埃共和國”，而僅敢說“資產階級共和國”的人投入監獄，這才是匈牙利的奇恥大辱和最大的不幸。

第四件訴訟案是反革命勝利後勞動人民反對現政權的訴訟案。國務總理貝特蘭在他最近一篇演說裏說：我們正處於革命精神和反革命精神的鬥爭。對於這一點，我所採取的看法未必比國務總理更激烈些。我同意他所用的術語。匈牙利勞動人民受着革命精神的鼓動，統治階級則為反革命精神所滲透。現政權為大地主和大資本家的共同利益而服務。為革命情緒所鼓舞的匈牙利人民，在共產黨領導下，為了反對這制度而進行鬥爭。這是一場偉大的戰鬥；為了取得勝利，所有匈牙利共產黨員都準備犧牲他們的生命。為什麼？勝利的反革命曾答應大規模土地改革。它竟背棄了這個改革的諾言。勝利的反革命製造了特喇農條約和經濟上的“緊急支援”。由於這個“緊急支援”，它不僅出賣了國家的主權，並且把匈牙利人民拋在無可倫比的貧困深淵中。由於這個“緊急支援”，它把不可忍受的負擔，比

截至目前我們所知道的一切負擔更要沉重的負擔拋在勞動人民的肩上。

在匈牙利，公共自由從沒有像目前這樣專橫地被踐踏於腳下。貧困情況也從沒有像今天這樣殘酷的。在尤拉茲洛王<sup>①</sup>的時代，勞動者窮到這樣地步，以致他自己拉小車。歷史保持下“尤拉茲洛小車”的紀念。今天，人們赤着腳在布達佩斯走路。這是從未見過的事情。這個政權自以為恢復了財政，它徒然自詡了一陣；我寧願做一個錯誤的預言家，但王家重刑法院將要看到歷史也將保持着“貝特蘭鞋”的紀念啊。

革命精神正在匈牙利日益擴大中。一個真正的人民革命運動正在誕生。站在這個人民運動的前列，這是共產黨的義務。這是共產黨的歷史任務。芮諾·拉科西<sup>②</sup>在三月二十一日的社論中甚至說“目前情勢一似河水溢出河床，簡直是真正的洪水氾濫”；在這時候，如果有人相信通過種種迫害，就有辦法遏制這個滿懷勇氣、以原告和審判員的姿態在這一訴訟案中周旋的黨，遏制這個在這戰鬥中以培養能幹的領袖獲得最後勝利為其歷史任務的黨，那就錯了。

第五件大訴訟案在表面上沒有前四件重要，這是最近時期匈牙利勞動人民反對社會民主黨的訴訟案。這個黨是當地唯一合法的工人黨。自從它背叛了無產階級專政以後，它有時公開地、有時秘密地站在反革命統治階級的立場為反革命統治階級服務，並在一切可能範圍內向無產階級

---

① 匈牙利國王(一四九〇年——一五一六年)。以喬治·多熱為首的農民暴動就在他統治期中發生的。——編者

② 保守派的記者(一八四二年——一九二八年)，當時任政府機關報“布達佩斯日報”的編輯。——編者

進攻。在反革命初期，它竟嗾使自己的部長們來執行絞刑。它對拘禁既沒有提出抗議，而對簡易的司法程序却表示贊成。通過了它和貝特蘭總理的妥協，它等於向反革命呈交了信譽證明書。它把農業工人和鐵路工人的工會自由當做討價還價的本錢並予以出賣。正當反對在財政上取得“緊急支援”的時候，它却締結了協議。它用卑鄙的手段從背後打擊為“人民之聲報”<sup>①</sup>而鬥爭的排字工人。它和正統主義者以及臭名遍於全國的騙棍們狼狽為奸結成所謂“民主集團”。它限制了並限制着工人階級的一切主動性。社會民主黨每天所犯的罪行多得難以列舉。毫無疑問，工人們對於這個黨所表示的憤怒和厭惡正在不斷增長中。儘管社會民主黨騙子們的種種告密，種種恐怖行動，種種鬥爭的偽裝，訴訟案將以他們的失敗而告終。

你對於第六件訴訟案好像完全不知道，這是匈牙利勞動人民在匈牙利反對所謂“獨立”的審判員，反對憲兵和警察，反對簡易程序法庭和特別法庭，反對奧戈瓦尼村和蕭弗克村的屠殺，反對絞架和殺人的子彈，甚至反對社會民主黨，為着負有解放工人階級的真正革命的黨，即是為着合法的共產黨而進行着的偉大的地下鬥爭。這一爭取合法性的鬥爭，在歐洲任何國家，無論鬥爭的規模大還是小，勝利終歸於勞動人民。不要認為匈牙利是另一個星球，從而這一鬥爭會在匈牙利遭到窒息。不，一千個不。革命精神雖遭受種種迫害，仍在不斷增長中。這一勞動人民有着如此英雄的革命傳統，不為反革命所橫加的種種艱苦所屈服，為了民主的萌芽——普選——而作出了如此多的無結果的犧

---

① “人民之聲報”是社會民主黨的機關報。——編者

牲，並受社會民主黨如此卑鄙無恥的背叛，這人民深切知道共產黨在匈牙利須完成它的使命。這人民既然知道這一切，統治階級雖對共產黨橫加污蔑，視共產黨為盜匪和叛逆分子也是枉然；共產黨既然為着能在匈牙利公開地說話像在其他國家中的共產黨所說的那樣，展開了生死的鬥爭，這一鬥爭，這人民將決不放棄。

庭長：够了，拉科西！進行你自己的辯護吧！

拉科西：檢察官先生要求處我們以嚴厲的刑罰，因為照他的意思，共產黨員是匈牙利幸福的威脅。在這個國家裏，幾千個反動的大地主和大資本家壓迫着和剝削着八百萬人民。反革命已使匈牙利陷於乞丐狀態。如果我們相反地瞧一下檢察官一再辱罵的蘇聯，我們看到，在那國家裏，生活條件正不斷改善……

\* \* \*

庭長早就有些不耐煩的樣子。拉科西最後的幾句話使他十分狼狽。他驟然起立，中止了拉科西仍擬繼續敘述而終被他阻撓的發言。於是拉科西表示了蔑視的姿態，向後轉，歸於原位。

這好像是原告離開了原告席。拉科西在法庭面前，代表着被拋置於貧困和毀滅中的匈牙利人民，為着匈牙利的自由和幸福，向霍爾第和匈牙利反動派進行了鬥爭。

“新三月”，一九二六年七月——八月號，第四三五——四四四頁。

一九二六年八月三日“真理報”。

一九二六年八月三日“消息報”。

蘇爾坦·華斯：“獄中十六年”，第一五二——一五五頁。



## 獄中書信

(一九二七年——一九三四年)

我們把拉科西同志在八年半被囚期間所寫書信的若干片段發表在這裏。在他寫給他的兄妹的信中，證明了資產階級牢獄的一切痛苦滋味均未能片刻影響他的不可動搖的信念。我們發表這些不完整的片段，不加任何註解；它塑出了一位卓越的馬克思列寧主義革命者的形象；即就這些片段本身而言，它已具備感人的力量，足以向全世界勞動者昭示出：若要營救這樣偉大的革命者，加緊國際團結是有必要的。

### (一)

……我在公審前夕費里寄給我的信中獲悉了母親逝世的消息。吉璇想到我已經够煩惱了，準備嚴守秘密，不加洩露。我聞耗後深感悲痛。原來這幾天我還遭受着其他許多憂愁的打擊（伊思文·納墨茨已於一月二日被殮葬了。他是年方二十四歲的木匠，患肺結核症死於監獄醫院。他病在危篤時，當局始終拒絕釋放；可是在判決尚未確定的二十二個月有期徒刑中，他已渡過了十五個月），我已有幾個整夜不能入眠了。因此，我不得不收拾我的一切力量，務使對於我們的庭審能照常進行，在這方面終算圓滿成功了。

一九二七年一月十八日於布達佩斯。

## (二)

……我也滿想給各個人一一回信，可是，你看，必須照自己的條件辦事啊。人們向我保證在兩三個年頭以後，我歡喜寫多少信就可以寫多少信。（長期監禁的刑罰似同婚姻，只有初期的七年難熬。）光陰過得快，至多還剩七年了；最近以來，帕利說英語已經更流利些了……

我也在涉獵蘭根晒特編的英語讀本，如果我不貪懶的話，八月一日我可能結束。以後我要讀法文了。如果我知道在獄裏有多長時間的話，我想學習幾種外國語，例如中國文和印度文。原來我發現我的頭腦永遠處於被動的吸收地位。可是我希望不再有多餘時間來搞這些。我搞哲學搞了六個多月，心得不太多。目前我將以沉着和忍耐的精神，瞻望着將來……

一九二七年三月十六日於布達佩斯。

## (三)

……我讀到你因為我信中所反映的爽快明朗的氣概而歡欣，我不由得笑了。你知道有時我大發憤怒——你可以想像得到在這裏不乏使我大發憤怒的原因——在我的信中也可以覺察的。但總的說來，我却“模範”式地忍受鐵窗風味和其有關的一切。我曾經和好幾個囚徒被拘在一起，我知道要是別人處於我的地位，就要以頭顱撞壁了。所以，我的信中有時流露出一種輕微的焦躁情緒，望你不要憂慮。至於我的健康情況則一如往日；最近幾星期來，我睡眠情況不太好。尤其是有許多事故使我不能安眠。現在情勢開始好轉，我的睡眠也可以好些了。我可以說，就一般而言，我保

證還活十五年。我不願誇張，正因為如此，我也不多說。

……至於蘇聯的情況，你已能在我的二十五日信中指出，截至目前為止，我都熟悉。可是現在事物變化得那樣快，我的渴望剛滿足，而缺乏消息的最痛苦的情況又出現在我的面前了……我於學習語言以外，還有其他讀物。我又獲得批准可以寄來幾本書，例如奧斯瓦爾德·斯賓格勒著：“西方的衰落”的增訂版，這部書真是奇怪的衰落徵兆啊。當局還沒有把判決通知我。我想下星期總可以的。至於目前，究竟判決將嚴厲到怎樣程度，我却盲然無知。我想我不會被轉解到省裏去，然而這也未始不可能。這倒要使我失望。如此，我寫信將要每月只有一次了……末了，七月三日將是克拉拉·蔡特金的七十壽誕，請你把以下幾句祝詞轉達給她，可以嗎？……我還沒有收到雷克郎—陶克尼茨的書目錄。

一九二七年六月十八日於布達佩斯。

#### (四)

……你的文章已被發表，我很高興。你如果需要我這方面的鼓勵，那末，你要多少鼓勵，我就給你多少鼓勵。我太懶了，未能多寫信給你，這是唯一憾事，至其他憾事却不多。我的願望之一就是我有寫信的可能時，我將多多寫信，但這些願望也不多……至於你所傳達給我的經濟消息，我已經寫信告訴你：這是使我關切的好消息，尤其是關於對外貿易的數字和關於得到在英國撤銷的訂貨的國家名單等。這最近三個月來，我有戰爭爆發的“恐懼之感”。這“恐懼之感”說明我害怕衝突萬一發動，而我仍在監獄，行動的期望真使我難熬。但我想這一戰爭明天還不致就發生。總之，

顯一下拳頭也是一件好事。

一九二七年六月二十三日於布達佩斯。

(五)

……蘇爾蒂的消息使我很感興趣。如果他把有關經濟的問題寫信給我，希望盡可能指出數字。在你那裏，常有含有興趣的經濟消息，例如：兩個月以後，我將特別注意到收穫的數字。我很想知道哪些是取得在英國撤銷訂貨的國家。我也喜歡知道拖拉機的數字，紡織業經過的情況等等……至少能熟悉一些經濟情況。我沒有忘記克拉拉的誕辰，請你告訴我：你把我的信怎樣寄給她或交給她的，以及她對我的信所表示的歡迎情緒怎樣。一九二一年春季，在一次緊張的會議中，由於我的攻擊，保羅·勒維辭去了黨的主席職務，在那個時候我認識了她……

親愛的吉璇，……我想當局已把里托克的診斷書告訴你了。總之，我對他所簽發的文件不予重視。這件事也是作為政治問題而處理的，所以我看待它的結論，也持以懷疑的態度。至於您所信任的醫生，當局就禁止他來向我進行檢查，這一件事就說明了一切。此外，關於我的健康情況，我感覺得既不更好，也不更壞。在我這方面，我盡一切可能來恢復我的身體，如果成績不大，這不是我的過失。我遭受着的更嚴峻的待遇以及你已知道的監禁情況在在不足以平復我緊張的情緒。可能下星期會發生某些變動……

馬加斯

一九二七年七月七日於布達佩斯。

## (六)

親愛的蘇爾蒂，我欣幸地收到了你的五月二十八日和六月三日的信：這兩封信都使我非常高興。你在等待着我，在你方面的誠意是太可愛了。你也經歷過同樣的情況，而且你知道我們在神經上是够緊張的。因此我要求你對我說或至少對吉璇說：究竟關於交換的謠言——從各方面向我傳來的謠言——是可靠的麼？你是很知道的，自從我被捕以來，年年至少有兩三次確切程度不等的交換計劃甚囂塵上，繼而又沉寂下來。我要求從正面看待事物，我這次也想知道究竟現在我所處的地位如何。當局把我的書發還給我了，現在又重新作為我的讀物了。去年我曾經要求給我一本類似在蘇聯中學校裏採用的，最好有插圖的蘇聯地理教科書。如果你沒有其他事情要做，現在就把這本書送到我這裏吧。我獲悉了你的情況後很感興趣，也很高興。在我處於動彈不得的時候，我至少能以知道別人順利前進而引以自慰。而且在這可怕的孤寂單調的生活中，使你思想變動的一切，可以使你高興。在這一點上，你給我關於你夫人的消息也是很可喜的……費里還沒有給我回信，你已經把我的信交給了他嗎？關於我的事，吉璇將要寫信給你。因此，我願意告訴你：我的生活情況就是如此這般而已。請向一切熟友致意並繼續經常地把他們的消息告訴我。祝你、你的夫人、小孩和費里一切順利。順致敬禮。

馬加斯

一九二九年六月十四日於瓦克

## (七)

親愛的米克羅斯和蓓拉，我對五月二十八日米基給我的信表示謝意，他的信使我非常高興。同時，你一定收到了我在五月二十四日寫的信……我獲悉蓓拉已經把縫針工作調換了滾珠軸承的裝配工作，我舉起假想的呢帽向她脫帽致賀。你呢，你怎樣會脫離“明星”工廠的？究竟你將於冬季或秋季恢復你的職位呢，或必須另找新的職位呢？我很想知道蓓拉賺多少錢，從工資水平的觀點來看，這是值得使我關切的事。據我所知，“雪鐵龍”的連續操作法是很單調，很使人疲勞的，蓓拉不致因此太疲勞過度吧？我僅從照片上認識了你的姨妹博里斯卡。是不是她首次去巴黎？或許她曾經到過巴黎吧？一想到巴黎，我覺得我的被囚生活比較平常雙倍地沉重起來。只好認晦氣，但事情將不會一成不變的，至於現在我呢，我繼續與艱苦作掙扎而已。祝你們大家一切順利。順致敬禮！

馬加斯

一九二九年六月十四日於瓦斯。

## (八)

……我讀了你的來信，很感興趣。看到你的文化生活計劃，我只得發出一聲長歎：在這裏我也不缺乏對於歌劇院、電影院的強迫訪問啊！（在這裏，人們把牢房稱為“電影院”。）關於生產和技術的數字以及數字所指示出來的專家進步的速度，我知道得够多了。上半年度的統計已經發表了，你能不能使我知道些若干詳細情況？不要忘記鐵路方面的資料。我希望六月的雨將大大地有利於收穫。你知

道，我從沒有看見五月份有這樣多的雲。望你告訴我牲畜的價格是否已經停止跌落了……你慶賀我健康的信適和我的信交叉了，在我的信裏，我告訴你如果長此下去，我將成爲無用的廢物。我曾對此點反復想過，但我仍堅持我的意見，雖則我繼續獲得好的睡眠……有了你那樣的心臟，還有什麼不行呢？你知道，在我這裏，主要的毛病就在心臟方面。由於心臟病，如果我一次睡眠不好，我的神經就衰弱到這樣不值一文錢的地步。但這些怨聲也够了……

一九二九年六月二十四日於布達佩斯。

### (九)

……我接到馬丁·安德遜·聶和六月十八日的圖畫明信片今天已有三個月了。可愛的字句使我很高興。我在這張明信片中驚奇地發現了亨利·彭托皮童也向我致意起來。我以爲彭躲在他的象牙之塔裏，靠着諾貝爾獎金，安富承榮，既潛心於心理形象的彫塑，對我這樣疾癘纏身的囚徒，當吝不予以同情了。因此，我格外覺得快樂，我請馬丁老向他轉言：他的關切使我很欣幸，我也向他致最懇切的敬意。我友安德遜邀我到丹麥去一趟。請你向他說明：首先我必須從監獄裏釋放出來。請你把安德遜的健康情況告訴我，並以我的名義，對於他的明信片和他的可愛的盛意，表示我的熱烈的謝忱。如果一切不是這樣的複雜，這樣的不可靠，我早就寫幾句友好的德文語句直接寄給他了……

“斧頭和鐮刀”，一九三四年十月一日。

## 獄中生活

蘇爾坦·華斯

一九二八年一月十日星期二

拉科西也從牢房裏出來。他住在第三組，擔任縫衣廠的抄寫員。監獄長下令監視他好像保護他自己的眼珠一樣。監獄長既下了這命令，連拉科西所呼吸的空氣大概也要先經過檢查了，這是可以深信無疑的。但是，監獄長錯了！我們共產黨員決不是一味消極，甘願服從監獄紀律的。我們利用任何細微的漏洞來增加對外的聯系。今天很多監獄長所認為不准許的事情都成爲可能了。我們能不時得到報紙，收到來信，甚至食物。

當然，拉科西已經遭受了監獄的折磨，但表面上他依然堅持下去，保持着健康，態度也很鎮靜。他享有崇高的威信，警衛看見他來，在遙遠地方就向他致敬。其他囚犯脫小帽向他致敬，有時監獄長看到，他就大發脾氣。

一九二八年十一月三十日星期五

昨天晚上，一位苦役犯帶着腳鐐手銬，死在黑牢房裏。人們長時間聽到臨死者的慘叫。當時，他的鄰居用拳頭敲着門求救。值日獄吏沒有解脫臨死者的鐐銬。

這個苦役犯是被監獄長暗殺的。他曾在監獄的倉庫裏工作。他發現了監獄長的舞弊並且當着監獄長的面而發現



的，這就是他所犯的罪行。

然而監獄長不是正式的暗殺犯，他只執行他維持“紀律”的權利罷了。

一九二八年十二月四日星期二

闖下禍了：拉科西寫了一篇關於苦役犯被暗殺的文章。他還沒有時間寫完就在暗中把它遺失。人們偶然搜查他的牢房，就發現了文章的草稿。

監獄長立刻傳見拉科西。獄長大喊大叫，要拉科西向他“道歉”。

——你竟敢寫出我是暗殺犯、竊賊！立刻向我道歉！

拉科西堅決地聲明他維持他原有的表示，決不變更。於是，監獄長就下令送他到黑牢裏去。

繼而監獄長傳見了我。我裝做對此事完全不知道。監獄長盛怒高聲向我敘述事情的內容。他不時把眼鏡摘下、帶上，高聲問我道：

——你以為怎樣？你們著名的共產黨領袖原來是一個誹謗者。如果你袒護他，你也是破壞名譽犯了！

我用閃避方式來應付這些挑釁。我要避免監獄長在狂怒之下，向我尋釁，也把我送進黑牢，從而使我無從幫助拉科西。監獄長用威脅的口氣喊道：

——如果文章發表出來，拉科西對這事決不能擺脫。

他不知道他所搜到的手稿只是一張草稿，文章根本就沒有越出監獄一步。

我是知道這一切的，我鎮靜地向他答覆道：

——如果你把拉科西從黑牢裏放出來，文章將不再發表。

——你要和我討價還價麼？——監獄長紅着臉說道。  
然而，他的眼睛已經神采煥發，表示有希望避免文章發表後所引起的麻煩。

他拿起電話聽筒下令道：

——把拉科西送到工作室去！

當時，一切好像沒有經過什麼似的，對於整個事件，大家隻字不提。但毫無疑問，共產黨和監獄長之間正進行着劇烈的鬥爭。羅斯德克博士不是使人容易忘記的人啊！

因此我們必須很謹慎。警衛有兩百人而我們共產黨員統共只有五個。

一九二八年十二月二十日星期四

拉科西的生命直接受到了威脅。

我們知道監獄長要找適當的時間來報復。他統共等待了兩個星期。

監獄的職員們放出風聲說：拉科西把監獄長視作竊賊和暗殺犯，而監獄長竟不敢虐待他。監獄長大怒若狂。他藉口拉科西非法通信和破壞名譽，就下令把他禁閉黑牢三個月，並須睡在板牀上。他也下令在整整一年內，要對拉科西取消一切優待。

這種紀律性的懲罰是異乎尋常的殘酷，簡直是喪盡天良的暗殺企圖！

我立刻通知我們的聯絡員：我必須和律師談話，因為這將危及拉科西的生命。

一九二八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星期五

當我在逃避了警衛的監視的時候，我寫了一個報告給

黨，敘述了經過的一切情況。可惜這封信須待後天才能出去，並且有誰知道什麼時候我才獲得回音？

一九二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星期六

律師來了。但他沒有取得和拉科西以及我接談的批准書。監獄長有計劃地要割斷我們和全世界的聯系。

一九二八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星期日

我用走私方法寄出了一封信。一位特別通信員要帶這封信從布達佩斯出發，去交給我們黨在國外的領導們。我焦灼地等待着回音。如果同志們不能及時干涉，拉科西就完了。

我經常和拉科西保持着聯系。他的字跡看了令人驚駭，簡直是老人寫的字。他的手大概被凍得發抖了。

我想匈牙利天氣寒冷莫過於今年了，寒暑表已降到零下三十二度和三十五度。黑牢冷得像冰箱一樣，拉科西只有一件襯衫和一套苦役的囚衣。

一九二八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星期五

同志們已經收到了我的信。中間人通知我：外國報紙對於準備危害拉科西生命的罪惡企圖發表着長篇文章。

一九二九年一月一日星期二

新年了。問題不在於知道我們能否看到一年的結束，問題在於幾天以後，我們是否還活着。

一九二九年一月二日星期三

回音來了。中央委員會收到了我的信。它將用一切方法來幫助我們。

我立刻把消息傳給拉科西，他照預定計劃立刻開始絕食。繼而我要求見監獄長。我向他宣佈：奧里、尤阿澤和我，爲了爭取拉科西從黑牢裏出來，要求司法部來一次調查並清除監獄中存在着的黑暗情況起見，我們和拉科西採取一致行動，我們也開始絕食。

立刻，人們把我們都送到黑牢。我們每人在黑牢中被禁閉一月，睡在板牀上，全年取消一切優待，作爲紀律性的懲罰。

一九二九年一月三日星期四

我把兩臂伸開，就可用手摸到我的墳墓的四壁，如果把我活葬在那裏，兩腳挺直就可以超出我所佔的整個空間。陽光從不透入這裏。不透明玻璃的氣窗，圍上一批鐵欄，外加一層鐵絲網，只讓一絲微弱淡灰的光綫透進來。到了中午，我還是被黑暗所包圍，好像我的眼睛上蒙着一層眼翳一樣。

天氣很冷。在水泥地上實在無法睡下或坐下。從早到晚，我蹲踞在牆角或踱來踱去。

飢腸轆轆，原來我沒有吃已經二十四小時了。

一九二九年一月五日星期六

嚴寒逼人。時間計分、計時、計日而逝。還有幾天呢？警衛每三十分鐘換班一次。否則他們將無法忍受寒冷。在匈牙利，自古以來，從沒有像今天這樣，零下三十五度。

冷得可怕，我無法忍受下去了。

飢寒交逼，兩腿勉強地把我們的身肢支撐住。儘管如此，只要我們一息尚存，我們就不斷向他們喊出這個最後抗議的呼聲：

——止住！我們所剩下的唯一武器就是我們的生命。來取吧，來取我們的生命吧，這是我們所能給你們的一切。但你們休想要拉科西的生命！

一九二九年一月八日星期二

絕食第七天了！我連蹲踞在牆角的力氣也沒有了。頭向前，我經常墜倒在地上。但我克服着我的脆弱而自勉道：

——必須堅持下去！勇敢些，蘇爾坦！

我知道如果我們不能從這鬥爭中獲得勝利，監獄長和監獄生活終將結束我們的生命。但如果我們堅持如常，不僅勝利能使我們脫離目前我們所處的危險環境，而且我們將要取得以下保證：從今以後，這個卑鄙的強盜羅斯德克將不能再進行他的醜惡勾當。

一九二九年一月九日星期三

絕食第八天。我全身燒得發抖。逼死我的不是飢餓，而是可怖的寒冷。

一九二九年一月十日星期四

昨天，下午一時前，監獄長低着頭，臉容尷尬，走進我的黑牢房。

他剛開口，我就已經知道我們取得勝利了。

首先是一大堆謊話。他企圖使我們相信他所進行的旨

在勸我們停止絕食的談話純粹出自“慈善”的動機。

但我不受他的謊話所迷惑。

我知道如果他來談判，這是因為他的上司下令要他這樣做。監獄長徒然一再反復引申他的論據，我堅持要求拉科西必須從黑牢裏釋放出來，作為我們放棄絕食的條件。

勝利！監獄長讓步了，他宣佈他同意滿足我們的要求。

一剎那間，勝利恢復了我的體力。我以結實的步伐跨進走廊並且喊道：

——絕食結束了。

紀律監沉寂如死，最輕微的聲音也足能驚醒大家。同志們聽到了我的號召。牢房的門一扇接着一扇地打開了。各人都接受吃一碗麵漿湯。

拉科西已經睡在溫暖的醫院房間裏的一張鋪着草墊的牀上。他依然是苦役犯，像昨天和前天一樣，可是他已經有了繼續生存下去的希望。

他是被勞動人民偉大的兄弟般友誼、團結所拯救的。

已經有多少次了？

蘇爾坦·華斯：“獄中十六年”，第一七七——一七八頁和一九八——二〇三頁。

# 人民委員拉科西的訴訟案

(一九三五年一月二十一日至二月九日)

匈牙利公社案在進行着。

一月二十一日布達佩斯馬柯街的法庭有大隊的警察守衛着。大廈的走廊裏，佈滿了警察和偵探。匈牙利法西斯的“司法”只有在大批警察保護下才敢處理馬加斯·拉科西的案子。

陪審委員會的大廳裏擠滿了國際報紙的代表、律師、法學家和工人們的代表；他們是從巴黎、倫敦、維也納、布拉的斯拉發(即普累斯堡。——譯者)等地來的。在這裏，人們會看到兩位蘇聯公使和蘇聯新聞處的維也納籍隨員；他們帶有譯員，以極大的注意力來觀察辯論。

我們看見馬加斯·拉科西坐在被告席上。

他的兩旁和背後，佈置了手持步槍裝上刺刀的警衛，一位在十年苦牢中身體遭受嚴重折磨的人竟需要三位武裝人員來看守他，這是值得注意的事。

法庭是肅穆的。所有旁聽的人們都被眼前進行着的一幕決鬥所吸引住了。在柵欄的一邊，法庭庭長陰險而高傲，徹底了解資產階級所交付給他的任務。他高高在上，不動聲色地操縱着一切成文或不成文的法律。在柵欄的另一邊，馬加斯·拉科西，雖然曾在監獄裏度過十年的鐵窗生活，仍然是勇敢的、富有攻擊精神的、資產階級的敵手；這

簡直是一幕有聲有色的決鬥，典型地代表着兩個社會階級的兩個人之間的決鬥。在拉科西案公審中，資產階級所進行的是一個歷史性的訴訟案，在使一九一九年光榮的公社和匈牙利第一個蘇維埃共和國受到司法的審判。

庭長開始“審訊”拉科西了。他向拉科西提出了一些瑣碎的小問題，對於這些問題，在事隔十六年之後，已不可能作出準確的回答。正是想以這樣的手段逼出他對於“共謀”和他“積極參加”的罪名的“招供”。

拉科西以一個真正革命家的不可動搖的堅定性，表明了他對匈牙利公社的忠誠。對於瑣碎的審問，拉科西直率地拒絕作答。

在整個公審的過程中，庭長不斷對他脅迫。他極力用威脅和制止他發言來恐嚇拉科西。然而，拉科西却以千錘百鍊的人物——季米特洛夫式的不可動搖的鎮靜和諷刺來回答他。

通過這些訊問和答覆，人們可以看到，一個真正的革命家的生活刻畫出來了。這些訊問和答覆，使一九一八年革命，接着在一九一九年三月二十一日誕生的匈牙利無產階級專政，匈牙利工人們反抗從各方面圍攻他們的帝國主義軍隊，反對反革命分子匪徒的英勇鬥爭等種種事變又復活在眼簾……在布達佩斯法院的大廳裏，人們又重新看到這齣歷史劇的演出，但這齣歷史劇的結局還沒有到來。

結局之所以沒有到來，是因為一九一九年三月二十一日鬥爭標誌了一種勝利的突進。這是無產階級爭取政權的鬥爭；今天它正無間斷地進行着，並將繼續進行直到最後勝利。

在布達佩斯法庭上，正掀起了這鬥爭的一次重要戰役。



難道只是在法庭上進行着鬥爭嗎？鬥爭正在全世界進行着。因為所有世界上的工人都要求“釋放拉科西”！各國的工人們都站在拉科西一邊，打擊着法西斯主義的血腥魔鬼。工人們的抗議從世界的各個角落紛至沓來。

全世界的工人們都以全力注視着辯論。他們以一種積極的鬥爭來支持馬加斯·拉科西的反法西斯鬥爭。資產階級本身也被迫承認這種鬥爭的英雄性質。沒有一家資產階級報紙不對拉科西案作詳細報道的。很多報紙不得不對敵人表示尊敬，承認了他的偉大勇氣。但那些公開的法西斯報紙，由於它們深切感覺和知道，在法西斯的血腥法庭面前被審訊的拉科西是匈牙利無產階級的旗手，從而對他表現了極端的憎恨。

這是在季米特洛夫案以後一件新的轟動國際輿論的關於共產黨人的大案，試問哪一個社會階級在它的隊伍裏有着如此多的英雄，如此多的勇敢人物，連敵人也不得不表示尊敬和欽佩呢？

只有共產主義在其鬥士中有着季米特洛夫、拉科西、撒萊和弗爾斯特這樣的人物。

拉科西案繼續着。公審的日期將至少要繼續兩個星期。我們應當利用這時機，進行一次激烈的戰鬥。我們要和拉科西一起鬥爭！團結我們的一切力量來拯救拉科西！

一九三五年一月二十七日“工人報”。

## 拉科西的審訊記錄

(一九三五年一月二十一日)

芮諾·塞瑪克庭長於一九三五年一月二十一日早上九點鐘開始了馬加斯·拉科西案的公審。

塞瑪克庭長：我宣佈公審開始。法庭將要審訊因謀殺和其他罪名而被控的馬加斯·拉科西刑事案。法庭將適用一九一九年部長會議宣佈的四〇三九號命令所制定的簡易程序。

今天被傳詢的人有被告馬加斯·拉科西……

拉科西：有！

庭長：……見證人戴尼斯·貝靈蓋……

戴尼斯·貝靈蓋：我在這裏！

庭長：巴爾那·蒲柴……

巴爾那·蒲柴：我在這裏！

庭長：厄爾諾·巴洛奇……

厄爾諾·巴洛奇：有！

庭長：還有，若諾·瓦斯……

執達員：庭長先生，若諾·瓦斯沒有出庭。

庭長：是，他沒有到庭。他曾交來一份外科醫生開的證明書，證實他不能來。

我現在開始審詢被告的身份。我希望旁聽席遵守秩序並保持安靜。

馬加斯·拉科西到庭上來!(拉科西出現在庭前。)

你叫馬加斯·拉科西,你父親的名字叫什麼?

拉科西:約瑟夫·拉科西。

庭長:你母親呢?

拉科西:塞西里婭·李德萊。

庭長:你是一八九二年三月九日出生在阿達的嗎?

拉科西:是。

庭長:你信什麼教?

拉科西:我沒有入過教。

庭長:什麼職業?

拉科西:僱員。

庭長:沒有結過婚?

拉科西:是。

庭長:你有什麼教育程度?

拉科西:新制中學畢業,後來在東方商業學院。

庭長:你服過兵役了嗎?

拉科西:服過了。

庭長:你有動產和不動產嗎?

拉科西:沒有。

庭長:你享有正常的收入或其他收入來源嗎?

拉科西:我在監獄裏已超過九年以上。

庭長:你在什麼時候恢復過自由?

拉科西:現在,或者應當更早些,因為我已於去年就完成了八年半的監禁了。

庭長:你是按一九二一年第三號法案被判的,在什麼時候?

拉科西:我於一九二六年八月五日被判八年半監禁。

庭長：因此，你已經服滿了這個刑期，在那期間，這個刑期的執行是有效的。你是因這次案件而於一九三四年四月二十四日被拘留的嗎？

拉科西：是的。

庭長：我要證人們注意偽證的法律後果，你們必須要說實話，並且必要時準備宣誓。現在，我請你們離庭。我要一個一個地傳喚證人。（證人們離開了法庭。）

\* \* \*

庭長：站起來，馬加斯·拉科西。守衛的人仍可以坐着不要動。（拉科西走到被告席。）

庭長：你懂得了對你的控告嗎？

拉科西：懂了。

庭長：你承認你有罪嗎？

拉科西：我不承認我有罪。

庭長：你出生於阿達。你的雙親曾經是小商人。一九一〇年，你在塞格德中學畢業，以後你來到布達佩斯，你進了東方商業學院。

拉科西：是的。

庭長：一九一一年和一九一二年，你曾經是伽利略俱樂部的會員和書記。一九一四年世界大戰爆發，你又參加了步兵第六團。一九一五年，俄國人把你俘獲了。

拉科西：對。

庭長：那末，現在請你注意：你是不是在到布達佩斯不久之後，或者很早以前就已成為社會民主黨的黨員？

拉科西：很早以前就是。在剛剛中學畢業以後就已經是社會民主黨的黨員了。

庭長：以後，一九一二年，你會離開祖國。最初，你住漢

堡，你在那裏擔任通訊員。後來你又到了倫敦。你在那裏始終是擔任通訊員的工作嗎？

拉科西：我擔任了匈牙利王家商業陳列所的通訊員工作。

庭長：在倫敦，你曾經參加了一個共產主義國際工人組織。

拉科西：是的。我在漢堡和倫敦的時候，已經是該組織的永久會員。

庭長：現在你告訴我，當你在俄國當戰俘的時候，你會參加過共產主義的組織工作嗎？

拉科西：我認爲最好像在一九二六年那樣，讓我自己來把整個問題有系統地敘述一番。

庭長：我要你答覆我的問題。我認爲這樣作是好的，而且我可以決定你答覆的範圍。

拉科西：庭長先生，照我所知道的……

庭長：你不要爭論，回答我的問題。

拉科西：請吧。照這樣進行吧。

庭長：當你在一九一八年回到匈牙利後，你沒有在尼熱尼諾夫丁斯克擔任一定的任務嗎？你沒有召開過匈牙利戰俘會議，要求他們擁護共產主義嗎？

拉科西：是，這些可能對。

庭長：並且當你於一九一八年到達列寧格勒的時候，你是否曾設法與匈牙利共產黨戰俘取得聯系呢？

拉科西：當然。

庭長：你參加過共產主義小組嗎？

拉科西：對，我曾參加過。

庭長：你沒有在薩爾哥達仁一九一九年一月爆發的工

人起義中担任一項任務嗎？

拉科西：沒有担任。

庭長：沒担任任何職務。那末好，我要告訴你，剛才你所承認的事情，與你一九二五年和一九二六年的供詞稍有出入。那時你說過，曾在凱奇凱麥特、米什科爾茨、塞格德、後來在外多瑙河區的巴巴和維斯普列姆等地，所到之處，你都曾担任了一定的任務。這種任務的範圍是什麼呢？

拉科西：首先，這兩件事並不衝突。我曾經到過凱奇凱麥特的這一事實並不一定牽涉到我曾經住過薩爾哥達仁。

庭長：但是你會到過米什科爾茨。米什科爾茨離薩爾哥達仁也不遠哪。

拉科西：至少有八十公里的距離。我只要指出：說我在一九二六年的供詞和我剛才所談的有距離，儘管距離不大，這樣隱射附會，至少是錯誤的。

庭長：請你用字要留意些，注意問題的範圍。

拉科西：我認為我所用的字句好像適如其分。

庭長：我曾向你提出了一個問題，你應該就這問題適當地答覆啊！

拉科西：請問，什麼問題？

庭長：我曾向你提到你在一九二五年和一九二六年的供詞，並且就是在這供詞上，向你提出了問題。請回答啊！

拉科西：你或者可以叫人把我在一九二六年的供詞唸一遍吧。

庭長：應當怎樣做或不做，決定權在我。你有回答或不回答的權利。你說你自一九一九年年初以來從沒有參加過共產黨人所組織的街頭示威、遊行以及以後的集體襲擊嗎？

拉科西：從來沒有參加過。

庭長：如果是這樣，那末你怎麼能在一九一九年二月二十日和其他四十六個人一起被人逮捕了呢？

拉科西：這是因為狄茨掌握了控告二十六人的材料，而他却命令逮捕了七十個人。我是從狄茨的親口供詞中知道這件事的。<sup>^</sup>所以，一俟預審推事受理了案子，很自然，這一切控告的理由都歸於無效了。可以控告我的理由只剩下“煽動叛亂”那樣莫須有的罪名，或在某處，某一集會、某一會議都歸罪於我的類似事情。總之，具體地說，我既不是爲了組織示威遊行，也不是爲了攻擊，更不是爲了其他事情而被控的。正如事後我所曉得的，原來我就沒有包括在狄茨、也就是當時的警察局想要逮捕的二十六個人之中。然而他們說，既然要逮捕共產黨人，那末，逮捕的羅網就越擴大越好：這就是爲什麼我被逮捕了。況且，我既具有先進的社會主義教育，從最初起，我就參加組織的會議，並且在會上發言。然而，我從來沒有參加過這一類的侵襲和攻擊，在這種情況下我被控是破天荒第一次。即在一九一九年，當我被捕的時候也是這樣……

庭長（打斷他的發言）：問題不在於控告。我僅向你提出了一個問題，而你對於這一問題，有回答和不回答的權利。自一九一九年二月二十日到一九一九年三月二十一日，你曾被關入拘留所。

拉科西：是的。

庭長：請告訴我，當你被關閉在拘留所中的時候，你能自由地與你的同伴們通訊嗎？

拉科西：這有些誇張。最初他們給我們的待遇嚴於普通犯所受的待遇。但約兩週之後，當人們發見我們根本與襲擊“人民之聲報”報館這件事無關，他們就仿照巴亞托巴

吉和德國國會縱火案的方式來捏造一切，以便找到一個藉口來鎮壓共產黨；簡單地說，當控告表現得毫無根據的時候，政府不得不退讓，並對待我們像……

庭長（打斷他的發言）：你不是在回答我的問題。這是我問你的：你曾經和你的同志自由地通訊，是還是不是？

拉科西：在一定的時期：不，其次，當早上六點鐘，讓我們出去，晚上八點鐘又把我們關閉起來。

庭長：那末，自早上六點至晚上八點你可以自由地和你的同志聯系了？

拉科西：在這裏，還須加上一個保留。我們有時能自由地交談。在宣佈公社成立之前不久的時期內，幾乎沒有任何限制。

庭長：根據初步調查材料的結果，你曾在拘留所裏設立了一個組織委員會。據我們所掌握的資料證明，在拘留所裏發現有社會民主黨黨員存在，他們企圖找機會和共產黨犯人接觸，並且和共產黨犯人們有了會晤，沒有和你會晤嗎？

拉科西：我在單獨隔離的牢房裏，他們沒有和我交談過。

庭長：工人蘇維埃開始討論的那一天，你做了些什麼？實際上，討論時間一直延長到晚上八點鐘。

拉科西：只在半夜的時候我才被釋放。很多汽車開到拘留所來接我們；我們當中很多人離開的時候說要再回來尋找其他的人。但到半夜的時候，汽車還是沒有回來。我只得步行走到城裏。因此，我沒有參加討論。

庭長：那末，當你還在拘留所的時候，你知道社會民主黨已和所謂共產黨簽訂了一項協定嗎？



拉科西：我大體上知道這件事。至於收集在卷宗裏的那些文件所敘述的那些細節，到了事隔十六年之後的今天，我才獲得明確的認識。

庭長：一九一八年三月的時候，你已經是抱着堅定信仰的共產黨員了。

拉科西：是的。

庭長：你懂得共產主義的教訓嗎？

拉科西：是的。

庭長：你贊成共產主義的原則嗎？

拉科西：這是正確的。

庭長：三月二十一日簽訂協定之後，就是說，在匈牙利社會民主黨和匈牙利共產黨合併之後，新成立起來的黨取名匈牙利社會黨，你一定得到通知的。

拉科西：完全對。

庭長：早在三月二十一日，你就被任命為貿易人民委員會副委員長嗎？

拉科西：是的。

庭長：同時，你被任命為執政府委員。

拉科西：我不知道那時是否有正式的委任狀。然而，我只知道，我的名字第二天載在政府的公報上。我不懂得任命的手續。

庭長：我向被告提醒一下匈牙利人民共和國執政府主席團第二三七九號決議案。在第四頁，你可以看到如下的文字(宣讀文件)：

“以下通知馬加斯·拉科西同志。在匈牙利社會黨三月二十一日會議上，我們已任命你為執政府委員，執政府是按照匈牙利革命無產階級的志願而建立

起來的。同時，我們也任命你爲貿易人民委員會副委員長。”

這個決議案上有加貝的副署。

拉科西：委任的日子是什麼時候？

庭長：四月。

拉科西：這個文件，我沒有收到過；但它同樣證明，任命的日期還要晚。

庭長：因此，你肯定你始終沒有得到委任狀？

拉科西：是這樣。

庭長：但它曾在報紙上發表過。

拉科西：我不能說這個文件曾到達我的手裏。但是，無論如何，我曾經當過人民委員是一件事實。我沒有半點意思否認這件事。這任命應該完成某些內部手續。然而，我認爲，這整個問題毫無意義。

庭長：根據預審的材料，你當貿易人民委員會副委員長一直到四月三日，執政府就在這一天任命你爲社會生產人民委員會委員長，這準確嗎？

拉科西：是的。

庭長：你擔任社會生產人民委員會委員長直到什麼時候？

拉科西：形式上說，直到新的人民委員會成立的時候爲止。但在此時期內，我到了前綫，並把職務交給瓦爾加的手裏，瓦爾加是經濟最高委員會主席。

庭長：你是在一九一九年七月被任命爲紅衛軍司令的嗎？

拉科西：對。

庭長：你擔任這個職務有多少時間？

拉科西：大約八九天，一直到專政失敗；專政失敗的降臨是在八月一日。

庭長：你在八月一日已經離開了匈牙利嗎？

拉科西：是。

庭長：你承認會參加過執政府的一些會議嗎？

拉科西：是。

庭長：根據控告的第一點，你承認會參加執政府一九一九年三月二十八日至四月一日舉行的會議，同樣地，你會參加四月六日和七日的會議嗎？

拉科西：我不承認會參加過。

庭長：我要提醒被告人注意下一九一九年三月二十八日這一天執政府第五次會議的記錄。記錄上出席人名單中有馬加斯·拉科西的名字。你看這記錄（他把記錄遞給了被告）。

拉科西（參閱了文件後）：我的名字出現在記錄出席人的名單中是可能的，但是，在事隔十六年之後，我不再記起所說的六次或八次會議經過的情況：我在什麼時候到會，什麼時候離開會的；我是否曾出席會議一直到會議結束，還是只參加了幾分鐘。

庭長：爲了很好地清醒一下你的記憶，我可以告訴你，就在三月二十八日的會議上，決定了所謂蘇維埃共和國的憲法。這可以幫助你更好地回想到你是否曾參加這次會議。

拉科西：這是一個錯誤：三月二十八日沒有通過憲法的問題。庭長先生你弄錯了，因爲我剛才看到了記錄的原文，所以我知道這件事。根據記錄的原文，憲法草案會交付給一個委員會，——我可不是這個委員會的委員——以便整

理執政府會議曾經討論過的條文。

庭長：但我的問題如下：你有沒有參加三月二十八日的會議，是或不是？

拉科西：關於這件事，在十六年後的今天，我不可能對你說什麼，這已是完全不可能想起來的事了。

庭長：記錄的序言以及出席人名單指明，你會參與這次會議。

拉科西：這記錄太好了。但我憑良心說，這還不够說明我確實參加了會議。

庭長：我提醒你注意記錄第四頁的第四條（讀）：

“主席加貝宣稱，工農兵蘇維埃的選舉已提到議程上來，並且，所有人民委員都被邀出席參加辯論。決議：第一條，蘇維埃共和國的目的是消滅資本主義生產制度，創立社會主義生產制度，保證工人們反剝削的權利，並在工兵蘇維埃中設立人民法庭；第二條，蘇維埃全國代表大會。最高權力屬於工農兵蘇維埃全國代表大會。匈牙利蘇維埃共和國的正式憲法，將由蘇維埃全國代表大會決定。其第一次會議將由執政府召集。”

你想一想，是否在這次執政府的會議上，曾通過這樣一項決議？你承認麼？是或不是？

拉科西：我看到這些是寫在記錄上的，並且也有可能曾經通過這樣一項決議；但是，我想不起來了。爲了簡化剛才幫助回憶的辦法，就應該在一九二五年的公審庭上向我提問題。在那時候，我回想到這些事情，要比十六年以後的今天更好得多了。

庭長：那末，你的回答意味着你記不起這些事了。另外一個問題：你承認曾經參加執政府第六次會議嗎？在會議

上曾決定了全國蘇維埃選舉和指定鄉、縣、省和市的候選人的日期。

拉科西：對於這個問題以及一切其他類似的問題，我將大概地回答……

庭長：你不能大概地回答。回答我的問題吧！

拉科西：對庭長的每一問題，我將不得不作相同的答覆。在十六年後，我實在不可能說出，究竟是哪一天我出席了這個或那個會議，是否我曾參加有關議程某一點辯論後的表決，我投的贊成票呢，還是反對票！要求我回答這些問題是不可能的。請注意你向我提出的一切有關的問題這一事實。在執政府各次會議上，大家會對記錄上所記載的論百個問題加以辯論。今天我實在不可能向你說明議程上的各點和我在這天或那天投票表決。這就是爲什麼我剛才說我只能大概地回答這些問題：我不記得這些問題。

庭長：你承認有關四月一日執政府第六次會議的記錄原文符合於事實嗎？

拉科西：我不知道所說的記錄是那一段。我不能對我不曉得其內容的記錄表示意見。在十六年後，對於當時議程怎樣，我沒有絲毫印象可說。

庭長：好，我可以把議程上的控告點唸給你聽。記錄第九頁第十六點這樣說（讀）：

“司法人民委員會建議鄉村和城市的議會選舉定於四月七日舉行；縣議會選舉在四月十日，省的選舉可在四月十二日舉行，至於全國蘇維埃選舉則將在四月十四日舉行。同時它建議，爲了討論選舉的方式，必須指派一個委員會。執政府通過了此項建議。”

你承認這段記錄是符合事實的嗎？

拉科西：我不記得了。

庭長：我要你注意書記官米海里·雷維茲的速記記錄，馬加斯·拉科西的名字是作為會議的參加者而用草字體寫在記錄上的。（他又把記錄交給了被告）

拉科西（參閱了該文件後）：我曾看到這些，我已經檢驗了這些舊的速記記錄。我可以肯定，大約在會議中途才提出這些問題的。雖然我的名字在上面寫着，即使這樣，我還是要說這不可能要我說出我是否曾參加關於議事日程這一點的辯論。而且這草體字不是我的手筆，這當然是米海里·雷維茲的字體。因而我的肯定答覆還是仍舊那句老話：我想不起這件事情了……

庭長：是否你準備和願意大概地來說明你知道不知道就是在執政府會議上，決定了指導原則並且通過了蘇維埃共和國的憲法這一問題呢？

拉科西：我願意順序回答上面的問題。

庭長：那末，請你立刻回答我的問題吧！

拉科西：我現在不回答。

庭長：在有關德國人和羅塞尼亞人的問題上，你們曾於四月七日的會議上決定要在舉行蘇維埃選舉的時候委任兩位人民委員去組織工農兵蘇維埃，罷免那些他們不喜歡的工作人員。你對此決議有什麼要說的嗎？

拉科西：我要把我這一問題的答覆歸併在一般情況下的敘述中。事實上，如果我脫離了問題的全面而談某些問題，那就要影響全面的看法以及決定我活動的動機的敘述。

庭長：一句話，你不願意在目前回答我的問題嗎？

拉科西：的確這樣，在這種方式下，我現在不願意回答你向我所提出的問題。

庭長：你有這種權利。然而，關於目前討論中的控告點，你應當告訴我，是否一九一九年三月二十一日以後，創立一支無產階級的軍隊以及解除資產階級社會的武裝，會載在共產黨的綱領上。

拉科西：這我也將作總的回答。

庭長：好！我要提出控告的第二點，即有關暴動罪的問題。我的問題是：在一九一九年三月二十一日下午三點鐘的時候，蘭德勒、保格尼、魏特納曾到過拘留所並和被拘的共產黨員取得聯系，你會參加他們的討論嗎？

拉科西：我未曾參加。

庭長：你在什麼時候得知無產階級專政已經宣佈了呢？

拉科西：第二天，即三月二十二日。

庭長：不更早一些嗎？

拉科西：我已經指出過，我被關在拘留所一直到半夜……

庭長：你知道有關招募無產階級軍隊的原則嗎？你同意這些原則嗎？

拉科西：當然同意。

庭長：你於三月二十一日任人民委員，而執政府則於三月二十二日舉行了第一次會議；無論如何，你該記起這一點。難道關於這一點，你還不記得嗎？

拉科西：可是，對這件事我記得很清楚。

庭長：你會參加這次會議嗎？

拉科西：是的，我曾經參加這次會議，但是，我應當立刻說，在會議進行中，我不得不往訪一處兵營，因為士兵們拒絕開赴前綫。我是以代表的身份被派去那裏的。我起初會反對担任這項任務，因為我不是軍事人民委員。但是，這項

任務還是交給了我，由於我那時年紀最輕。當然我就到了兵營，以便在那裏恢復秩序。

庭長：就在三月二十二日的會議上，執政府曾宣佈要把約瑟夫·薩特萊尼和山多·索爾梅當作政治犯拘留起來。當決議成立時，你曾在場嗎？

拉科西：我已記不得我是否曾參加關於議事日程上這一點的辯論……

庭長：你有沒有參加執政府一九一九年六月四日第二十四次會議？在這次會議上，為粉碎外多瑙河區鐵路工人的罷工，決定派出由揚錫克、薩穆埃利和汪圖斯組成的三人軍事委員會。

拉科西：我曾看到記錄，並且我曾在記錄上發現，我在會議上曾發過言。但我不能具體地回想我是否在下午五點鐘開會時在場沒有在場……

庭長：當通過這決議的時候，你在場嗎？

拉科西：毫無疑問，決議是通過了，可是，是否我曾參加會議我已想不起來，這也是很自然的。我承認，以控告的觀點看，知道我是否曾出席很重要，但是，在我看來，卡薩的解放却更十倍地重要。我們在與捷克人作戰，而我所首先關懷的就是這戰爭；現在我了解，在檢察處看來，這個控告點才是重要的，然而，這還不足以強迫我在事隔很長時間之後，回想我是否曾參加決定這決議。

庭長：我只向你提出這問題：當通過這決議時，你是否在場？

拉科西：我記不得了。可能我沒有參加，因為我正關懷着我剛才所指出的更重要的問題。

庭長：你知道不知道突擊隊曾為粉碎所謂反革命運



動而被調到省裏去？

拉科西：紅衛軍或紅軍的隊伍可能被派往那裏，但我沒有聽到說有特別的突擊隊。

庭長：在蘇維埃共和國時期，你承認不承認，有些平常的人被懷疑有反革命的思想而被逮捕、監禁和虐待？

拉科西：這是大概，甚至是肯定的，某些反革命分子曾被審訊、拘禁……

庭長：我現在提出控告的第三點。你承認不承認，執政府的第一個措施是宣佈戒嚴法？

拉科西：是的。

庭長：戒嚴法是在什麼時候決定宣佈的？

拉科西：我從文件中看出，是在三月二十一日到二十二日夜間宣佈的。

庭長：你會否參加這項決議？

拉科西：沒有，因為我在拘留所裏。

庭長：既然你沒有參加這項決議，並且後來你對它又沒有表示原則上的同意，那末，你的名字又怎麼會寫在通告布達佩斯人民、執政府已宣佈了戒嚴法的佈告上呢？

拉科西：這是因為：在佈告上，人們更能找到許多沒有參加會議的人的名字，並且這些人到了第二天才知道戒嚴法的公佈，我本人也只在第二天才知道這件事。我在命令的末端看到我的名字，絲毫不覺得奇怪。

庭長：我要唸三月二十二日那一期的“紅色報”第二頁上所發表的公告，它的題目是“戒嚴法”（讀）：

“執政府佈告第一號。違抗執政府命令者處死刑。罪犯將受革命法庭的裁判。主席：加貝，貿易人民委員會委員長：蘭德勒，貿易人民委員會副委員長：馬加斯。

拉科西。”

拉科西：我不否認他們又把我的名字加在上面。既然我沒有參加會議，我的名字只有被加在上面，不然就不會有。如果三月二十一日多數人民委員決定了什麼事情，他們也有權力加上缺席人的名字。實際上，一切嚴肅正經的組織都採取同樣的方式。

庭長：那末，你是否同意這佈告。

拉科西：我會同意。

庭長：你會否有過一次在執政府會議上發言說，你想或你提議暫緩執行命令呢？

拉科西：我認爲戒嚴法是必要的。在事後的今天，我仍然維持這個意見。這就是爲什麼我沒有要求把它作爲無效……

庭長：你會否參加執政府一九一九年四月六日的會議？對這個問題，你還要爲了你的一般答辯而回答我說你想不起來了嗎？

拉科西：我沒有一般辯解要做，但却有一個一般性質的聲明。我覺得我無需爲我在公社時期的所作所爲而辯護，因爲我根本不覺得有罪……

庭長：我要提出控告的第四點。這是我的第一個問題：你會否以社會生產人民委員會委員長和執政府委員的資格獲悉在一九一九年六月初旬發生過的反革命運動呢？

拉科西：是。

庭長：你以執政府委員的資格是否認爲由於鐵路工人的罷工必須採取某些對待措施嗎？

拉科西：在這種形式下，我想不起我會認爲有採取對待措施的必要，因爲這不在我的職權範圍以內。但是以一個

共產黨員說來，我正式聲明，我同意蘇維埃政府所採取的所有合法措施。我願意對所有我以工農政府的名義所作過的一切負責。粉碎鐵路工人的罷工對無產階級的政權來說是一個生死存亡的問題。當我們手持武器反抗帝國主義者的時候，匈牙利資產階級、貝特蘭和維也納的其他所謂匈牙利“愛國分子”，却急於支援向南方鐵路進攻的敵人。這就是他們的愛國主義……

庭長（打斷他的話）：關於這種發言，我要你注意範圍。

拉科西：什麼發言？

庭長：你可以對事實的內容和實質作辯護，但你不能把第三者牽扯到辯論中來。

拉科西：可是我要提供此事的證據。

庭長：不要講話！你有機會在指定的時間，依照訴訟程序的規定提出你的證據。

拉科西：所以我在那種情況下同意用一切適當的手段來粉碎支援捷克人的匈牙利資產階級。

庭長：你會否參加執政府六月四日的會議，在會議上，你們討論要採取的措施並在會議上通過了一項有關這些措施的強制性的決議？

拉科西：我可能會參加這次會議……

庭長：請告訴我，你是否知道蒂包爾·薩穆埃利以政治委員的資格在位於多瑙河和蒂薩河中間的地區，在人們稱之為蒂薩軍的後方所進行的活動？

拉科西：是的，我知道這件事。

庭長：你知道不知道蒂包爾·薩穆埃利曾經利用槍殺的手段？

拉科西：不知道。我只知道他恢復了軍隊中的秩序。

庭長：恢復了秩序？

拉科西：這就是說，他曾把折返後方的部隊恢復了秩序。

庭長：他曾採取什麼措施呢？

拉科西：關於這點，我一無所知，但事實是這樣：他曾被革命政府在議程上提出表揚，由於他對恢復折返的軍隊的秩序有了貢獻。

庭長：那末你知道薩穆埃利曾不經絲毫預審的程序即把一些人處死嗎？

拉科西：我對這些一無所知，但是當他接受了某一任務，在所受命令的範圍內，他用鐵的手腕來處理是可能的。這也是他應當盡的責任。薩穆埃利堅決地、忠實地完成了一切。他的權力和行爲是匈牙利無產階級賦予他的，他的權力和行爲服務於匈牙利工人和農民的利益。

庭長：當執政府把某些職權委託給某一個人的時候，這個人就要把他的任務當作一個命令來考慮嗎？

拉科西：對這事，我不知道。

庭長：因爲你剛才曾說，薩穆埃利曾執行了他所接受的命令。

拉科西：現在我們來談談匈牙利無產階級所曾委託給他的使命。我講話絲毫沒考慮到字句的細微關節，請注意我沒有精巧機智的可能已經有十年了。如果我說，薩穆埃利是這樣一個人，他擔負了無產階級所給予的使命，他就忠實地和堅決地執行這使命……：

庭長（打斷他的講話）：現在不是談無產階級而是革命政府。

拉科西：在我看來，執政府是無產階級的代理人，並且

它之所作所爲是符合於匈牙利工人與農民的利益的。

庭長：當薩穆埃利接受了上面所說的使命而被派往多瑙河區去了的時候，他還和執政府繼續保持聯繫嗎？

拉科西：和誰？

庭長：和執政府。

拉科西：這，我毫無所知。

庭長：他會有過報告嗎？你是參加了會議的，在六月五日以後這段時期，你參加了會議，執政府是否會收到過有關蒂包爾·薩穆埃利活動的報告呢？

拉科西：四月四日以後再沒有任何記錄文件能發見我的名字了，並且在這個日子以後，我可能再沒有參加過會議。由此可見，我不知道薩穆埃利的活動。不僅因爲我不記得這事，並且，即以我執政府委員的資格來說，也不可能接到有關他的活動的報告，因爲我沒有出席。

庭長：當你們通過適才所提到的六月四日和五日的決議時，你明明是出席了的，你同意這些決議嗎？

拉科西：在十六年之後，我已不能說出我是爲什麼表示同意的了。要回想起這件事情來，已非易事。

庭長：你既不了解薩穆埃利的所作所爲，也不知道這些行爲是怎樣根據王家檢察處的意見和起訴書而確定下來的，因此你也不知道加普維、司梭那的被殺和其他槍殺事件？因而你就想說，你一點也不知道薩穆埃利活動的後果嗎？

拉科西：我不熟悉這些事。這不在我的職權範圍以內，並且我從歸在卷宗的文件和起訴書中才知道這些事。

庭長：你作爲人民委員一次也沒有讀過“紅色報”和“蘇維埃共和國公報”是可能的嗎？這些報刊可能也報道這些

**事實吧？**

拉科西：我曾經在判決書裏注意到，所有人民委員都應該被視為曾經完全讀過那時期的報紙的。

庭長：請回答我的問題，並且以一種適當的語氣說話。

拉科西（激動地）：用一種適當的語氣？我說話的態度是不適當的嗎？

庭長：你的語氣是否適當由我判斷。我告訴你……

拉科西（激怒）：庭長先生，如果叫我在這裏注意適當的態度，在我這方面，我寧願結束辯論。我不是由人家來教訓我學習適當態度的人。

庭長：我請你注意這發言的範圍。我請你遵守紀律的處分，否則我要更嚴厲地科罰你。

拉科西：我因而要說……

庭長（打斷他的講話）：我要你閉嘴！

拉科西：我是願意回答你的問題的。

庭長：你會否讀過這些報刊？

拉科西：當我擔任人民委員的時候，我的大部分時間是在前綫度過的，在前綫，報紙得到手是很不正常的。並且常常是在一個長時期內，我沒有看報。如果我看到報，引起我注意的是國際問題性質的消息。因而即使報紙上提到過這些事件，我不注意它也是十分可能的。至於那時期報紙的內容，我說我和法庭都毫無所知，這也是很自然的，我認為這樣說也不錯。

庭長：你會參加執政府的會議，在會議上你們曾討論蘇維埃共和國的財政狀況嗎？財政人民委員會委員長曾提出一些關於徵收支付票據的建議，而執政府曾為此事而通過多項決議。

拉科西：我不知道在當時的情形下有關此問題的這一插曲。當時，我已和兩位人民委員在奧地利被拘禁了六個多月的時間。但由於不久之後我即被移解到監獄裏，所以今天我已不可能對這件事說些什麼，至於我所知道的一切，這是我從朗日埃和瓦爾加兩同志那裏獲悉的。在十五六年以後的今天來回想這件事是有些困難了。但是，我重複說明，除了這些細節以外，我對問題是熟悉的。

庭長：根據一九一九年三月二十二日執政府第一次會議的記錄——這上面發見了出席人的名單——，馬加斯·拉科西同樣會出席這會議。在會議上，財政人民委員會委員長瓦爾加曾作了一個關於財政狀況和他所採取的措施的報告。

拉科西：完全準確。實際上他曾說——這裏，我可以馬上說明這問題——，在孫德執行了幣制改革以後，國家銀行有藍色鈔票約十五億克朗，從而在以後數月中，蘇維埃共和國在財政上可解除顧慮。尤其是，我還記得，事後孫德對我說：我們竟相信十五億足夠幾個月的用途，實在太天真了。在三月二十二日瓦爾加所作的聲明中，曾談到有關的這些問題。並且從第一天起，奧匈銀行對這些問題究竟採取什麼態度還不可能預測，我認為這種事實本身證明在上述的報告中，根本不存在印發假鈔票的問題。另外我應當補充說，當檢察官先生通知我被捕的時候，他也曾聲明，所有這些將不作爲確定犯罪的控告點。因而我有很多理由可以相信，如果他後來把這問題納入起訴書，這是由於上級下來的命令。

庭長：我要宣讀執政府第二次會議的記錄。記錄第二十八項表明，財政人民委員會委員長瓦爾加曾提出關於

財政問題的建議。

拉科西：我也想不起來。

庭長：告訴我，在這兩次政府會議上，曾否談到下命令利用奧匈銀行發行二百克朗和二十五克朗的鈔票製版——這些製版存放在布達佩斯該行總行——來印行二百克朗和二十五克朗的新票呢？

拉科西：從沒有這問題。這樣的計劃從沒有在執政政府的歷次會議的議程上出現或當作報告的對象。至少我不記得有這種事，並且我認為似乎別的人對這件事也不會記得。

庭長：請你坐下，我要中止審問十分鐘。

（中止審問時間過後）

庭長：請被告向前站。（拉科西走到被告席）一九一九年三月二十一日，與匈牙利共產黨合併的匈牙利社會民主黨是否用武力取得了政權，還是政權自願地讓給它呢？

拉科西：那時任何暴力都不必要。雖然我們掌握着軍隊和警察，但我們避免了使用武力。抵抗工人運動的力量是不可能的，尤其是軍隊已站在我們一邊。

庭長：那時你們控制了軍隊、警察、憲兵和民兵嗎？

拉科西：是這樣。任何需要用武力對付的集團都不存在。

庭長：沒有遇到絲毫抵抗嗎？

拉科西：沒有絲毫抵抗。

庭長：當事人有問題要提嗎？

檢察官拉茨洛·達馬西：我有一個問題。

庭長：請提吧！

檢察官：以你在與社會化委員會合併了的貿易委員會



的副委員長的資格，你承認你會否採取了關於商業社會化的種種措施？

拉科西：對，我曾採取了這些措施。

檢察官：你承認不承認，一九一九年三月二十四日公佈的命令——簡略說一下它的內容——，除食品店、藥房、小藥舖等所有公共衛生機構以外關閉所有商業，並且這個命令上面有着社會化委員會的簽署，它是你的創作嗎？

拉科西：不是，這是海維齊主持的。那時候，各個人民委員的活動範圍還沒有劃分清楚，並且，海維齊正同我一樣，也是社會化委員會的副委員長。如果我的記憶不錯的話，他是在某星期一發出這個命令的。我相信，四月二十三日是星期日，到了星期一所有商店就被關閉了。發表此命令的不是我，並且，相反地，這措施大大地引起了我的不滿。

庭長：因而維爾摩斯·鮑姆所肯定的這一點就與事實不符了嗎？在維爾摩斯·鮑姆的書裏，他曾聲明說……

拉科西（打斷了他的講話）：是的。爲什麼他的肯定不可能與事實相反呢？他既是社會民主黨人，他就是我們的敵人。他竭力想把這件事的責任轉嫁給我們。爲了證明這個命令可能在未經我們知道的情況下發表的，我可以簡單地告訴你，在執政府四月八日會議的記錄中，我曾發現我自己發言的原文，對此顯然我已不記得。在這發言中，我曾提出種種抗議，因爲關於商業社會化的命令是未經我知道並且事先也沒有徵求我的意見而發表的。因此這一純粹屬於我的職權範圍內的命令就在未經我知道的情況下而被公佈了；公佈的時期不是在初期紊亂的情況下，而是在十五天以後。所以連鮑姆自己也會弄錯，正是這位鮑姆在他的書中不知羞恥地還用其他理由來打擊我。況且，如果他斷定

說這命令是通過我的合作而發表的話，這是毫無意義的事。

檢察官：我沒有別的問題要提了。

庭長：辯護人有什麼問題嗎？

辯護人蘇爾坦·朗日埃律師：有。（向着拉科西）你能說出你們用什麼方式取得政權的嗎？

拉科西：這只用幾分鐘的時間，我立刻就講。

朗日埃律師：在此時期，你仍然是執政府的委員嗎？

拉科西：我是處於被拘禁的狀態的，我於二月二十日被捕。開始我在摩松尼街，後來把我解到了拘留所。

庭長：回答所提出的問題。

拉科西：這就是答覆：由於我參閱了案卷所收集的文件，我知道一部分，加上按照我自己的記憶知道另一部分——我很少能依靠我的記憶了，因為這是些很早的事情——，在一九一九年二、三月兩個月期間，絕大部分的工人很快地站到了共產黨人的一邊。一九一九年二月二十日我們被捕了，其主要的的原因之一，是懷疑我們會襲擊社會民主黨的機關報“人民之聲報”編輯部，曾組織械鬥並殺死了許多警察和民兵。後來對這件事所提供的證據立刻發見，我們根本沒有參加這次械鬥。我曾從不同證人的供詞中，尤其是從狄茨的供詞中看出，他們也知道是沒有經驗的民兵和警察們曾互相開了火。社會民主黨的領袖們和我們同時在二月二十日晚上得知這件事。他們在完全知情的情況下乘機用這種藉口發動了對共產黨的進攻，因為在思想上他們是站不住腳了。這就是我們被捕的歷史。

所有社會民主黨的領袖們以及卡羅利內閣方面、至少他的內政部長，我相信，即使他們逮捕了我們，他們都知道，我們是完全無罪的。被捕的夜裏，他們告訴我要我小心一

下我的骨頭，因為我身上將要不再有完整的骨頭了。因此，判決肯定……

庭長：不要總是談判決。現在所說的是起訴書，而不是判決。總之，這和向你提出的關於奪取政權的問題毫無關係。你要在這問題上很好地答覆。

拉科西：在幾天之內，我們被捕的消息便在工人中傳開了，尤其是我們自己也傳播着這消息。至於檢察處方面，開始調查時也立刻覺得，加在我們身上的指控與我們毫不相干。同時由於我們被打和被捕的事實，不僅沒有削弱我們的影響，反而大大地擴大了我們的影響，並且無產階級要求恢復我們的自由。

當孔費從伯爾尼回來並知道了這是社會民主黨的一種欺騙手段的時候，他就大怒，因為他也知道，這種情況好像把流水供給水車，只有對我們有利。卡羅利被迫發出命令要以政治犯對待我們。他之所以這樣作，一方面是因為他所控告我們的理由只是屬於政治性質的問題——用報紙來煽動叛亂，或類似的事情，至於什麼正式的稱呼我却不知道了——，而另一方面是因為俄國方面通過紅十字會向卡羅利提出警告，根據這警告，如果我們不受政治犯待遇，俄方即將利用報復的方法來對待仍留在蘇聯的軍官。由於這一切情況，無產階級要求恢復我們的自由。工人們開始到拘留所裏來訪問我們；我必須向你指出，拘留所對我們既沒有特別寬大的待遇，也沒有什麼優待可言。實際上，一切被拘留的人過去有、而且永遠有穿自己衣服的權利，以及其他等等。我在這裏不想討論判決，但事實上原文是逐字逐句從另一判決原文抄襲下來的，因此不能不使我談到“判決”，尤其是行將對我宣佈的判決大概會與起訴書上作為基礎的東

西相一致的。

所以我說：我們應當穿我們自己的衣服，吃特別伙食，並且能吸烟；這沒有什麼可以奇怪的，因為任何普通法上的罪犯都能穿自己的衣服，吃自己的伙食，甚至大部分已被判決有效的徒刑犯根據正常的批准，也可以為他們自己而勞作。

總而言之，整個無產階級都已知道了這一切事實。但這還不是我們很快地獲得進展的理由。主要的原因是我們的綱領的正確性。在農業問題上，社會民主黨人有一個很複雜而對資產階級有利的綱領。在一九二〇年訴訟案的過程中，巴爾那·蒲柴曾說過，這個計劃就是放棄社會民主黨的綱領。再者，他們沒有關於工廠的綱領，他們沒有計劃，沒有任何關於國際問題的未來計劃，並且還很少提到有關於俄國革命的問題。最後，他們完全缺乏關於被佔領土的問題。正是我們，共產黨員們，有能力掌握所有這些問題並且指出在領土問題上應當怎樣做，在國際方面應該怎樣進行等等。這就是我們因之能如此迅速地得到無產階級愛戴的原因。

在三月中旬，很多問題積累了起來。應當對下列問題找出解決的辦法：播種問題、選舉問題、關於被佔領土的問題……

庭長：告訴我，你從那裏知道了這些？你不是已處於被捕狀態嗎？

拉科西：我曾閱讀過所有的這一切。我是在報紙上讀到這些的。

庭長：人家沒有要你尊重章程嗎？

拉科西：其他被拘留的人們也獲得了讀報的權利。總

之，我呢，我讀到了報。

庭長：你曾經說過，你從沒有過讀報的時間。

拉科西（興奮地）：那是在公社的時候，現在我們談的時間是在公社以前，我談的是我在拘留所的時期。那時我有足夠的時間：我不做別的事只是讀報。

言歸正傳：因此卡羅利政府不能成功地解決這些問題。並且首先，對被佔領土的問題，未達到任何成就；這是由於資產階級右翼政治上的十分無能。我曾研究了這問題的所有材料：當時，在資產階級內部，即使在卡羅利政府以外的人士中，也找不到一個能起草任何有價值的政綱的人。他們只能設想反革命的計劃和一些荒謬絕倫的軍事計劃，而其唯一的結果是促進轉向左翼的加強。至於土地所有權的問題，他們從沒有做出什麼……

庭長：請你以一種十分明確的態度來告訴我們：你是否認為從這點出發，就可以說，由於你們的宣傳，大部分無產階級就站到了你們一邊？回答吧，我們要繼續談別的。

朗日埃律師：當你們奪取政權的時候，你們會遭到一些抵抗嗎？

拉科西：我們沒有遇到絲毫抵抗。相反地，所有的人都趕來自動地要提供服務，真正是擁擠不堪。

朗日埃律師：自動地嗎？

拉科西：是的。談一下我個人的記憶吧：在我被釋放時，令我恢復自由的檢察官就曾經熱烈地祝賀過無產階級專政。這就是瓦利。

庭長：對此聲明，我要你注意問題的範圍，我曾對你說過，不要牽涉到第三者，並且特別不要以一種有意表示侮辱人的口氣。

拉科西：在這聲明中那有什麼侮辱人的口氣？當我第二天到了人民委員會，毋寧說到了國務院的時候，有人引我到了國務秘書那裏——我相信他的名字叫梅海利——他即以如下的方式向我作自我介紹：“我的名字叫梅海利同志。”（旁聽席中有笑聲）我知道他曾經是全國工業家協會的秘書。他說他也是同志，到使我吃了一驚。但是不久之後，副部長和顧問們也都湧到我那裏，紛紛以“同志”自居。那時我孑然一人，我身上又沒有帶手槍。沒有人想對我反抗。不久之後，在公社時期，我更沒有覺察在這方面有絲毫抵抗。所以絕對不應當使用武力，我估計檢察處本身恐也無法舉出當時需要用武力的實例來。

朗日埃律師：仍留原職的人們能領薪金嗎？

拉科西：當然，即使他們不做任何工作也能得到。

朗日埃律師：他們接受所發給他們的薪金嗎？

拉科西：當然接受。他們認為薪金不夠。（旁聽席中有笑聲）

朗日埃律師：在這時期你有武器嗎？

拉科西：不，我只有一支弗勞貝爾式的小口徑卡賓槍。

朗日埃律師：那末士兵怎樣？

拉科西：他們完全在社會黨人或共產黨人的影響下。

朗日埃律師：那時兵額多少？

拉科西：在布達佩斯至少有兩萬人。

朗日埃律師：在你們取得政權之後呢？

拉科西：在那個時候，大約有兩萬士兵在布達佩斯。他們是駐防軍。

朗日埃律師：軍隊已經受到社會主義思想的鼓動嗎？

拉科西：他們完全嚇呆了。大多數人沒有財產，所以他

們不知道他們的前途怎樣。他們知道俄國所發生的一切。

朗日埃律師：所以你也無需用強迫手段來使軍隊受你的節制嗎？

拉科西：在此時期，軍隊已掌握在我們的手裏。

朗日埃律師：照你的意見，如果你們沒取得政權，從前的革命政府還能維持下去嗎？

拉科西：這是不成問題的。企圖反抗我們的人連一個人也無需予以逮捕，這是聞所未聞的。

庭長：等一下，現在我要提出一個問題。（向着拉科西說）如果你們沒有用絲毫暴力，而是自然而然地取得了政權，那末就在取得政權的那一天，你們如何能公佈一個命令，宣佈戒嚴法，把所有以抵抗行動反對無產階級專政所決議的措施的人判處死刑呢？

拉科西：因為歷史教導我們：資產階級是不會甘心讓位的。我們了解法國革命和俄國革命。列寧本人也曾教導……

庭長：因此，你們沒有組織提燈遊行，而是宣佈了戒嚴法。

拉科西：是的，我曾經做過一番調查研究，並且我發現，當塞格德政府成立的時候，它也從第一次會議起就宣佈了戒嚴法。這是它所作過的第一件事。

庭長：還有什麼問題？

朗日埃律師：在前綫上你的任務是什麼？

拉科西：我於四月中旬到達前綫，除了很短時間的中斷外，我在那裏直到七月初。每次時間一允許，我即參加人民委員會會議。實際上，這是一種處理一切問題最簡便的方法，因為所有的人——四十、五十、六十個人——都在那裏。

如果有人需要某種裝備或有什麼指責，就可以把有關的人拉在一邊去解決問題。談到我的人民委員的職務，我在四月中間就交給了我的後任：從此時起，我以第二師政治委員的資格留在前綫。在那裏，我又成了“管家婆”。這樣，我就得常常出外視察，或者以政治委員的身份樹立好榜樣給人們看。大家也就要我擔任組織撤退卡薩的任務，甚至爲了對付從塞格德方面來的攻擊情況，設法延緩包括一萬六千人的法國師團的前進並阻止它發動的任務。我必須以三個營和兩個砲兵隊完成這一切任務，並堅持到紅軍發動了反攻。因此，我也承担了特別的任務。至於在人民委員會，我不可能再主持工作，最大的理由就是我不可能出席。所以我的活動特別帶有軍事的性質。我之出席貿易人民委員會只是在最初時期不超過二到三個星期。因此我也不知道那時的事變，舉例說六月二十四日布達佩斯發生的反革命事件，很久之後，我才知道，並且僅是耳聞，因爲當時我不在布達佩斯。

朗日埃律師：所以你也不知道六月二十四日的事變？

拉科西：那時，我是在前綫，爲了說得更確切些，是在南方前綫，對抗法國人。

朗日埃律師：以政治委員的身份嗎？

拉科西：是的。我同時担負着探察地形以便退却的特殊使命。在戰綫的這一地帶實際上我們僅有三個營。

朗日埃律師：在薩爾哥達仁發生了一些什麼事情呢？譬如說，當師長——他是一個反革命分子——在輕微的緊張恐慌下，就放棄了城市並要把隊伍撤到離該地二十公里遠的奇斯台林尼亞的時候？

拉科西：我以政治委員的身份直接地掌握師的指揮權。



我親自到前綫並恢復了秩序。可是我必須說明，我的權力並沒有明確的規定。總司令維爾摩斯·鮑姆第二天來到，惱羞成怒，大聲斥責我，說我竟敢干涉戰略的問題。

庭長：這不構成爲控訴點，並且在這裏毫無關係。

朗日埃律師：我還有一些問題。你對有關利用軍隊、憲兵、警察以及一般地用以維持內部秩序的武裝組織上有什麼話要講嗎？

拉科西：沒有。在最後的八、九天，我是紅衛軍司令，但我的任務是在這些單位裏恢復秩序——它們的紀律是有些鬆弛了。但我應當說，要完成這個任務，八天是不夠的。

朗日埃律師：請你告訴我們：匈牙利紅軍所進行的軍事行動，其目標是什麼？

拉科西：收復捷克人和羅馬尼亞人所佔領的領土。在這時期，收復被佔領土在政治上和軍事上的可能性是存在着的，因爲小協約國還沒有具備像樣的武力。在這種情況下，我們應該有可能先驅逐捷克資產階級的軍隊，繼而驅逐羅馬尼亞資產階級的軍隊，但必須以沒有反革命軍官集團的存在爲條件。然而這些軍官們却和資產階級軍隊妥協並阻撓對於捷克人和羅馬尼亞人加以打擊使其撤退。

朗日埃律師：謝謝，我沒有其他問題了。

庭長（向着被告）：你坐下來吧。

拉科西：我可否獲得允許向法庭提出一項要求？

庭長：提出來吧。

拉科西：我願意把關於控訴方面我所要說的一切連貫地敘述一番，並且把背景作出全面的描繪。

庭長：現在我不准你這樣做，因爲在控訴方面，我已經詳細地詢問了你。可是在進行辯論的時候，你有權作出連

貫的辯護詞，利用你的最後發言權。既然我已經結束了對於被告的審訊，王家法院就要訊問證人了。

正式的速記記錄載“匈牙利工人運動學院檔案文件”第三卷，第三七——二頁。

## 被告有最後發言權

(一九三五年二月七日及八日)

一九三五年二月七日的發言

庭長：你願不願意利用你的權利，作一次最後發言？

拉科西：要的。

庭長：我預先通知你，辯護的權利並不允許你在法庭上發表演說，宣傳那已被禁止的社會傾向。你發言的時候，要注意到這一點。

拉科西：我先要提出一個要求。現在已經過一點半了，我的陳述可能繼續達二小時半之久，請允許我在下次開庭時說話。我疲乏了，因為一方面，公開審問已經歷時十八天，另一方面，今天的辯論也已經繼續了四小時之久。

庭長：總可以完成一大部分的陳述。

拉科西：我首先要答覆檢察官先生在半小時以前對我所提出的指責。他指責我得到非常有利的辯護，甚至得到國際間的聲援。

對這件事我是無罪的。但是我的案件在全世界引起了極大的注意，工人們犧牲了最後一文錢，要在國外和在國內一樣能夠得到有力的辯護，使我感到驕傲。

現在我談談檢察官先生在提起公訴時所沒有說到的話，我也同樣極願意知道為什麼我的案件沒有在一九二五年和一九二六年間提起訴辯，尤其因為我知道案件是交由

當時的副檢察官亞格斯頓·彌斯谷西處理的。亞格斯頓·彌斯谷西對於這個問題曾經在“東方報”上發表過很長的聲明，這篇談話登載在該報七月底的一期上。他談到了問題的各方面。所以，在這個時候，檢察處就夠把它構成一個起訴的事實。但是當時並沒有發生什麼。不僅在法律方面我指責這種違反慣例的手續，我認為特別可以指責的是這個案件等了近十年之久才移到這裏，然後在一種新的激憤情緒的衝動中把它提出來。我勉強可以懂得壓置在檔案中的案卷，當它重新出現時會換上一副新的面目，但我不大懂得久已壓在公事桌抽屜底下的憤怒情緒的激烈程度怎麼會隨着過去的日子而逐漸增長起來。尤其因為，我必須指出，在一定程度上，公社時代所犯的暴行是在世界大戰的屠殺中產生出來的。這些暴行在卡羅利政府時代還繼續着，並沒有隨同公社的失敗而終止。

既然這裏時常提到我的“罪行”、恐怖以及其他與無產階級專政有關的問題，我現在首先願意談一談人們過去一個字也沒有在這裏提起的種種事情。我願意談談匈牙利反革命運動對公社社員所犯的屠殺和暴行。我只須追述一下奧戈瓦尼村和蕭弗克村的往事就夠了。這樣的暴行既然是發生在公社之後，那末，毫無疑問，這就是說檢察處對於這個問題早已有了成見，這種成見可能是有利的，也可能是不利的。如果它是不利的，那末……

庭長：這個問題和起訴書毫無關係。

拉科西：所以不准講麼？

庭長：請只講和控訴有關的問題。

拉科西：檢察官先生曾經指出卡羅利和他的左右與敵人聯合起來，為敵人所指定的目標效力，是多麼可怕。這種

情緒，我完全有同感，因為在紅色戰爭時期，我在前綫曾經有兩次——一次是在外多瑙河區鐵路工人罷工的時候，一次是在外多瑙河區暴動的時候——看到當一個人做了敵人的同盟者時，會發生這樣的情形。如果卡羅利和他的夥伴們作出這樣的行爲，在我的案件中這却不會構成控訴的主要部分。

起訴書特別對我指責的，是在多瑙河和蒂薩河之間的一個地區裏，以及在鐵路工人罷工時，用了恐怖和死刑來鎮壓那些企圖恢復“合法秩序”的未遂行動。我對這個問題所要說的是：如所周知，要恢復合法秩序的企圖，它所用的手段，是捷克和羅馬尼亞資產階級的軍隊。人們都知道所謂“合法秩序”只是在羅馬尼亞軍隊佔領了布達佩斯之後才被恢復。有如我早已說過的，我和全黨，我們用盡所有一切的方法對捷克人和羅馬尼亞人的恢復所謂“合法秩序”進行鬥爭。實在說來，在這次鬥爭中，死亡的人數不止僅僅四十人，在羅馬尼亞方面，死亡人數在五千人以上。在這些鬥爭中間，我們不僅佔領了開塞爾和杜那巴達，還佔領了巴爾發和卡薩。我也曾經指出我帶着武器，參加了這些戰鬥。檢察官先生沒有注意到這個事實。但是那進攻開塞爾的中央政權，也同樣進攻了卡薩。那在多瑙河和蒂薩河之間的地區執行死刑的中央政權也同樣使五千羅馬尼亞人、三千五百捷克人喪失了生命。如果這個中央政權佔領卡薩是一種合法的行動，那末它的佔領開塞爾不能說是不合法的。反過來說，也是如此。如果佔領開塞爾是一種屠殺暴行，那末卡薩的佔領也是一種屠殺暴行。檢察官先生沒有提起這個問題，我深深的感到遺憾。

我現在談談檢察官先生的發言。他說布爾什維主義只

知道破壞，不知道建設。在這個法庭裏，我站在被告席上，還已經是第三次了。我聽檢舉和控訴也已經有四次之多了。可以說每一次總是聽到責備布爾什維主義，說它只知道破壞，不知道建設。這樣的責備已經相當陳舊。總之，這是對布爾什維主義的第一項責備，而這第一項責備好像是無法把它取消的。所以我願意追述若干事實，指出布爾什維主義怎樣能夠生產，能夠創造。在一九二一年間，流亡柏林的俄國孟什維克黨人的報上指出蘇聯的鋼鐵生產……

庭長：這在這裏是毫無關係的。

拉科西：難道我沒有權利指出布爾什維主義並不專事破壞，而且還能夠建設麼？

庭長：我不能允許你作這類的發言，我已經說過，你為了一個在這裏，在匈牙利是已經被法律禁止的社會傾向，發言辯護，這是不能准許的。

拉科西：我敢於提到這種事情，是因為檢察官先生堅持布爾什維主義不能建設，只能破壞。

檢察官：這是只指匈牙利的布爾什維主義而言。我的論斷並不適用於任何其他國家。

拉科西：第二點，檢察官先生聲言布爾什維主義是文明的一切成就悉被消滅的代名詞。這是我在公訴時所聽到的。公訴中特別指出，反宗教和無神論的宣傳是同樣屬於毀滅宗教整個措施中的一部分的。

我對於這種論據的答覆是：文明——我無須給予一個明確的定義——首先是資本主義的產物。當資本主義在初期還帶着革命性的時候，它並不把宗教看作文明的一個因素。相反的，資本主義把宗教看作一種含有敵意的力量，用全力來對它攻擊。所有熟識法國資產階級革命在準備時

期這一段歷史的人都知道這個文物燦爛的世紀中的作家，如伏爾泰和其他諸人都對宗教進行過很堅決的鬥爭。伏爾泰曾經說過：“打倒醜惡的東西”，他所指的就是教會。所以當這些人取得了政權之後，他們就來執行這個任務。法國革命中有一段時期，所有教堂都大門關閉，教士做彌撒的時候，倘使不宣誓盡忠革命，就會被處死刑。只在後來，到教會方面適應了資產階級所創造的環境，資產階級方面地位既經穩固，開始剝削工人和農民，把教會當作自己的同盟者的時候，上述情形才改變了。但是這並不能改變下列的事實，就是說當資產階級文明的初期，教會並不能當作資產階級的不可分割部分，而且事實上它也沒有如此被看待過。

第二點，我必須再次聲明，文明所獲得的一切成就又已在危險中了。但是並不是從布爾什維克方面來的危險在威脅我們。文明的一切成就將被最“文明”的民族，最傑出的人物所建造的飛機所毀滅。這個事實是這樣的顯著，在世界大戰剛告結束的時候，人們就彼此詢問文明是不是已經在開始衰落。已經有很多的著作，討論過這個問題。

既然人們談到威脅文明的危險，必須了解威脅世界的並不是布爾什維主義，而恰恰是資本主義。舉世周知，今天人們講起未來戰爭的時候，都談到倫敦、柏林和巴黎的被炸，好像是一件極自然的事情，有如在戰爭開始時，布達佩斯的被炸一樣。所以，如果文明處於危險之中，威脅並非來自布爾什維主義，危險的來源是資本主義，是資本主義把全人類在技術和其他方面所實現的一切成就，毀滅淨盡。

至於檢察官先生所賜給我們的“冒險家”、“半瘋子”種種稱號，我認爲以概不答覆爲妙。我和我的黨，我們不會由於這種辱罵而降低我們的人格。所以我認爲不值一辯……

庭長：我要你遵守規矩，不許用這種措詞，並請你用辯護者的地位和性質所應有的口氣發言。

拉科西：檢察官先生自己採用了這種措詞：布爾什維克只承認人生的物質財富。但是特別對於我來講是……

庭長：不要講這些。如果你要爲你自己辯護，只講控訴上所提出的問題。你曾經是所謂蘇維埃共和國執政府的委員，請答覆這個問題。

拉科西：那末不准我答覆檢察官先生所說的一節嗎？

庭長：你已經答覆過了，而且我也已經很忍耐地聽過了。

拉科西：起訴書和調查程序中包括了無數的問題。他們開始從世界大戰說起。當一九二〇年對人民委員們宣佈判決的時候，進行的情形也是如此。所以我不得不在某種程度內也按照這個例子從世界大戰開始時說起。在一九二〇年，判決書上曾經認爲……

庭長：不要管這個判決，只談起訴書。

拉科西：我要講這個判決書……

庭長：我們沒有在這裏宣讀過這個判決書。這個判決書並不屬於證據的一部分。

拉科西：那末，我不再提這個判決書。關於世界大戰方面，我所要說的是：匈牙利的統治階級並不是和世界大戰無關的。大家都知道，匈牙利政府也曾參加了戰爭的準備。世所周知，在最初的時候，伊思文·狄薩<sup>①</sup>是反對戰爭的，但是他的抗議不夠強硬，不足以阻止戰爭的發生。他的抗議所以沒有像儒勒·安德拉西<sup>②</sup>在一八七〇年時所提出的抗議那樣強硬，這是不難解釋的：當伊思文·狄薩證明出匈

---

① 伊·狄薩是一九〇三——一九〇五年和一九一三——一九一七年期間的內閣總理。——編者



牙利資產階級無法在戰爭中獲得任何細微的利益時，參謀部，在它方面，對他保證不論有無利益，戰爭在一二年內總是要爆發的。因此狄薩讓步了。結果，在某種程度上，他也應該對戰爭負一部分責任。

庭長：我禁止你發表這種談話。不要侮辱狄薩死後的令名。他是全民族的代表，並不是資產階級的化身。如果你繼續用這種口氣說話，我將不得不停止你發言。

拉科西：我也必須談到戰爭的目的。有一個舉世皆知的傳說，時常為人們喜歡提到：按照這個傳說，“我們”——就是說匈牙利的統治階級——我們絕對沒有個別的目的，匈牙利資產階級的目的，百分之百和中歐各帝國的目的是相符合的。這完全是一種傳說。我只須引用一個人的話來作證明。這個人的話，毫無疑問，是完全可以信任的。這個人就是德國前部長和副總理海爾弗里克。他對我們敘述說在一九一七年時締結和平的最大障礙，是德國的參謀部。德國參謀部不但想要保留比利時，而且還要保留法國的北部。人們可能說保留比利時和法國的北部對於匈牙利國家是有利的嗎？

海爾弗里克也講到媾和的第二個障礙，是德國和奧地利沒有能够在波蘭問題上獲致協議。奧地利願意使波蘭成為獨立國家，以安瑞納大公爵為國王。這個問題，在匈牙利資產階級看來，與它也是並無何種關係的。另一個例子：不可能和羅馬尼亞媾和的原因，是因為德國要求取得所有的鐵路，因此雙方無法達成協議。總之，在世界大戰時期，中

---

② 安德拉西(一八二三——一八九〇年)，政治家，起初是匈牙利文藝復興的積極鬥士，以後採取了和哈布斯堡王室妥協的政策而成為這王朝的首相。——編者

歐各帝國確定了無數的目標，都是與匈牙利資產階級的利益絲毫不相符合的。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條約的訂立，把二百萬平方公里的土地和五千萬居民從蘇聯的領土上分割出來，更是一個顯著的例子。誰敢說使一百八十萬佔領軍從尼瓦河前進一直到高加索山的南邊對於匈牙利資產階級是一樁有利的事情。說世界大戰的所有目標都確切地符合匈牙利資產階級的願望是錯誤的。

我曾經從起訴書上看出一九一八年十月間敗壞軍隊士氣的是那些派到前綫去的煽動分子。我必須聲明共產黨不可能派遣煽動分子到前綫去，因為那個時代共產黨還不存在。至於社會民主黨，它在那時還是擁護戰爭的，所以它也沒有派出煽動分子，更不用說資產階級的政黨。但是，如果前綫還是有煽動分子的話，這是政府自己派去的。譬如，一九一八年，政府鎮壓了總罷工風潮之後，為對數千名工會代表和罷工的組織者實行懲罰起見，把他們逐出工廠，送往前綫。這些人一旦到了前綫，自然不會鼓勵艱苦戰鬥的精神，也不會鼓勵熱烈奮發的情緒，這又何足為奇呢？

也應該指出，在同一時期，人們在前綫看到很多小冊子。這些小冊子並不是共產黨人和社會黨人散發的，而且也不是從匈牙利國內，而是從協約國的宣傳機構那裏發來的。負責領導協約國宣傳工作的洛斯彌爾勳爵和諾斯格里夫勳爵能夠很正確地說出有多少匈牙利的小冊子和別的小冊子散發在匈牙利前綫，散發在意大利和別的地方，但是沒有共產黨的小冊子在內。的確，洛斯彌爾勳爵和諾斯格里夫勳爵是百萬富翁，而不是共產黨人。

至於卡羅利問題，我所要說的是：我們把卡羅利和他的政府看作是我們的死敵。卡羅利一有機會，就使他的警察

迫害我們，把我們投入監獄，粉碎我們的頭顱。如果一切都要依靠他的話，我們是不會取得政權的。所以我沒有理由贊揚卡羅利，也沒有理由譴責他。但是我要指出卡羅利如何獲得聲望的一個事實。這個事實是：

世界大戰的結局如何，還沒有確定。很多國家對於戰爭的結局，寄予不同的希望。實現這些希望的唯一條件是和戰勝國聯合一起。這些國家爲了決心要使它們的願望獲得實現，竟肆無忌憚，無所不爲。大家都知道意大利從一個陣營轉到了另一個陣營。羅馬尼亞也是如此。各個不同民族也都巧妙地制定了一種政策，這種政策，用普通話來說，可以稱之爲騎牆政策。他們準備適應一切可能的變化。捷克人中間有一派是親奧派，也有一派是協約國的朋友。如果其他一個交戰國的情勢好轉，資產階級就立刻把槍桿轉換方向。我們知道在波蘭，這兩種派別都沒有，而只是畢爾蘇斯基本人主持一切，他首先是協約國的擁護者，後來又站到中歐帝國陣營裏去。

庭長：請你注意不要牽涉到與你敘述毫無關連的人士。

拉科西：這些人們永遠關心着他們自己的資產階級的利益。他們能够成功地保持了若干利益。匈牙利的處境也和捷克以及波蘭的資產階級的處境相似。匈牙利也預料到它和中歐帝國聯盟的政策可能招致災禍，也可以實行一種兩面政策。

卡羅利多少不自覺地成爲這種政策的代表。在世界大戰以前和世界大戰中的一段時期內，他發現匈牙利資產階級玩錯了牌。他以他自己的方式極力設法補救。如果卡羅利沒有成功，部分是由於卡羅利本人和他親信諸人的性情懦弱，以及在政治方面缺乏經驗，此外還有其他原因。但是

他的失敗的確是匈牙利一般政策中某些有力情勢所造成的結果之一。

我從這個問題上說到“人民代表制度”。我在這裏被控告是我取消了和消滅了人民代表制度。我不想對你們描繪出匈牙利人民代表制度的圖景，像它在學校課本上和法律著作中被描述的那樣。的確，這樣描述的人民代表制度，我是不認識的。我所認識的人民代表制度，是它在一九一八年實行的形式。那時有一個議會，它是立法和憲法的基礎。下議院有四百十三名議員，在最後一屆議會中，在這四百十三名議員裏，有二百六十七名是大地主。工業勞動者、農業勞動者和小土地所有者沒有一個代表。民族集團的議員在數字的比例上只佔國內少數民族最小的一部分。這種情形所以能夠發生，是因為從一八六七年到一九一八年中間，在選舉法方面從來沒有過重要的修改。所以十分之九以上的成年人是沒有選舉權的。結果百分之五的成年居民選出的議員就能够在議會中佔絕對多數。由於以下的事實，這種情形變得更為嚴重：一八六七年到一九一八年中間，有些地區的人口減少了，而別的地區的居民數目則大大增加了。在這同一時期內，布達佩斯的人口增加了四倍，雖然人口增加，但在議會中的席次自從一八六七年以來從沒有任何改變，這是一件盡人皆知的事實。結果是某些選舉區中人口減少：一九一〇年在德蘭斯瓦尼亞的一個選舉區中，一百四十二個選民可以選出一個代表，同時在戴來士瓦洛斯，一萬八千到一萬九千選民也只能選出一個代表。這就是說在德蘭斯瓦尼亞一個文盲所投的一票，價值相等於布達佩斯的大學教授、公務員和雇員一百人聯合起來所投的票。

所以這種情形很自然變成弊竇百出的源泉。選舉活像

一次軍事動員。我還記得四次選舉。這四次選舉使我回想起士兵在城內列隊進行的情形，回想起道路被阻斷以及憲兵和無數的人渾身血跡的情形。

在這種情形之下，民族政策、社會政策以及對產業工人所實施的政策，都在議會以外制定而成爲一個警察的實力問題，這又何足爲奇呢？一直到一九一八年爲止，警察局每年對於社會主義工人運動發表報告，如同它對於娼妓和犯罪發表報告一樣，這並不是偶然的。對於資產階級而言，這種情形是非常便利的：的確，它可以避免社會主義議員或是少數民族議員可能給它的種種麻煩。但是這種情形也有不利的一方面。第一個不利的地方：資產階級不認識社會問題，當它的最後賭注，警察和軍隊解體之後，爲了自衛起見，只剩下我們稱之爲思想武器的時候，它就茫然若失，不能用政治上的論據從事鬥爭了。情勢變得嚴重了。由於最後一次的選舉是在一九一〇年舉行的，因此，一直到一九一八年，政治上沒有嚴重的鬥爭。加以一八四八年和一八六七年的政治綱領在和平時期還能靈活運用，在大戰時期，就變得混亂了。的確，在戰爭時期，情勢轉變到這樣程度，以致有些集團強調繼續戰爭，別的集團則要求停止戰爭。這一切使舊時的種種觀念變得更加混亂。

在這種情形之下，由於幾十年來資產階級不知道應該如何應付社會問題，如何考慮國際政治方面所提出的重要問題，因此，一旦軍隊、警察和憲兵分崩解體之後，資產階級就束手無策了。從一九一八年十月起，匈牙利資產階級沒有能力產生出任何有價值的政治思想，任何可資應用的計劃。對於這個事實，它到今天還沒有認識到。我曾經問過貝靈蓋<sup>①</sup>政府的幾個部長，既然他們自己對於當時的情勢

無法找到出路，他們有沒有接受過某種援助。他們連這個問題的意義都沒有了解。他們無法懂得，即使在這樣的情勢之中，也能够獲得解決的辦法。資產階級政黨——包括卡羅利政黨在內——所能模糊地看到的唯一解決辦法，就是這個老辦法：靠着有組織的武力，靠着的一種組織，靠着反革命手段或是來自外國的支援來挽救局勢。這不是使用政治方法，而是使用暴力。但是在卡羅利執政的四個半月，資產階級因為沒有具備使用暴力的方法，遂致無法解決局勢。我們將要看到，由於資產階級的行動，結果不啻繼續為工人和共產黨人造成有利的形勢。

現在讓我們研究一下社會民主黨的情形。匈牙利社會民主黨是歐洲社會民主黨中屬於匈牙利的一部分，也是第二國際的成員。就總的方面來說，在該黨中間，可以同樣看到社會民主黨所特有的徵兆。在戰前的三十年裏，這些政黨的內部生活中，發生過重大的變動。工人中間，產生了一個較高的階層。這個階層的工人比普通工人較為富裕，收入較多，生活也較舒適。我們簡單地稱之為工人貴族。他們的生活水平和小資產階級的生活水平相似。按照馬克思主義者的觀點，決定思想方式的是生活方式。所以，在工人貴族中間，生活方式開始改變他們社會主義者的心理。他們已經覺得他們的生活不像以前那樣難以忍受。在以前那個時候，他們生活方面的經濟條件還不能使人滿意，還沒有得到改善。結果，由於它的經濟情形，這個無產階級中的上層開始抑止階級鬥爭了。他們繼續依戀於社會主義，看作一個遙遠的目的，但是在實踐上，他們已不再為社會主義從事鬥

---

① 貝靈蓋是卡羅利政府的司法部部長，自一九一九年一月十一日至三月十九日的短期間曾任總理。——編者

爭。這種情形後來表現爲一種理論。的確，理論往往是一種事實形態的後果。這種理論，我簡單地可以用如下的方式表達出來：“運動就是一切，最後目的是無關重要的。”

很顯然，生活舒適的工人階層愈擴大，公開主張這種原則的人數也就愈多。但是在匈牙利，這個階層還很薄弱，原因是匈牙利資本主義本身並不強大，在某種程度上，還依附於奧地利的資本主義。從匈牙利工人勞動中得來的利潤還要分給奧地利的資本主義。資產階級以自覺或不自覺的行動，保證這個工人的領導階層以相當重要的收入，藉以削弱其餘部分的無產階級。這個階層愈薄弱，愈不能完成這個任務。有如我們所看到的，匈牙利社會民主黨所以不能使無產階級離開革命的道路，有如奧地利和德國的社會民主黨所做到的那樣，主要是因爲匈牙利工人中富裕階層爲數極少。在千百萬工人加入工人組織的時候，這個富裕階層，還不足以把他們自己滿足的情緒感染工人羣衆，從而阻止工人羣衆的革命行動。

世界大戰也給社會民主黨一個嚴重的打擊。在動員的時候，它失去了半數以上的黨員。一九一四年時，工會會員有十萬零七千人，一九一五年有五萬三千人，一九一六年有六萬五千人。但是在一九一七年時，社會民主黨並沒有採取任何特殊行動，却有十六萬人加入了工會，和六萬五千舊會員聯合一起。只是這個巨大的數字，就足以證明，在無產階級中間，發生了一個非常的變動。這是來自俄國革命的吸引力在匈牙利發生的作用。但是社會民主黨沒有看出這種關係。它自己無法解釋這個數字所表示出的意義。

資產階級所遭受的困難，也打擊着社會民主黨。但是這一次，困難是相反的。資產階級沒有能够應付社會問題

和國際問題。在社會民主黨方面則缺乏在全國範圍作政治活動的經驗。結果，社會民主黨人同樣無法在政治生活中和在他們自己的組織中做好工作。所以，當革命爆發的時候，社會民主黨由於它的黨員人數衆多，自然而然地佔據首位。

當革命發生的時候，當警察四散、憲兵躲避的時候，社會民主黨成爲全國唯一的重要組織。顯然，在革命最初時期，社會民主黨自己也沒有估計到自己的力量，尤其因爲布達佩斯發生革命是在一九一八年十月三十一日，那時，維也納和柏林的革命還沒有發生。幾十年來，匈牙利社會民主黨習於效法這兩個城市的例子。結果，社會民主黨在最初的時期，採取了極謹慎的態度。

但是在一星期或是十天工夫中間，情形完全改變了。第一是因爲軍隊已經全部解體。在布達佩斯已經沒有任何軍事組織。因而，雖然社會民主黨不能被看作是一個維持公共秩序的機構，但是在它的工會會員中有好幾千舊時的軍人，這些人可以立刻聽候卡羅利政府的調遣。從第一天起，社會民主黨就把三百名工會會員編成軍隊，這些都是舊時軍人和可靠的人。是他們在最初的幾天中恢復了秩序。後來也就是從這個隊伍裏產生出民兵。民兵在開始的時候只有三百人，但是在公社宣告成立的時候已經有一萬人了。在所有別的方面，發展情形也大致相同。卡羅利政府的部長們曾經在這裏詳細敘述過資產階級怎樣把武器交給了工人。資產階級連夜間在他們自己的大門口站崗戒備都不願意。他們把這個任務交給了工人。

奧地利和德國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立刻採取一種較爲劇烈的社會鬥爭形式，同時也鼓勵無產階級自發地去奪取武器。我們都知道，從德國的革命中產生出的所謂蘇維埃



共和國，社會黨人和獨立社會黨人都曾經參加在內。共產黨人沒有參加：他們拒絕了人家分配給他們的部長位置，因為他們不想在一個有謝德曼擔任閣員的內閣中擔任職務。在奧地利成立的政府中，總理和軍政部長都是社會民主黨人。新共和國取名為“社會主義人民共和國”。在這種情形之下，很自然地，在國際方面，社會民主黨的重要性也大為增加。因為不久在舊時各同盟國的領土上，取得政權的將是他們的同志。

除了上述因素之外，還有另外一個因素：一方面回到了自己村子裏的復員軍人，另一方面村子裏原有的居民。這些人自動地趕走了鄉公所的秘書，以及他們所厭惡的憲警。在很多地方，他們也趕走了當地鄉紳，鄉紳們只有在布達佩斯尚可安身。社會民主黨，正像它在布達佩斯“恢復秩序”那樣，也找到方法在省裏如法泡製。

很自然地，這一切使工人階級的覺悟提高，使資產階級的精神受到打擊。因此產生了一種真正的恐怖氣氛。這種恐怖氣氛部分地表現為——卡羅利政府的部長們曾經充分地敘述過——大家都急急地對新制度表示服從，急急地要求宣佈成立共和國。國內沒有一個人表示絲毫的反抗。我特別要指出這個事實，因為我們在一九一九年三月二十一日的事變中，也看到同樣現象。

不但人們破壞了資產階級的舊機構，而且，有如我們剛才所聽到的，資產階級的舊機構本身也自行解體；這一切使社會民主黨的力量，也就是工人階級的力量增強了。下議院沒有絲毫法律上的根據，自行宣佈解散。國王退位，上議院延期召開。總之，資產階級的舊機構已經在瓦解之中。資產階級顯得自己沒有能力組織新機構。再則，在舊的工

人組織以外，又加上了性質異常重要的新機構：首先是工人蘇維埃和士兵蘇維埃。

工人蘇維埃的真正創立者是無產階級。所以這個機構並不是社會民主黨建立起來的。這個機構是在俄羅斯蘇維埃共和國的影響下，在匈牙利自發地成立起來的。我不能正確地確定這個機構的目的。它的目的大概是和士兵蘇維埃的目的相同的。士兵蘇維埃所規定的目標是：“保證維持革命的勝利果實，士兵蘇維埃是一個監察機關，使將士完全和士兵一樣享受到社會的保障，這種保障是人民共和國全體公民都有權享受的。”所以，工人蘇維埃和士兵蘇維埃的目的是概括性的，它們並不是一種執行機關。

但是一個機構的真正任務和它的意義不是這個機構從而產生的章程或計劃所能確定的。確定一個機構的任務和意義的是它的表現，它所代表的力量。士兵蘇維埃和工人蘇維埃是士兵和工人意見的直接代言人，是工人羣衆精神最重要最正確的晴雨表。所以，雖然它們沒有絲毫行政權力，它們的重要性却自動地增加起來。

關於這一點，值得提出一個曾經在這裏提到過多次的問題：一九一八年的革命性質是什麼？是社會主義革命，還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我的答覆是：

最初，毫無疑問，一九一八年的革命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這就是說在卡羅利政府的初期，舊時的生產工具所有人繼續持有這些生產工具，大地主繼續保持他們的土地，工業家繼續保持他們的工廠，銀行家繼續保持他們的銀行。但同時，一切都像在克倫斯基的革命時期一樣，未來的無產階級國家的機構，就是說工人蘇維埃和士兵蘇維埃，就已經存在。從第一天起，真正的權力已經落在這些機構的掌握

之中。但是它們自動把權力交由卡羅利政府支配。事情經過的方式完全和俄羅斯的情形一樣。有人稱卡羅利政府爲匈牙利的克倫斯基政府，這不是偶然的。

在匈牙利像在俄國一樣，吸引兵工蘇維埃注意這個事實，並說服它們，叫它們把它們自動讓出的權力重新收回，這一項歷史性的任務也落在共產黨的肩上了。自然，爲要達到這個目的，只有一個方法是可用的：必須得到工人蘇維埃和士兵蘇維埃所依靠的工人羣衆和士兵羣衆多數的信任。這就是共產黨的任務，它的目的，也就是它實施的計劃。有如我們已經在這裏說過的，共產黨開始活動是在十一月中旬。直到今天，社會民主黨各部長們和卡羅利政府的部長們還不能指出共產黨用了何種方法，何種手段，終於使羣衆脫離資產階級和社會民主黨人。這些羣衆無論在組織方面或是在形式上，以前都是受着資產階級和社會民主黨的影響的。我將盡力描繪出當時的情形。

毫無疑問，共產黨在最初的時候就較社會民主黨佔有極大的優勢。其所以如此，一方面是因爲社會民主黨在議會中沒有代表；另一方面，他們對全國性質的重大問題和國際政治問題都缺乏經驗。相反的，關於佔領國問題和一切國際政治問題，共產黨從最初起就能夠提出一個完整的、經過詳密擬定的計劃。首先它能夠對工人們所最關切的問題，俄羅斯蘇維埃共和國問題，發表意見，而且它發表的意見完全使人滿意。在這個問題上，社會民主黨人還沒有確定的意見。自然，有些社會民主黨人暗中贊成蘇維埃制度，但是社會民主黨正式採取的態度是反對和拒絕蘇維埃制度的。匈牙利工人們本能地，或是在舊時戰俘和他們自己的階級意識的影響下，在最初就對蘇維埃制度，寄予同情。

這裏是我們的第一張王牌。但是社會民主黨也有它自己的弱點，這是在戰前就有的，而不是一瞬間所能擺脫的。它主要的缺點，是它只代表產業無產階級的上層，這些工人貴族多少抱有一種驕傲的心理。世界大戰結束之後，有數十萬復員軍人和失去工作的失業者。這些失業者們的失去工作，不是由於他們本身的過錯，部分由於政治方面的崩潰，部分由於經濟方面的情況。社會民主黨對於這批羣衆，束手無策。可是共產黨却能夠領導這批羣衆，給予他們所懷的希望以一種具體的形式。十一月和十二月間，五十萬新參加者壯大了工會的隊伍，這樣，就有七十五萬人是會員工人了。只是這個事實就使社會民主黨人繼續實施他們舊時的政策成爲不可能。

社會民主黨人不懂得辯證法的過程，按照辯證法的過程，哪裏有量的變化，哪裏也就有質的變化。因此，它繼續對那些羣衆實行和平時期的舊辦法。它並不利用它隊伍中最優秀的分子來這樣做，而動員第二流和第三流的分子。的確，它隊伍中站在最前列的分子，是資產階級的部長、副部長和州長們。然而這些人別有所事，對於無產階級的利益，無暇照顧。這樣，自然而然地，照顧廣大羣衆的任務就落到了共產黨的肩上。是社會民主黨自己促使共產黨盡力於羣衆工作。它拒絕給予共產黨一個新聞機構。詳細情形已經在這裏充分地敘述過：貝靈蓋政府的部長們曾經說，正是社會民主黨的兩位代表在部裏建議不必禁止共產黨的報紙，而是拒絕發給它印刷報紙的紙張。這個計劃實行了。共產黨沒有了報紙，雖然報紙是最重要的活動工具之一。它就不得不直接口頭向羣衆說話。這樣，社會民主黨，雖非出於本意，却使共產黨走上了有利的道路：因爲個人的接觸是說服

羣衆的最好方法。

過了三四個星期以後，就是說過了一段很短的時間以後，資產階級和社會民主黨發覺在工人運動中間，在社會民主黨旁邊，突然產生出一種新的力量。但是他們仍然不能夠找出打擊這種力量的辦法。前部長巴洛奇曾經在這裏敘述過他和卡羅利與洛瓦齊<sup>①</sup>所進行的秘密談話。談話中洛瓦齊曾經問過，如果他們沒有別的方法，是否應該請求協約國來幫同阻止匈牙利工人階級愈來愈顯著的向左轉變的傾向。卡羅利——我一直相信他是認真看待民主制度的人——在這種情形之下，竟毫不遲疑地聲稱：如果洛瓦齊能夠從協約國方面獲得有力的援助，足以阻止工人階級左傾的趨勢，那末他願意把政權讓給洛瓦齊；這個消息使我驚駭不置。如果在這種情形下，民主主義的主要人物尚且準備請求外國的援助，不惜利用反革命的手段，那末，在無產階級專政和公社還沒有取得政權的時候，資產階級用全部力量來從事反革命的企圖，在我看來，更不足為怪了。至於這種反革命企圖，這裏已經提到過。巴爾那·蒲柴<sup>②</sup>曾經講過人們給予斯姆雷薩尼<sup>③</sup>和他的朋友們四百萬匈幣，要他們把捷克人從國內趕走，並且要他們組織一支軍隊。公社失敗之後，參加這些事件的若諾·巴爾篤斯向蒲柴聲稱，他們在趕走了捷克人之後，還要進軍布達佩斯，趕走卡羅利和他的政府。此外，很多大同小異的思想曾經發生在卡羅利政

---

① 卡羅利政府的教育部長。——編者

② 一九一八年卡羅利政府的農業部長，繼任貝靈蓋政府的農業部長。——編者

③ 路意·斯姆雷薩尼（一八五一——一九四三年）是埃格爾城的大主教。——編者

府時代。

以上種種的後果是：既經沒有人真正想趕走塞爾維亞和捷克的侵略者，既經大家都在作各種內容複雜、以後顯得無法實現的計劃，於是捷克人和羅馬尼亞人至少部分地利用時機，向前推進，沒有遇到絲毫抵抗。在這樣情形之下，本來二三千人就可以實現一種真正的奇蹟：以對外政策的觀點來看，這也是非常重要的。的確，爲了支持他們的要求，捷克人和羅馬尼亞人不停地揚言當地居民沒有對他們進行任何抵抗。從文件中可以看出像斯姆雷薩尼所實施的那一類的企圖，並沒有認真地顧到對捷克人或是對其他無理侵入者的鬥爭。我只給你們敘述一件事情，這件事情可以表現出那些企圖的真正性質。凱蘭門<sup>①</sup>曾經敘述過斯姆雷薩尼在拉斯洛·馬加沙齊<sup>②</sup>、巴拉維西尼和罕貝什<sup>③</sup>的協助下所實施的企圖。當時所定的計劃是：藉口在埃爾斯庫瓦城阻止捷克人的前進，把軍隊集合起來，然後進兵“紅色的布達佩斯”。但是人民共和國把所有這些部隊都解除了武裝。人們把馬加沙齊罷免了，因爲對他失去了信心。總之，凱蘭門的意見認爲反對捷克人的計劃只是一種藉口。他的立論是以經濟上各種理由爲根據，這些理由不但事屬可信，而且是非常明顯的，可以列舉如下：百分之六十左右的國土已經喪失，在僅存的土地上，舊時的大地產，一千畝以上的大地產絲毫未動，大地主階級的政治見解是由以下兩途所決定

---

① 塞格德城反動政府的內政部部長。——編者

② 霍爾第的幫兇，白色恐怖的領導人之一。——編者

③ 儒勒·罕貝什（一八八六——一九三六年）是匈牙利種族主義者的主要代表者，曾任國防部部長（一九二九——一九三二年）及總理（一九三三——一九三六年）。——編者

的：或者匈牙利保持全部、至少一部分原有的領土，同時進行徹底的土地改革，必要時把所有大地主的土地予以分配，這是可能的或者是可以想像的。或者，匈牙利將被分割，領土減少到目前的九萬三千平方公里；但是在這個面積上，百分之四十二的土地仍繼續屬於一千畝以上的大地主所有。

顯然，大地主並不為匈牙利設法挽救國家即將失去的百分之六十二的土地，而是千方百計找尋方法，使他們能夠為自己保持所餘下的百分之三十八的土地。

自然，軍政部長巴爾塔曾經試盡一切方法。布萊特將軍說巴爾塔曾想要採取對抗的措施。這些對抗的措施是宣傳，是建立軍官營、大學生營，徵募現役下級軍官來增加員額，成立輕騎兵隊伍和警備隊伍。自然，使這些隊伍服從於舊時的紀律這同樣是可能的。

這個事實是具有極端重要性的。士兵們立刻看出這種情形。他們不再願意接受舊時的秩序和舊時的紀律。所以這個企圖促使軍政部長巴爾塔去職了。

在凱蘭門的著作第四百二十頁上，凱蘭門引述了塞格德政府所繕的一段記錄，這段記錄敘述弗里特利克如何資助那個企圖，把三千萬匈幣交給德蘭斯瓦尼亞的軍隊支配的情形。我引述如下：

“外交部長聲言在那個時候，伊思文·弗里特利克，卡羅利政府的軍政部長，曾經從國庫中撥出三千萬給德蘭斯瓦尼亞軍隊，作為軍事上的用途。”

我們在這裏聽到，在這一筆款項中，德蘭斯瓦尼亞師團只拿到五百萬，其餘的二千五百萬都撥作了別的用途。對於這些用途，我不想在這裏多講。

所以，資產階級不知道利用在它面前展開的一切機會。

自然，巴爾塔想藉以發動一個全國範圍的宣傳運動。但是此事必須要資產階級也直接和軍人們接觸，有如共產黨人與社會民主黨人和軍隊直接接觸一樣，然後才能把他們爭取過來。這個任務不但複雜、而且困難，因為資產階級沒有這種習慣。的確，從一八六七年到一九一八年中間，它可以不需要這種活動。在卡羅利內閣成立後的最初幾個星期中，人們在書店裏購買所有可以買到的社會主義著作。資產階級以熱烈的情緒盡力在幾個星期中把他們在幾十年長時期中所忽視的事情都追補回來。但是這些努力，徒勞無益。他們沒有和軍隊進行直接的接觸，因為他們無法答覆士兵們必然會提出的使人為難、令人發窘的問題。同樣，這種宣傳只會愈益加強正在軍隊行列中展開的左傾趨勢，完全像反革命的企圖也促使工人運動左傾一樣。這是唯一的結果。

至於這種宣傳的技術問題，我只想指出，共產黨在最初的時候就把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在軍事組織和武裝力量上面。這正是根據俄國革命所得到的經驗，同時吸取了馬克思主義全部歷史的教訓。在當時，這種活動是合法的。由於當時士兵有權參加任何政黨，因此，所有政黨也同樣有權在士兵中間進行宣傳。即使人們對共產黨拒絕了這種權利，共產黨是依舊會行使這種權利的。但是既然有這種權利，那末宣傳自應認為是合法的。

自然，在最初的時候，共產黨人在軍隊中間也已站穩。隨後，還不到一個月工夫，所有失業者的團體、復員軍人、青年組織都集合在共產黨的周圍。共產黨人也走進了最重要的工廠。社會民主黨的全部重要組織都加入了共產黨。貝靈蓋在他一九二〇年所作的供辭中——供辭已經歸檔——



說：十二月中旬，孔費<sup>①</sup>談到在他和冶金工會代表會談時，這些代表接受了他的建議，他認為這是他對共產黨所取得的最後一次勝利。可是孔費和加拉米<sup>②</sup>同是社會民主黨中最著名的人物。他是一個較加拉米更為熟練的政客，而且是一個出色的演說家，但是，當他在冶金工人中間，也就是在工人運動最重要的崗位上，他自己也覺得他是落在共產黨人的後面了。

結果是，當社會民主黨發覺它無法在思想方面打擊共產黨人的時候，它就不再利用思想武器，而乞援於武力了。這種利用武力的辦法必須具備兩個先決條件。首先必須在政府中佔有更大的地盤，這就使內閣具有更顯著的社會主義色彩。如果對共產黨人的迫害來自一個社會主義分子佔着優勢的政府，工人將接受這種迫害而不感到十分厭惡。另一方面，工人們要求更多的參加政府事務，因為，有如我已經說過的，力量的均勢已經變動，因而社會民主黨的統治力量已經達到了軍隊。

各種不同的武裝組織，以及德國和奧地利的社會民主黨政府，這一切促使社會民主黨提出比在最初幾天中所得到的更進一步的要求。卡羅利和他的左右躊躇不決。反對巴爾塔的示威運動是一個輕微的壓力的結果，這是共產黨人所首先發動的。人們在士兵蘇維埃中提出了巴爾塔的計劃。這個計劃在會議中引起了一片憤激之聲。爲了對抗共產黨人，爲了不願失去他的多數，保格尼立刻贊成共產黨人

---

① 西吉斯孟·孔費（一八七九——一九二九年）曾於一九一八年任勞工和社會保險部部長，繼任貿易部部長。一九一九年，他任教育人民委員會委員長。——編者

② 卡羅利政府的貿易部部長。——編者

的建議。保格尼的活動具有這種特點：他敢作敢為，能夠和共產黨人互相抗衡，同時他依舊是社會民主黨人，始終不變。一般的情勢、共產黨人的在場，這一切使他不斷左傾。整個工人運動也是因為這同樣的理由而向左轉。資產階級自然不明白這種內部聯系，只看到保格尼站得更左罷了。

有如我們所知道的，社會民主黨人確實擴大了他們的地盤。一九一九年一月，在經過將近一個月的內閣危機之後，政府實行改組。社會民主黨要求內政和軍政兩部，但它只得到了軍政部。關於這件事布萊特寫道：

“鮑姆的被任軍政部長，從此最重要的國家權力機構，就是說軍隊，確定地落入了社會民主黨的掌握之中。由於這個事實，最高司令部從此將受到一個政治集團的決定性的影響。這個政治集團，有如我們後來可以證實的，和布爾什維克的區別，只在方法上略有不同。”

在成功地完成了這第一步之後，社會民主黨對共產黨人開始進攻了。國際形勢也有利於這種作法。果然，一月十五日，諾斯克向共產黨進行攻擊。他從中指使殺害了李卜克內西和羅莎·盧森堡，在一場大屠殺中粉碎了左派革命分子的反抗。

就在那時開始了在這裏已經討論過的騷動和示威行動。是社會民主黨在完全知情的情況下組織了反共產黨的暴動。社會民主黨人曾經指出，他們在羣衆集會上，在工廠和工會裏，僅用論據無法阻止共產黨人的進展。在伯爾尼所有的接洽也是這個政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社會民主黨人所以在卡羅利政府中要求更多的部門，部分是因為他們自以為靠了他們的國際關係，只要在政府中增加社會主義的

勢力，就可以得到更有利的結果。事實上，在伯爾尼，當孔費和他的兩位同伴出場的時候，他們曾表示反對佔領。是的，但是匈牙利資產階級完全不了解一般國際問題，特別不了解國際工人運動。它完全不明白第二國際的任何一個機構所通過的決議能夠有什麼效力。它也不知道，一般說來，是否應該重視這項決議。事實上，伯爾尼會議只是凡爾賽會議的先聲。一如後來在凡爾賽所發生的情形相似，法國社會民主黨人攻擊德國社會民主黨人，迫使他們在一項宣言上簽字，承認自己的罪行。社會民主黨人猛烈地攻擊侵略者。但社會民主黨人對於捷克人、羅馬尼亞人、塞爾維亞人，却有力地堅持他們的佔領是合法的。所以他們所做的和資本家們如出一轍，不過注意到要用一個動議案來隱蔽真相罷了。這個動議案的主要之點是第二國際在原則上願意到處實行公民投票。這只不過是爲了蒙蔽羣衆的視聽。所有認識工人運動的人都知道沒有一個國家的社會民主黨人是重視這個動議案的，而且實際的情形也正是如此。在公社時期，我們曾經建議在匈牙利北部舉行公民投票，捷克的社會民主黨人極力反對。當聖日耳曼和約把匈牙利西部分給奧地利時，所發生的情形亦復相同。

但是匈牙利資產階級不承認這個決議只是一張毫無結果的廢紙。匈牙利資產階級既然不能得到任何人的支持，它能夠抓住這個救星，已經算是很幸運的了。但它也得付出代價。當人們獲悉了威克斯上校<sup>①</sup>的照會之後，它應該看出那個決議沒有發生絲毫效果。

① 法國威克斯上校在照會中以協約國的名義建議爲匈牙利劃出一條新的疆界綫，根據這條新的疆界綫，匈牙利喪失了得布勒珍和馬科兩處領土。——編者

在共產黨人的力量日益發展的面前，社會民主黨人只在等待時機，用武器來對共產黨人實行打擊。已經有過一次，這樣的機會來到了，這就是在薩爾哥達仁的工人立意要把全部煤礦區實行社會主義化的時候。那時，社會民主黨人立刻決定實行了。在該黨的領導下，卡洛里·貝耶<sup>①</sup>以政府委員的身份把這個計劃的實施掩沒在血泊之中。可是這樣的對付共產黨人是沒有絲毫理由的。

人們曾經討論過究竟共產黨人有沒有進行武裝襲擊這個問題。如果我沒有記錯的話，是加洛里·狄茨<sup>②</sup>在他的供詞中說他在一月底的時候，曾經一度向司法部或是內政部報告他所得到的情報，他根據這些情報提議控告共產黨人；但是這些情報，經過一個名叫奧萊爾·朗蓋爾的詳細研究之後，認為並無充分理由。所以在一月底，政府當局的意見還以為共產黨的活動不能構成起訴的理由。自然這不是說共產黨沒有有條有理地利用一切可能的方法。可是像前部長若諾·瓦斯和狄茨在這裏所講的一類故事，我們可以肯定地說是和共產黨的實際不相符合的。若諾·瓦斯說武裝的共產黨士兵在城裏橫衝直闖，不問情由隨便開槍。狄茨也說共產黨備有一支五百人的警衛兵團。如果共產黨沒有合法的方法，它就會用不合法的方法來進行鬥爭。但是既然無須藉助於不合法的方法，它就不這樣來進行鬥爭了。對於共產黨，用不合法的手段來從事鬥爭，是一種出於

---

① 卡洛里·貝耶是社會民主黨中央委員，工會全國委員會總書記。在無產階級專政失敗後，依靠了協約國的支持，他做了拜德勒政府的閣員。他曾經投票贊成準備第二次世界大戰的軍費。他為英國情報部活動，在解放後被發覺，就逃亡於外國。——編者

② 霍爾第的政治警察長。——編者

萬不得已的痛苦的办法，被迫出此。如果它不是被迫的話，它寧願不藉助於不合法的手段。

對“人民之聲報”報館進行攻擊的故事，同樣屬於這一類的思想。這次攻擊和社會民主黨的計劃恰相符合。在那個時候，社會民主黨人，一如德國社會民主黨人所做的一樣，決定對共產黨人實行武裝進攻。他們有此必要，因為一方面他們要對資產階級表示自己是值得他們信任的；另一方面，他們不可能用思想力量和共產黨人相抗衡。如果這樣的示威運動沒有發生，這是由於社會民主黨人想藉另一個事端來對共產黨人採取行動。這是完全確實的，尤其爲了準備進攻，在鮑姆被任部長之後，兩個星期內共產黨人被追離去所有可以想像的位置。共產黨人被排斥在工人蘇維埃和士兵蘇維埃與社會民主黨以外。有人甚至威脅着說要把共產黨人排除出工會。

對“人民之聲報”報館示威的消息到達社會民主黨人那裏的時候，他們正在勒杜脫廳<sup>①</sup>開會。從“人民之聲報”報館到勒杜脫廳的路程，步行至少需要半小時的工夫。羣衆前進得很慢。“人民之聲報”報館當局和社會民主黨的領導者立刻懂得這裏是一個武裝干涉的機會。由於莫沙尼街的警察營房就在附近，示威羣衆立時遇到一大羣警察。我不想敘述這個事件的詳細情形。事件是發生在晚上，但是在衝突發生的時候，沒有一個證人，沒有警察廳長，沒有內政部長或司法部長，瓦利也沒有在場；因此，絕對沒有一個人能夠報告一個足以證明共產黨人曾進行械鬥的事實。而且共產黨人沒有絲毫理由這樣做。因為他們如果開槍射擊的

---

① 布達佩斯的一家音樂廳，往往供作政治集會的場所。——編者

話，他們就是爲一個對自己的鎮壓運動敞開了大門。社會民主黨的領導者是完全明白這一點的。他們知道並不是共產黨人開槍。但是他們故意不把這個事實的真相傳播出去。相反的，正是他們把這個事件“介紹”給輿論。他們在報紙上發動攻勢。第二天他們不但要求逮捕共產黨人，而且要求解散共產黨。

他們決定在第二天組織一個巨大的示威運動。這個示威運動的確發生了。

現在我要檢查一下拘禁共產黨人的一段經過，並且要探求如果人們不以適當的方式對待我們，而給我們以粗暴的待遇，將會變成什麼樣子。

在三天的時間，大家都已經知道共產黨人和械鬥一事是毫無關係的。一個星期之後，全城都對這事議論紛紛。在這種情形之下，把共產黨人當作普通犯罪者看待，簡直是不可能了。從純粹法律觀點來看，對有殺人嫌疑或有指使殺人的嫌疑的人予以逮捕，這是可以理解的。五天之後，控訴雖然撤消了，但是由於三星期以前，他們曾經鼓勵暴動，鼓勵暴動是應該處罰的，因此他們還繼續被拘，這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像對“人民之聲報”報館的示威這個事件既然那樣大吹大擂，既然在第二天組織總罷工運動，提到這個問題好像是有損共產黨名譽的一個污點，最後，既然一星期以後，發現這只是虛張聲勢，共產黨人的繼續拘禁，並不是由於以前說過的理由，而是因爲一個月以前，甚至是一個多月以前他們曾經鼓勵暴動，那末，在這種情形之下，羣衆認爲這種做法實不公道，這是非常自然的。既然把共產黨人像普通犯罪者一樣繼續拘禁在監獄裏，人們就絲毫不會改變這種感想。這樣的措施，會使共產黨人所受的苦難顯得更

爲殘酷。羣衆會說：證據確鑿，他們是無辜的，但是他們還是受到了嚴刑虐待！

此外，我不能了解，爲什麼人們對於這個問題如此反復研究。人們責難我們會受到優越的待遇，但是如果我們的待遇和普通犯罪者完全相同，那末今天在政治上所產生的後果，嚴重將十倍於此。在我們共產黨人看來，這個問題是不值得注意的。

更重要的是這次逮捕共產黨人事件標誌着共產主義運動的一個巨大飛躍。的確，在最初的兩三天中，好像我們即將完全被消滅，所有我們的辦公處所悉被封閉。人們把在會議上發言的共產黨人趕走，把共產黨人從警察、憲兵、軍隊中排斥出去。人們會說共產主義運動從此完了。但是這種印象只不過繼續了兩三天。

當人們對我們進行逮捕的兩三天中間，共產黨好像到處都生下了更深的根。在共產黨人或被趕走、或被迫離去的位置上，立刻出現了從同一羣衆中來的別的共產黨人。加洛里·狄茨自己也曾表示過這樣的意見，他說，當他開始清除警察和民兵中的共產黨分子時，共產黨勢力增長的速度超過了清除那些共產黨分子的速度。同樣的現象在別的一切組織中也可以看到，尤其因爲共產黨非常熟識這個計劃。例如二月二十日的晚上，共產黨的領袖們從六個不同的地方，甚至從社會民主黨的領導者方面，得到報告，說就在當夜，人們將把他們逮捕。但是共產黨決定每個人都留在自己的崗位上。

我們如果逃避，我們就自己提供了我們自己有罪的藉口和證據。否則我們爲什麼要隱匿呢？這就說明了爲什麼名單上所列的四十八人中竟有四十人是在自己的住所被捕

的。我們知道得那樣清楚，我受到委託從黨部運出書籍、打字機和宣傳資料，因為我們都知道第二天黨部已經不能使用了。

這一切並不是偶然的結果，事實上我們得悉，社會民主黨受了資產階級的吩咐，準備打擊我們。我們的預防措施之一是事前組織第二個中央委員會，甚至第三個中央委員會。這樣，在兩三天之後，共產黨的工作就恢復了，可以說沒有遇到絲毫阻礙。二月二十四日，第一次人民大集會已經舉行了。這次集會的確並不是在共產黨的旗幟下召開的。但是會議上提出的要求之一，是釋放被拘禁的共產黨人。三月一日，“紅色報”又發行了。從這時起，共產黨重新恢復了它的活動，雖然是不合法的。

經濟方面的情形，特別是通貨膨脹，在羣衆中引起了革命情緒。在這時期，通貨膨脹是一個新的現象。舊時的工會領袖和工人們都不認識這種現象。這是這個現象在日常生活中所發生的直接影響：在經過兩三個星期的劇烈鬥爭之後，工人們終於和工業家直接訂立了集體合同；但是又過了兩三個星期之後，他們發現集體合同的價值竟等於零；因為在這一時期中，物價上漲了百分之三十。因此工資的價值也就降低了。於是一切必須重新開始。自然這使在最保守的工人頭腦中也產生出這樣的思想：可能是資本主義本身有了毛病。

在上述因素之外，還要加上別的因素。這些因素，有如下述：我們知道資本主義的生產是以利潤為基礎的。工業家使人勞動，以便從勞動中榨取利潤。如果他們得不到利潤，他們就把工廠關閉。在世界大戰期間，利潤相當豐厚。工業家們替自己辯解說：一俟戰爭結束，一大部分利潤將從



戰時生產轉變到和平生產的過程中被吸收進去。從戰時工業轉變到和平工業的時候到了。但是在這種情況之下，工業家並不願受到損失。當他們在工廠裏的收支對照表上發現虧損時，他們就不顧工人們的命運，直截了當地設法關閉工廠，因為這樣做對他們是更有利的。加以他們並不缺乏藉口，於是他們就開始利用這種策略。他們藉口缺煤。很多次，工業家們出賣他們儲存的原料，以便有關閉工廠的藉口。特別使人感到憤慨的是看到有些工廠出賣的物資是世界大戰時拆下來的門把手和大鐘，以引致物資缺乏，使他們能夠停止工作。

總之，無產階級認識到了工廠不顧廣大羣衆的需要來破壞生產。在一些大地產和一般地主方面，情形亦復相同。在這一方面，情形是這樣的：卡羅利政府對來自下面的巨大壓力實行讓步，決定實施徹底的土地改革——至少在他們看來是徹底的。這個土地改革的方式如下：大地主家庭每一個成年人口有權保留五百畝土地，餘下的按照適當的規章和保證讓給享有土地改革利益的人。但是這個計劃如此複雜，如此模糊，簡直使羣衆感到不快。這個計劃在大地主看來是太徹底了，而對於羣衆則不夠徹底。結果是大地主完全和資本家一樣，開始破壞生產。的確，他們不知道誰將收穫他們在春天所播種的種子。他們盡力出賣一切，拖延春耕，出賣家畜，不願和農業工人簽訂合同。總之，土地所有權問題成爲刺激神經的根源，正像工廠問題使工人精神動盪不定一樣。

（庭長命令中止審問十分鐘）

拉科西：我剛才約略敘述了使工人們左傾的經濟因素。我應該指出，供應問題同時也變得非常嚴重。卡羅利政府

的供應部部長對於這個問題已經在這裏講得很多。就在這樣的環境中，共產黨宣佈了它的綱領。我想法庭是知道這個綱領的。我原想在這裏陳述這個綱領中有關對捷克人和羅馬尼亞人作戰的部分。但是天色已晚，我完全略過這個問題不談。顯然，這個綱領在工人中間引起了最大的興趣。在每一個工廠、每一個企業、每一個組織中，人們都討論着這個綱領，絕不認為這個綱領是不能接受的。社會民主黨的右翼不知道業經發生的向左轉的巨大趨勢。三月十三日，“人民之聲報”發表社會民主黨的選舉綱領時，還非常激烈地攻擊共產黨人。就在這次攻擊的後一天，塞格德城的工人蘇維埃，在共產黨人的推動下，取得了這個城市的政權。這是在三月十四日。

十七日，小地主階級分子的部長，納佳達地柴波來到薩玻爾奇州的時候，在他面前有武裝起來的二萬農業工人向他要求准許他們佔領土地。如果說在外多瑙河區有反革命運動，這等於把神話當作了事實。上述二萬人就是一個左證。這一帶是大地產所在的地方，也是農業無產階級分子最多的地方。農業無產階級分子多的地方，也就是革命分子多的地方。向納佳達地柴波提出要求的二萬農業工人就提供了證據。從亞爾培蒂亞瓦、從貝萊格和皮漢傳來的消息說，在那些地方，人們也在佔領土地。報紙講到這些事件時寫道：“紅色的浪潮沖擊着布達佩斯的城牆”。十九日，在社會保險部門前舉行了人民集會。二十日，排字工人罷工，同日像霹靂一聲，交來了威克斯的照會。由於有人報告共產黨將於三月二十三日召開它的第一次盛大集會——這是共產黨在它的機關被封以後所組織的第一次人民集會，於是局勢顯得更緊張了。人們一般害怕這個集會在社會民主

黨人和共產黨人之間要引起流血的衝突，使資產階級有從中漁利的機會。

在這種情形之下，無產階級中一部分思想周密的人盡力設法避免鬥爭。事件的結果是排字工人發動了罷工。這次罷工顯示出當時無產階級的心情。排字工人是工人階級的極右翼：他們是生活在最優越的物質條件中的工人。三月二十日，爲了經濟方面的要求也發動了鬥爭。但是恢復被拘禁的共產黨工人的自由，也列在他們的要求之中。第二天中午，他們甚至要求實行無產階級專政了。所以，即便工人階級中的保守分子也已受到了共產黨的影響。

人們在這裏對威克斯照會已經講得很多。人們指出這個照會的影響是如何巨大。但是人們沒有一一檢查那些數字，從這些數字上才顯出照會的真正意義。威克斯照會意味着，不但是喪失蒂薩地區以東的二萬五千平方公里，還喪失全部羅塞尼亞，又是一萬五千平方公里。此外，照會尚包括整套很嚴重的割讓計劃。大家都知道，奧地利將取得匈牙利的一部分。大家也知道，還有一個捷克—南斯拉夫走廊計劃。這個計劃看來和人們早已知道的、把德國全身割成兩段的波蘭走廊一樣真實。大家看到這個計劃的結果是匈牙利的領土將被粗暴地割裂殘破。實現這個計劃，就是直截了當地把匈牙利割去幾近一半的國土。今天，人們已經忘記了這個計劃，但在當時，反響是巨大的。所以卡羅利政府對於當時局勢，沒有別的出路，只有成立一個完全由社會民主黨人組成的政府。

卡羅利內閣和整個資產階級對於工人問題的無知到了那樣的程度，甚至社會民主黨已經不能在自己黨內掌握一切，大部分黨的羣衆已經轉向共產黨人。這些情形，他們沒

有感覺到。上述的一切可以從以下的事實得到說明，事實是卡羅利政府的部長們，既是資產階級的部長，對於工人問題完全不加注意，對於所發生的一切事情，完全沒有了解。這是卡羅利如何把他的位置讓給社會民主黨政府的經過。這個社會民主黨政府並沒有得到羣衆的信任。

這是政權如何轉入無產階級手中的情形。

要知道米哈里·卡羅利是否受人誘惑，於我們無關。事實是這樣：無產階級專政是在工人蘇維埃的一次公開集會上宣佈的。好幾百人參加了這次集會。所有新聞記者也都在場。在大街上，大家都知道佈告已經在歌劇院裏公佈了。但是部長們還一無所知，這個事實是非常有趣的。不過，這絲毫沒有改變歷史的事實。

結果，沒有流一點血，政權就轉入工人階級之手。賽特萊和拉斯洛，不帶隨從人員到警察廳去，在那裏，所有人都聽候他們調遣，這一段事實標誌出工人階級取得政權時的情景。絲毫沒有使用武力或是施行壓力的必要。

不但在布達佩斯，就是在無產階級專政受到外國軍事佔領的限制的地方，情形也都是如此。關於這點，塞格德地方當時經過的一番情景就是明證。我只把關於描述這個地方的情景的一段文字給你們宣讀一下。三月二十一日那一天，駐在那裏的法國兵有一萬六千人。這是凱蘭門所寫的：

“資產階級的態度——資產階級接受這個變動的態度和它對於最近幾個月中的很多事件所採取的態度，同樣是若痴若聾，逆來順受的。很多月來，報紙——資產階級主要的消息來源——却用虛偽的消息來迷惑資產階級自己。突然之間，同一個報紙變成了無產階級專政的贊助者。散播消息說，蘇維埃共和國

的成立只不過是一種迫使協約國放棄分割匈牙利的方  
法。在最近的幾個月中，人們在思想上混亂起來。即  
在充滿革命火燄的氣氛中，人們也看不清什麼了。沒  
有人能夠辨別什麼是合法的，什麼是非法的，更不能  
知道是否這個政府或是別個政府能夠維持政權。求存  
的本能也要求人們適應環境……對於一九一九年三月  
二十一日的事件，與其置之不提，不如予以說明。只有  
使人回想起當時的情景，才能使人懂得爲什麼所有當  
權的人對那個以一個社會黨的律師，一個舊時的泥水  
工人助手和一個裝配玻璃工人組成的執政政府，屈膝  
順從。首先前來表示敬意的是以阿拉達·那吉爲首的  
高等法院法官，接着是幾乎全部地方政權和國家政權  
的領導人物。甚至卡羅利黨的黨部也向無產階級專政  
表達它們最熱烈的祝賀。沒有人知道明天將會發生什  
麼事情。這就是爲什麼所有當權的人幾乎無一不接受  
執政政府的命令，奉行維謹。倘使沒有外來的原因引  
起變化，塞格德必將步布達佩斯的後塵：行政機構和公  
務人員都聽從蘇維埃的調遣。這個行政機構的領導者  
雖然咬牙切齒，但他們不敢不服從命令。”

且看塞格德政府的編史者對於當時情勢的看法。簡單  
地說，事件發展的經過，在全國各處都大致相同。我在這裏  
敘述過我自己的經驗。巴爾那·蒲柴也敘述過他在農業部  
所看到的情形。同時瓦利解釋過爲什麼司法部和各級法院  
的公務人員立刻服從無產階級專政的緣由。因此，這個問  
題是非常清楚的。在這種情形之下，我們自無須使用武力。  
人家對我們所表示的殷勤使我們在某種程度內感到驚訝。  
至於社會民主黨人，他們却並不感到奇異。一九一八年時，

他們已經看到過這樣奉命維謹的態度，對於他們並不顯得新奇。雖然取得政權時並沒有發生衝突，但是我們仍舊宣佈了戒嚴法，這我在前次公審時已經說過。我在這裏只把拉斯洛·孟德朗尼所說的一段話再讀一遍。拉斯洛·孟德朗尼曾經在最高法院受過審判。根據格拉茲<sup>①</sup>的著作，孟德朗尼談到恐怖時，說紅色恐怖和在法國革命時代厲行的恐怖手段正堪匹敵：

“後來發生了政治革命。爲要達到革命的目的，這些政治革命不得不使用暴力，甚至恐怖手段。恐怖手段常常是一個神聖目的的工具。這一目的使恐怖手段在理論方面能夠取得一種合法的性質。這就是一七九一年至一七九三年法國革命時代所厲行的恐怖，阿納托爾·法朗士稱之爲‘神聖的恐怖’。”

下面是孟德朗尼關於無產階級專政所寫的一段文字：

“使用恐怖手段所遵照的規則，和一七九三年時法國所遵照的規則相同。”

無產階級專政所採取的第一批措施，各黨派以不同的方式予以接受。有如當時報紙登載的消息所顯示出的，社會民主黨的左翼和中間分子以最歡欣的心情接受那些措施。這些消息在這裏已經讀過。實際上在此時期，左翼分子已自認是共產黨人，中間分子也正在變成共產黨人。惟有社會民主黨的右翼對共產黨始終維持敵視態度。當時，它還掩飾它的敵視態度，並接受由於共產黨和社會民主黨人之間所締結的協定而加予它的全部義務，尤其因爲兩黨的這種合併，

---

① 格拉茲在無產階級專政失敗後，出版了一本書名“布爾什維主義在匈牙利”，這本書彙集了許多反革命方面記者和政客的文章。——編者

對它簡直就意味着給予生命。在那個時候，社會民主黨的右翼正致力於一種反對工人羣衆的猛烈鬥爭。工人羣衆想要把這些工聯運動和黨的官僚主義分子從他們的位置上排除出去。由於社會民主黨已經全體接受了和共產黨締結的協議，這樣一來，這些人對於不滿意他們的羣衆，就能够裝做無產階級革命的先驅，因此，不可能把他們排除出去。所以無產階級專政的宣佈，使這些人的地位益加鞏固，使他們能够留在他們的位置上，繼續對無產階級專政進行鬥爭，一如他們在無產階級專政成立以前所作的一樣。

在資產階級方面，情形亦復如此。在一九一七年的俄國，行政人員、大地主、工廠經理留在他們的位置上是不可能設想的。就當時論，這是一個新的事實。資產階級全體一致都站起來反對布爾什維克。而匈牙利的資產階級已經處於普遍的崩潰狀態。整個資產階級世界好像在瓦解，加以一年半以來，蘇聯的地位已經穩固。人們都在那裏認真地詢問，歷史發展所採取的方向是不是就是如此。因此資產階級加倍努力，以求暫時維持他們的地位。

這就是爲什麼資產階級對無產階級專政，不加反抗。的確，在所有各重要地位上，他們都能維持下去。如果工廠經理願意的話，他們可以繼續留在他們的位置上。倘使有一個軍官離開軍隊，那是出諸自願，而並不是被我們免職的。在社會化的地產上，我們仍然讓那些大地主和總管們隨其自便地留下來。顯然，這一切結果是這些人一旦心情安定之後，又重新開始反對我們，用全力來從事破壞。

這種事態在農業方面發生了特別嚴重的影響。在這一方面，的確，我們犯了很大的錯誤，我們沒有嚴格遵守我們的綱領。我們共產黨人原想要召開一次農業工人代表大

會，由這個代表大會來決定收歸國有的大地產的命運。這樣的一個農業無產階級和小土地所有者的代表大會必定會主張分配土地。但是部分由於卡羅利政府所採取的分配土地政策的失敗，部分由於紹莫吉州的農業工人的態度，我們選擇了土地社會化的辦法。因此，我們沒有把土地直接分配給農業工人、小土地所有者和貧農。這些能夠得到土地的人，沒有得到革命的好處。他們毫無所獲，相反的，他們受到了那些和革命相伴而來的困難，特別是物資的缺乏。我們應該記得匈牙利是經過封鎖的，沒有鹽，沒有火柴，沒有紡織品，沒有皮革也沒有糖。總之，很多種大家生活上所不可缺少的物品，我們都感到缺乏，於是我們不得不藉助於徵用。簡單地說，我們對廣大農民羣衆和小土地所有者毫無所與，而這些人正是我們的自然同盟者。我們這樣的作爲，使這些羣衆背離了我們。如果我們分配了土地，農民們必然會很忠實地爲無產階級專政服務。因此，單單只有雇農和農莊上的僕人忠實地爲無產階級專政服務。他們之中，很多人參加了軍隊。但是他們的合作，不足以補救我們所鑄成的大錯。

至於兩黨的合併，這是一個更嚴重的錯誤。在這個時候，社會民主黨有七十萬黨員。但無產階級革命的領導力量，共產黨，應該是革命的先鋒隊，無產階級的中堅。然而在匈牙利，有資格在這先鋒隊中服務的無產者，沒有七十萬人，可能還不到七萬人。所以這樣的一個工人黨，受命領導革命鬥爭，至少得把它的成員減少十分之九，才能勝任它的戰鬥任務，成爲革命的領袖、主腦和中心。

這個機會，由於我們和社會民主黨人的合併，我們自己把它錯過了。我們所犯的錯誤，因下面的事實而更形嚴重：



在合併的時候，社會民主黨是一個完整無缺的政黨，擁有成千的機構；而共產黨却是一個非法的組織，沒有和社會民主黨整個地合併，而只是黨員們一個一個地加入了社會民主黨。這就是公社失敗的主要理由，也是主要原因。第二個理由是我們對待農民的錯誤政策。

由於我們的錯誤，當時的情勢沒有絲毫改變。雖然協議規定資產階級必須解除武裝，但是沒有一個人被排除出他的位置。解除武裝的意思並不是指沒收獵槍。真的，我們自衛並不在反對這種武器。解除資產階級的武裝是沒收舊時的軍隊、警察和憲兵的武器，以及建立新的無產階級的隊伍。但是恰恰因為資產階級沒有反抗，這些就無法實行了。我們可以在執政府的會議紀錄中看出，這個問題，從第一天起就已成爲討論的對象。也是從第一天起，社會民主黨人就破壞了他們自己的協議，不准把警察解除武裝。他們所以有這樣的行動，部分是因爲他們認爲警察也是“工會會員”，部分因爲他們想利用警察來反對共產黨人。他們在軍隊方面採取了同樣的策略。

庭長：不要講這些並不構成控訴對象的事情。沒有成爲事實的事情，不能構成控訴的事件。講你所實現的，列在起訴書上的事情。

拉科西：沒收資產階級的武器和武裝無產階級是列在起訴書上的。

至於我們的諾言，清除混入國內的敵人，我們立刻着手進行了。

我對於列在起訴書上的蘇維埃的選舉和憲法兩事，沒有新的說明。我至多指出，凡是對於社會能夠貢獻出有利的工作的人，蘇維埃制度都給他們選舉權。這個原則保證

居民獲得選舉權的階層是如此廣大，所以選民有四百五十萬之多。這不是一個虛偽的選舉。這是在塞格德的選舉中可以看出的。在那裏的選舉中，我們無法使用恐怖手段，因為法國不會允許。在選舉中，我們得到四萬一千二百張選票，比例和其他各處都是相同的。

其實羣衆中的主要思想，不但經由選舉顯示了出來，凱蘭門敘述的一段經過也可以把它表達無遺：一九一九年三月二十一日阿拉德地方的法國軍事當局聲稱他們不能容忍蘇維埃的活動。但他們准許參加蘇維埃制度的人在二十四小時以內離開城市。他們這樣做是希望工人們的領導者，幾十個人離去當地。但是二十四小時以後，一萬四千人離開了阿拉德。如果這些人不是無產階級專政的擁護者，這種情況是不會發生的。

協約國不容許無產階級專政，不允許我們拒絕它們的要求：退出四萬平方公里的地方。這在我們看來，是毫無疑問的。所以協約國方面開始毅然決然地武裝起來，同時實行集中軍隊。我們也同樣地進行募兵運動。六天之中，志願應徵的人數達四萬人，派往前綫的部隊員額很快地增加起來。雙方都在調動軍隊，我不想對你們詳細敘述。以下是按照布萊特所說，當四月十六日羅馬尼亞發動攻勢時，雙方軍隊員額的情形。在我們的面前，協約國派出的軍隊計十五萬人，但是紅軍全部只有四萬九千人，其中二十二個營已經派往前方，所以我們前面的敵人爲數多出我們三倍。我不想在這裏說明爲什麼紅軍陣地會崩潰，德蘭斯瓦尼亞戰綫的投降說明了一切。我只指出大半的陣地是由保安師團防守的。這個師團既經投降，就談不到真正的抵抗了，就是集中所有的力量，也無濟於事。十天之中，我們派到前綫

去的有五十一個營和砲兵。但是這些開赴前綫的隊伍並沒有組成正規軍隊。它們潰散了。最後不得不把他們解除武裝。五月一日和二日的情形是這樣：羅馬尼亞人在蒂薩開始進攻，塞爾維亞人和法國人佔據了馬科和霍得麥哲瓦薩爾黑。捷克人也採取了攻勢，佔領了匈牙利北部相當大的領土，和羅馬尼亞軍隊接聯起來。我們已經沒有一支真正可用的軍隊。按照五月三日的記錄，軍事方面的情形是這樣：紅軍沒有抵抗而放棄了索爾諾克。捷克人已經佔據米什科爾茨。士兵喪失殆盡。戰鬥精神等於零。大本營是在格多洛。鮑姆停止了一切軍事行動。

我剛才說過我們已經沒有了軍隊。社會民主黨人要想利用這種情勢來結束公社。他們有一個現成的計劃。鮑姆既然命令停火，這個計劃的一部分已告實現。這差不多是一種投降。社會民主黨右翼和中間分子有一個固定的思想，就是說如果巧妙地實施這個計劃，就有辦法結束無產階級專政；只要讓共產黨人喪失信用，就可以一切從頭做起。匈牙利社會民主黨右翼這種意見也是奧地利社會民主黨領袖奧托·鮑威爾所贊成的。那時奧托·鮑威爾處境非常困難。因為奧地利的無產階級也在效法匈牙利無產階級的榜樣。匈牙利無產階級專政繼續一天，每天都給奧托·鮑威爾增添新的困難。他自己就是那個計劃的鼓動者。如果共產黨人沒有採取果敢的態度，這個計劃定早付諸實施了；那末，五月二日那一天，匈牙利無產階級專政也就結束了。

但是匈牙利共產黨人起來反對這個計劃。共產黨各人民委員向工人階級發出號召，定於下午召開工人蘇維埃。在會議中，不但冶金業工會、而且工人中極大的多數都贊成共產黨人的意見。共產黨人要求繼續鬥爭，要求盡最後的努

力來驅逐侵略者。這個決議的結果是五月以後，在五月三、四日兩天內就有九萬工人和農民參加軍隊。如果共產主義沒有深厚的根基，人們能否想像在一個被封鎖的國家內，厭惡戰爭的羣衆會這樣迅速地跑來支援我們呢？顯然，有了這支新的軍隊，無產階級專政就有力量迥然不同地進行對抗了。我們立刻阻止了捷克人和羅馬尼亞人的前進。五月十日我們實行反攻。十八日我們收復了富來克，五月二十日收復了米什科爾茨。我們進攻捷克人，開始向前推進。下面是布萊特關於這次進攻所寫的一段：

“從第一天起，進攻就獲得了輝煌的勝利：第一旅到達加拉姆，同時第二旅佔領了一直伸展到伊包里的高地……”

軍隊前進不稍停止，埃爾塞古茨瓦和列瓦攻下了，我們把羅馬尼亞人驅逐出蒂薩河以外，他們那樣的倉惶逃跑，竟至炸斷托凱橋，以便阻止我們的追擊。十日，攻下巴爾脫發。我們直抵波蘭邊境，把捷克—羅馬尼亞走廊切成二段。這就是紅軍對於羅馬尼亞人進攻的回答。

直到現在，我只講了無產階級專政所獲得的成果。不用說在同一時期，資產階級也在進行工作，雖然，最初他們的任務是被動的。無產階級對威克斯照會的回答，一方面是紅軍的進攻，另一方面是我們對協約國態度的改變。卡羅利政府的部長們抱怨威克斯和他的左右冷待他們，輕視他們。和我們呢，情形就根本不同了。三月二十一日我們友好地勸告威克斯目前不要在街頭上走動。第二天，我們告訴他說他的電報應該經過我們的檢查。我們維持這種措施一直到公社的最後一刻。輕蔑態度，高傲口氣的談判，這個時代已過去了。

事實上人家不再用高傲的口氣和我們講話了，尤其因為共產黨人的堅決態度在和談時發生了令人驚訝的效果。在這些談判中，辯論異常激烈。威爾遜拒絕滿足新成立的國家的不知餓足的貪慾。在他看來，無產階級專政的宣佈正合時宜，使他能夠用無產階級專政所得的成就來支持自己的理論。協約國堅決拒絕和卡羅利政府進行談判，但是它們不得和無產階級專政從事商談。四月四日，和談代表團代表史末資將軍到達布達佩斯。關於這個問題，儒勒·安德拉西寫道：

“無產階級很有理由把這個事實看作一個重要的結果。無產階級專政在一天之間所獲得的成就多於資產階級的外交在整整幾個月中所得到的成就。”

至於史末資的建議，遠較威克斯的建議有利。史末資不但對我們說威克斯照會中所了解的疆界，不是一個政治性質的疆界，而且也答應我們解除封鎖，邀請匈牙利政府到巴黎去。可是這一切都沒有實現，因為協約國改變了口氣，而我們並不準備讓步。結果，羅馬尼亞發動攻勢，在巴黎，干涉政策勝利，因為我們是第一個國家起來反抗戰爭所造成的不公道處置，而把我們作個例子示懲以資鑑戒。

此外，還有一個理由：匈牙利資產階級方面給予和會極大的影響。儒勒·安德拉西告訴我們說，他在三月二十七日就已向和會提出一個備忘錄，要求協約國派遣自己的軍事力量來推翻蘇維埃共和國。格拉茲說在維也納也有同樣的行動。四月五日逃亡在維也納的匈牙利政客到協約國駐維也納的代表那裏去要求他對正要發動的行動，給予援助。但是倘使不能夠把匈牙利社會民主黨的右翼動員起來，以上的一切措施還是不夠的。這是格拉茲所寫的：

“埃爾諾·加拉米是匈牙利社會民主黨右翼的代表，在這次扭轉局勢的工作中，主要任務落在了他的肩上。”

格拉茲代表伊思文·貝特蘭去謁見住在維也納的加拉米，和他共商計劃，問他是否願意組織內閣。加拉米的回答是願意的。這次談話以後，人們就把加拉米介紹給協約國的代表們。

總之，匈牙利資產階級政黨也設法利用社會民主黨的右翼作為反對無產階級專政的根據和王牌。加拉米先住維也納，後來移居瑞士。他曾經接受匈牙利無產階級專政政府的委託，供給法國社會黨各種消息，並保衛無產階級專政的利益。為了這個目的，他得到了七百英鎊的一筆巨款。但是他非但不為無產階級專政服務，反而進行反對無產階級專政的工作。

我現在應該談一談共產主義對愛國主義問題的看法。早在無產階級專政時代，對我們唯一的指責，反對我們的唯一宣傳方法，就是說我們不是愛國者。判決書上有很多地方都提到了這種指責。所以我認為有必要對這個問題說幾句話，就理論方面澄清一下這個問題。愛國主義曾經是青年時代的資產階級的理想，內心的表現。因此，愛國主義曾經負擔過頭等重要的歷史任務。它把分散的國家統一起來，在某些民族中間，喚醒了他們對共同命運和平等地位的意識。因此它曾是進步的強大原動力。但是等到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鞏固了它們的政權之後，它們就把這種愛國情緒過度地發展起來，為資本主義服務。首先變成沙文主義，後來變成帝國主義。這就是說愛國主義給一切統治階級以壓迫語言不同的民族和掠奪殖民地的權利。最後，這個解

放的運動，這個進步的動力，變成了沙文主義，變成了民族的壓迫。

共產主義的思想自然是擁護民族自決權的。因此，它承認每個民族有權決定自己的命運並對任何民族的壓迫進行鬥爭。這就是共產黨人所了解的民族主義和資產階級分子所設想的民族主義的區別。試舉一例：關於匈牙利的民族問題，同時這個問題也包括領土完整問題，我們的意見是：譬如說，如果我們同意使用暴力把羅馬尼亞人硬留在匈牙利的國境以內，那末，反過來說，我們也應該承認羅馬尼亞人同樣可以使用暴力把說匈牙利話的人硬留在他們國內。我們是民族自決權的堅定的擁護者。如果一九一九年時，羅馬尼亞人和塞爾維亞人不肯加入匈牙利蘇維埃共和國，我們絲毫不能用武力來改變他們的態度，因為這就等於對民族實行壓迫。但是，匈牙利的羅塞尼亞人、斯洛伐克人和德國人的情形就不同了，因為在那個時候，他們沒有和他們同族的人聯合在一起。

因此，無產階級專政忠實於它的有關民族問題的綱領，設法把那些民族仍舊維持在匈牙利國境以內，以便建立一個蘇維埃聯邦共和國。

這就是共產黨人在無產階級專政時代對於民族問題的看法。當然，對方陣營的力量把共產黨這種態度用各種不同的方式介紹出來，而且，在某種程度內，人們把我們分配了各種不同的角色。譬如對匈牙利人民，資產階級說我們完全是國際主義者。對協約國呢，它却聲言如果人們不能把我們消滅的話，布爾什維主義是會繼續傳播開來的。最後，協約國各國，也承認分配土地、實行社會主義化等等了。但是後來組成的小協約國的捷克、塞爾維亞和羅馬尼亞的

資產階級，它們相反地宣稱我們的運動和國際主義毫無關係，說我們的運動只是在紅色面具下出現的一種民族運動。有如我剛才所說的，角色是在不同場合中分配好的。

在匈牙利資產階級內部，也有很多政黨。一大部分的資產階級懂得無產階級的民族政策，贊成我們的努力。下面是布萊特所寫的：

“沒有疑問，如果匈牙利一大部分的軍官，激於真誠的愛國情緒和愛國思想，沒有離開職務，那是因為他們希望盡可能快地把敵人驅逐出去，從而有效地為國家服務。”

這是軍官團一部分人的意見。有如我曾經指出的，我們在對捷克人作戰中，盡力為這種意見辯護。自然，這不是匈牙利共產黨特有的看法，而是一般共產黨人所共有的原則。蘇俄實行同樣的政策：雖然在蘇俄只有百分之五十四的居民是講祖國的俄羅斯語的，但是蘇聯並沒有喪失其他民族所居住的土地。

顯然，維也納是反對我們的鬥爭的中心。在委員會的委員中，有十三個是設立時的委員。我要讀……

庭長：這和控訴毫無關係。我已經很耐心地聽了你二小時，但是直到現在，你幾乎沒有講到和控訴點有關的問題。

拉科西：這是因為我要對當時情形作一個全面的描述，然後把控訴的事件歸納在這個圖景之中。我只要證明維也納和塞格德的一部分匈牙利資產階級開始對我們進行無情的鬥爭。在作戰時期，協約國的抵抗愈劇烈，居住在維也納和塞格德的匈牙利資產階級政客的抵抗也愈強大。

四月下半個月中間，在羅馬尼亞人發動攻勢的同時，人



們從維也納派遣巴拉維西尼侯爵和罕貝什大尉到貝爾格萊德去，負責和法朗歇·台斯貝萊<sup>①</sup>商討合作辦法，共同反對匈牙利共和國。自然，法朗歇·台斯貝萊懇切地招待他們。那時他是塞爾維亞、捷克和羅馬尼亞軍隊的總司令。在我們看來，委員會所繼續追求的目的是在匈牙利推翻布爾什維主義，恢復“秩序、和平與安寧”。委員會首先想依靠協約國所供給的軍事援助來實現它的目的。委員會並且希望由法國軍隊提供佔領匈牙利的部隊。它申述這種要求的理由說是因為羅馬尼亞人和捷克人所索的代價一定很高，並且以後不容易使他們撤退。當它明白知道不能得到法國軍隊的時候，它只得接受捷克和羅馬尼亞的軍隊了。委員會中某些委員對於羅馬尼亞人素有極大的反感，所以這種思想，他們頗難接受。

但是當他們懂得無產階級專政是可以持久的，懂得只利用匈牙利的力量，他們無論從國內或從國外都無法把它推翻的時候，他們立刻就改變了態度。他們放棄了那個計劃，利用一切可能的方法和可以想像的方法來反對我們。很明顯，反革命運動組織也是這些方法之一。因此我們在五月三十日對捷克人發動總攻擊，六月一日就發生了南方鐵路工人的罷工。我不想在這裏敘述這次罷工的詳細情形。證人費朗克·馬戴自命是這次罷工的領導人，他已經講得很多了。他特別指出公司是法國的公司，鐵路工人應該享受優惠的待遇。他也說過他們怎樣參加了他在松巴特里發動的罷工運動。這些罷工運動，像起訴書上所列的外多瑙河區的一切反革命運動一樣，由一個設在維也納的委

---

① 那時法朗歇·台斯貝萊統率着協約國在巴爾幹的軍隊。——編者

員會從中組織。委員會中有利亞爾上校、斯姆雷薩尼、西格萊伯爵和奧頓·貝尼斯基等人。這些人物常常非常輕率，不加考慮地發動反革命運動。的確，我們看到，在若干地方的武裝暴動，貝特蘭和古斯達夫·格拉茲都承認為時過早，而在外多瑙河區的反革命運動則已籌劃成熟。就技術方面來看，準備是不充分的。總之，我們不得不對之進行鬥爭的反革命運動是維也納反革命委員會所組織的。但是，有如格拉茲的敘述所表明的，這些運動不僅受這個委員會的指揮，而且和背叛祖國的某些紅軍領袖也有聯系。白色間諜網愈來愈擴大了，它把一切稍稍具有重要性的命令、地圖等等都傳達給維也納的委員會。

這些命令、地圖以及別的重要軍事秘密，委員會就直截了當地轉交給塞爾維亞人、法國人、羅馬尼亞人和捷克人。以下是關於這個問題的一段話：

“七月十六日，阿爾豐斯·巴拉維西尼在公寓裏會見了貝特蘭，把他從設在塞格德的儒勒·卡羅利政府那裏接到的命令通知貝特蘭。”

維也納委員會的一個委員將匈牙利紅軍作戰命令交給巴拉維西尼。巴拉維西尼害怕該項命令被塞爾維亞人所奪取，要求加以密封。作戰命令，以及其他重要文件，都由一個英國郵差查封起來。巴拉維西尼奉命，以英國郵差名義出發，到達後把一切計劃告訴英國上將。到了塞格德，他把紅軍作戰命令送交英國司令。所以，在進攻之前兩天，人家已經把作戰計劃交給了英國人，英國人又轉給了塞爾維亞人和羅馬尼亞人。這個事實為儒勒·罕貝什所證實。罕貝什在他的書中寫道：

“塞格德政府是各種反革命運動的指導力量。雖

然內部無休止的鬥爭和鉤心鬥角使政府任務增加了困難，但是由於政府對反革命分子負有領導的任務，它所處地位使協約國也不能不把它看作一個重要因素。它和紅軍某些部隊建立了關係。”

很清楚，反革命運動和紅軍所遭到的失敗是和這些反革命陰謀有直接關係的。塞格德政府的內閣會議紀錄上時常談到這些問題，一面指出那些反革命運動業已組織起來的地方，並且任命反革命運動的領袖。政府人員不斷到貝爾格萊德去和協約國商談。內閣在羅馬尼亞人和捷克人那裏派有代表，代表的任務是阻止無產階級專政的軍隊前進。

但是不只是在塞格德有這樣的情形。在大本營，在紅軍的中心，紅軍的心臟裏，同樣的工作也在進行着。因為紅軍在它自己的隊伍裏並不要求絲毫手續，收留了舊軍隊的軍官，這些隊伍，這些軍官，他們的政治見解一點沒有改變。以下是古斯達夫·格拉茲所說的：

“就軍官在大本營所過的生活這一方面來說，大戰時帝國和王國的最高司令部和格多洛的紅軍大本營，兩者之間情形並無區別。人們很少以“同志”相稱。差一點沒有把兵營中的酒肆稱為軍官餐室。”

實質上，紅軍的中央機構有一種反革命的色彩。無怪這個中央機構當它每次談到紅軍失敗時都認為是一個充滿希望的轉變，充滿希望的一縷曙光。這些軍官歡迎失敗，期望的殷切和捷克人與羅馬尼亞人不相上下。直到六月間我們開始擊敗捷克人時，這種心理狀態在某種程度內才略有改變。這是當時他們所寫的：

“直到現在，我們每次接到戰敗的消息，都感到滿意——雖然我們不得不被迫忍受，眼見領土的割裂，這

是一樁痛苦的事情。現在，匈牙利每次的勝利總使我們高興。”

這是紅軍軍官的心理狀態。

至於我們，我們對於那些盡忠職務的現役軍官的功績，始終表示敬意。這是列瓦戰役後所發表的一段公報：

“當時情勢所以能夠獲得挽救，是由於砲兵軍官的功績。第三師團的損失特別慘重，因為很多軍官在戰爭中陣亡了；他們爲了對蘇維埃共和國服務，不但準備犧牲他們的才能和他們的志向，而且犧牲了他們的鮮血和他們的生命。他們的陣亡使我們感到深刻的悲痛。”

我們不問他們的意見如何，我們對於那些盡忠於自己職務的軍官的功績，始終給以正確的評價。

正在對捷克人全面進攻的時候，我們收到克利蒙梭的最後通牒，通牒反對這個戰爭。通牒答應討論如何邀請匈牙利派員到巴黎去，以便締結一個公正的和平。同時要求我們停止進攻。但是我們認識協約國的種種諾言是怎麼一回事，也認識威爾遜的諾言的命運如何。我們照會克利蒙梭，向他解釋進攻的並不是我們，我們是受到別人的攻擊。在我們方面，我們建議召開一個包括過去匈牙利王國時代所有各個國家的會議。我們的意見認爲在這個會議中，我們能夠比在巴黎會議中得到較爲有利的結果。

此外，我們繼續進行政治攻勢。八天以後，我們成立了斯洛伐克蘇維埃共和國。但是要使這個共和國地位鞏固，却遇到了重重困難，因爲無產階級專政宣佈之後幾天，捷克人逮捕了所有上匈牙利的匈牙利和斯洛伐克的工人領袖，把他們禁閉在伊拉瓦和別的地方的集中營裏。的確，他們非常明白無產階級專政對斯洛伐克工人的吸引力是遠勝於資

產階級專政的吸引力的。

我向你們宣讀三段文字，表明在那個時代，無產階級專政擴展到上匈牙利的可能性是如何巨大，一般地說，成功的機會也是很大的。

我所引述的三段中的一段是出諸政府黨的黨員、捷克政治家貝魯特卡的手筆，他在一九三四年寫道：

“捷克人的作戰，如同兒戲。紅軍部隊攻入捷克陣綫，如入無人之境。在捷克軍隊中，人們看到有解體的徵兆。”

五月二十六日左右，布萊特將軍寫道：

“我們截取到一封協約國的官方電報，它悲嘆着說，把蒂薩戰綫上作戰的部隊設法調防已經是不可避免的事情了，在匈牙利的攻勢之下，陣地無法守住，匈牙利的攻勢大有奪去盟國全部陣地的危險。在費列吉哈札被俘的法國人聲言他們不準備對匈牙利的進攻予以抵抗，說軍隊因水土不服，深感痛苦。”

這是塞格德政府內閣會議紀錄第三百九十一頁上所寫的：

“糧食供應部部長認為必須指出在他最近出巡的時候，他走遍蒂姆省和多隆達爾省各處，看到居民中發生極大的憤怒情緒，看到塞爾維亞人對羅馬尼亞人懷着瘋狂似的仇恨。他也聽到一些意見，據這些意見說，向紅軍進攻而不向羅馬尼亞人進攻是缺乏愛國心的行爲。”

在政治方面，人家也可以利用小協約國之間存在着的很深刻的不同意見。小協約國爲了蒂密斯瓦爾（今名的密索拉，是羅馬尼亞的城市。——譯者）問題幾乎訴諸武力。

必須立刻把法國軍隊調到該處，在塞爾維亞和羅馬尼亞人之間建立一個中立地帶。的確，情勢是那樣的嚴重，兩國之間戰爭大有一觸即發之勢。

人們也可以利用這樣的事實：在羅馬尼亞人進攻的時候，塞爾維亞人和捷克人却坐視不動。反過來說，情形也是如此。在這種狀況之下，使上匈牙利在政治上發生革命是可能的。

直到現在，我沒有講到蘇維埃共和國的同盟者，蘇聯。在這一年，蘇聯還無法給我們援助，因為蘇聯自身正處於生死存亡的關頭。世界大戰結束以後，美國、英國和法國的軍火製造商正在等待一九一九年夏季的來到。大量軍火存貨沒有動用。協約國用來裝備自己的軍隊和白色軍隊。然後協約國對蘇聯進行殊死的鬥爭。因此不僅我們不能向蘇聯要求援助，並且正是我們粉碎了對蘇聯的封鎖，挫敗了陳兵包圍的計劃，而幫助了蘇聯的解放。一直要等到下一年，蘇聯才能夠援助我們。但是我們不可能等待到那個時候。

顯然，協約國恐慌了，它施展全力來粉碎我們。立刻，在六月十日，它們准許塞格德政府發動徵兵運動，以便組織軍隊來反對我們。但是徵兵運動很少結果。因為法國人自己也不知道開始募集的軍隊會發生什麼變故。同時它們動員社會民主黨人來反對無產階級專政。這是匈牙利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上最悲慘的一章。人們讀了社會民主黨的人民委員在對人民委員的訴訟案中關於他們自己的活動方面所作的陳述，只能感到慚愧……

庭長：我最後一次警告你，不要講這些，只講起訴書上所控告的事實。

拉科西：庭長先生，我想指出當時是怎樣的一種情況，

然後在這個情況中我敘述我自己的活動。

庭長：你曾經說你要講兩點半鐘。那末，現在已經過去兩點又五分鐘了。

拉科西：我有些生疏了。因此我不能預料說話時間的長短。的確，在監獄裏我不能……

庭長：請你把你的申述限於控訴點上。

拉科西：我只想簡單地說一說社會民主黨曾一再考慮種種計劃來結束無產階級專政。我已經指出五月二日那一天的事件。鮑姆在他的書中有兩處聲言他曾經召集社會民主黨的領袖來討論如何使用武力來結束無產階級專政，並且把共產黨人排除在政權以外。所以，不只是協約國、維也納委員會和塞格德政府在尋找種種結束無產階級專政的方法：匈牙利社會民主黨在思想上也在反覆研究同樣的計劃。在這種情形之下，不可能有力地繼續戰爭，這不是最自然不過的事情嗎？尤其因為封鎖已經有了效果，而同時又發生了反革命運動。因為這一切的因素，於是對捷克人的作戰就暫時停止下來了。

就在這個時候舉行了黨的代表大會，在大會上，社會民主黨繼續它的攻擊。領導進攻的是孔費，他勸告無產階級的專政不要過於嚴厲，這就是說應該給政權的敵人較多的自由，使他們更方便地打擊無產階級專政。社會民主黨人還不就此而止。他們出其不意地投票反對該黨的新黨部，雖然名單是事前決定的。他們認為這個新黨部傾向太左。但是他們最後還是不得不放棄他們的計劃，因為共產黨人表示了非常堅決的態度。他們不能不接受正式的名單。但是他們仍然不顧一九一九年三月二十一日所接受的義務，對於黨的名稱問題，拒絕接受共產國際的決定。總

之，他們利用一切機會來打擊和破壞無產階級的精神。

在這種情形之下，在封鎖、反革命陰謀、來自國外的壓力，以及社會民主黨的叛離等重重困難之前，我們接受了協約國的最後通牒，放棄了我們在北方所佔領的城市和土地，代價是得到保證把羅馬尼亞人毫無合法理由所佔領的蒂薩以東的地區歸還我們。執政府關於這個問題的記錄和宣言都附在卷宗裏面。從這些記錄和宣言中，可以看出來自國外的壓力、反革命運動、維也納委員會、塞格德政府、社會民主黨的攻擊以及生活的窮困都迫使我們不得不把上匈牙利讓給捷克人。我們撤退時，秩序良好……

庭長：這些並不是控訴點。

拉科西：我現在快要講完了，庭長先生。是的，撤退是在良好的秩序下進行的，沒有發生混亂。紅軍後退，秩序井然。但是協約國欺騙了我們，它們保證我們撤離被佔領的土地來交換我們所應讓給捷克人的土地，但是它沒有實行。所以無產階級國家着手動員並知照協約國如果不把蒂薩以東的土地交還的話，它將使用武力來予以收回。協約國反對我們的動員。這不足以阻止我們整頓紅軍隊伍。七月二十一日我們對羅馬尼亞人實行進攻。在我方面，我認為這種措施是一個非常嚴重的錯誤。因為使我們決定撤退上匈牙利的理由也就是使我們不要進攻的理由。因為軍官團繼續抱着反革命的情緒，這個錯誤更為嚴重。格拉茲在他書裏非常率直地說，在大本營中人們故意從事破壞，故意把紅軍交到羅馬尼亞人手中。軍火不是到時太遲，就是不合實用。砲兵隊缺乏砲彈。我們也缺乏軍器。我們只有二萬一千支步槍，來對付一支羅馬尼亞的生力軍。這是力不勝任的。

這一切以外，如果再加上——有如我剛才所讀的一段



文字——紅軍全部作戰計劃已被事前出賣給羅馬尼亞人，那末，羅馬尼亞人就不難打敗紅軍，這是很可以了解的。就是這次的敗績招致無產階級專政的傾覆，也可以說迫使無產階級專政讓位給另一個政府。

顯然，在這樣的一種情勢之下，我們儘可以再照一九一九年五月二日的情況，號召無產階級集中所有的力量，團結一致地站起來。但是過去的那三個月時間已經使這個方法不復適用。無產階級看到在它前面組織起來的巨大力量。同時破壞行為日益增多，供應愈來愈困難。加以那時協約國不斷反復聲明說無產階級專政打倒之後，它們將援助任何一個民主政府，它們不願有白色恐怖並將以糧食供應匈牙利等等虛偽宣傳。

預計中的全世界罷工運動已告失敗，大大地動搖了無產階級的精神力量。

在這些事件發生以後，無產階級專政政府辭職了，讓給一個所謂工會政府。

如所周知，工會政府的壽命只有六天。然後成立了弗里特利克政府，發生了反革命運動。

至於我在這些事件中所擔任的任務，我可以說的是：

三月二十一日夜間，我離開了拘留所。如果我沒有記錯的話，第二天，我得悉我被任為人民貿易委員會副委員長。從四月到四月中旬左右，我擔任人民社會生產委員會委員長。在這個時期，羅馬尼亞人已經開始進攻，或者更確切地說我們對於羅馬尼亞人的進攻，已有預感。我們必須加強軍隊。我被派到那齊加尼薩去，恢復駐軍內部的秩序。在我回來之後，我被任為羅塞尼亞地方政府委員，賦有全權。任命狀想必已附入卷宗。羅塞尼亞的主要城市，孟卡克斯

離布達佩斯極遠，當然我不可能執行人民委員的任務。於是把我的職務讓給瑞諾·瓦爾加。瑞諾·瓦爾加代替了鮑姆，負責人民社會生產委員會的職務。我留在北方戰綫一直到五月一日。那時，我被召參加執政府會議。五月二日我又被派到薩爾哥達仁前綫，因為那裏情勢危急。那裏是我們僅有的煤礦區，如果被捷克人奪去的話，我們將不得不關閉工廠。我留在那裏一直到富來克攻勢發動的時候。然後爲了阻止法國佔領軍援救捷克人起見，我調到南方戰綫去了。我在那裏留到六月七日或八日，一直到大部分法國駐軍開到別的地方去，法國人顯然不會再進攻的時候。然後我參加了蘇維埃代表大會。但是在二十日左右，由於最後通牒的緣故，北方戰綫形勢更形嚴重。我離開了代表大會，被派到上匈牙利的中央據點卡薩去擔任堅守該處陣地的使命。我在那裏留到七月二日或三日。我回來之後，受命任省人民經濟委員會委員長。我以這個資格，立刻被派到外多瑙河區去，那裏收成時近，我負責穀物的收成。我留到七月二十日又被召回擔任紅色民兵司令。我於二十二日就職，一直到無產階級專政失敗之日爲止。以上是我擔任的各種任務。

在我擔任的每一個崗位上，我總是以我忠誠的共產黨員的信念執行任務，這一點，無待贅述。人們很難證明我和協約國使團、或是和反革命分子有何關係。在每一個崗位上，我都用盡方法爲無產階級事業服務，殫竭心力來鞏固勞動人民的政權。但是在任何情形下，我從不需要用獨裁、槍殺或其他類似的方法來強迫任何人。在前綫，爲了恢復我自己部隊裏的秩序，有好幾次，我不得不使用威脅手段，但是我從來沒有從威脅進到實際行動。

我良心不安地接受我在無產階級專政下所做的一切的責任。我絲毫不想把我在任何方面所負的任務的性質，予以減輕。我所做的一切，完全是我的信仰驅使我這樣做的，我不想爲我辯護，我只說今天我所有的意見和我在那時的意見相同。我沒有任何理由，使我後悔，雖然我在牢獄裏已經度過了十年的光陰。

### 一九三五年二月八日的發言

庭長：你願意對你已經說過的話，再補充些什麼嗎？

拉科西：我還有幾句話要說，只不過幾分鐘就夠了。

庭長：我聽你說。

拉科西：我認爲我應該在這裏說明一下公社的歷史，因爲在一九二〇年時和在今天一樣，控訴只限於敘述了公社在政治方面和軍事方面的來歷。人們每一次談到起訴書中有關這個時代的真正歷史，對於這段歷史的敘述，總是非常不完備，實際上不是在敘述歷史，而是在敘述暴行。直到最後，人們才知道公社失敗之後，地方受到了敵人的軍事佔領，受到了搶劫，才知道蘇維埃共和國的被推翻，是由於外國的援助。

在我這方面，我描述了公社的歷史圖景，來解釋匈牙利如何會被外國軍隊所佔領，來指出在我們方面，我們如何竭盡全力來對外國資本主義軍隊進行鬥爭，指出匈牙利的資產階級如何用盡力量來助成外國軍隊的佔領。我也曾指出，如果地方真的遭受到搶劫，這和蘇維埃共和國沒有絲毫關係。搶劫是外國佔領軍所做的。

現在剩下來的只有兩個問題，我要簡單地說一說。這兩個問題，檢察官先生認爲在起訴書中有提出的必要。

第一個問題是要知道蘇維埃共和國是不是的確只知破壞。第二個問題是要知道是不是它的確是文明的敵人。

關於第一個問題，我應該指出在蘇維埃共和國存在的四個半月的時間中，光陰短促，簡直不可能建立垂諸久遠的事業。同樣的，在四個半月內，卡羅利政府也並沒有表現出它能夠完成即便微小的生產工作，或是別的工作。接替我們的反革命政府最初四個半月在創造性的工作和重要的事業方面，也並沒有何種重大的建樹。至於我們，雖然地方被封鎖，並且在三個星期這一段時間我們要在全國每個戰場上不斷地從事戰鬥，我們還能夠建立紅軍。紅軍是生產的政治條件。我們創造了社會主義生產的第一個條件：把工廠和土地實行社會主義化。的確，在工業方面，生產受到了挫折，但這是非常自然的。在一個國家裏，千百萬的工人——恰恰是最為可靠、最有覺悟的因素——都應該開往前綫，為了保衛無產階級專政，離開工廠。在這種情形之下，即使沒有封鎖，煤亦不感缺乏，也不可能增加生產。

餘下的是關於文明的問題。每個人都知道不可能在三個月到四個月的時間中，創造一種新的文明。但是，也正在公社的時期，有些事實可以證明我們不但對於實質上的成就而且對於文明的創造者都非常重視。在這一點上，我要指出，就公社很小的經濟來源所能允許的程度內，我們對於所有的藝術家、作家和科學家不論他們的政治意見如何，沒有不予以照顧的。不僅止此，我們也同樣照顧所有的新聞記者，雖然就階級鬥爭立場上來說，這種行動方式是不能認為正確的。這種行動至少可以證明公社想盡可能減少被犧牲的人數並避免因革命而產生的困難。

我也和檢察官先生結束他的公訴時所說的一樣，這個

案件超過了起訴書的範圍。它不但引起了全國的注意，而且有如檢察官先生所指出的，也引起了國際間極大的反應。不但因為我是其中一個戰士的鬥爭遍及全球，也因為公社是一個具有頭等重要性的政治事件，與舊王朝的五千萬居民具有直接的關聯，而且也是全世界注意力集中的所在。尤其使人注意的是在將近十年中間，匈牙利資產階級遲疑不決不把這些有關事件列入訴訟範圍之內，將人民委員作為被告。這種遲疑不決的態度給予朋友們，也給予敵人們一種印象，以為匈牙利資產階級並不贊成把這樣一個問題就司法程序這種狹窄範圍內予以處理。面對着這種遲疑不決的態度，我依然鎮定、堅決、忠實於我對共產主義的信仰。在牢獄裏度過的十年中間，我始終沒有改變，像過去一樣，依然是共產主義的戰士。我對你們重述一遍：不管未來留給我的命運如何，我所從事鬥爭的事業必定有勝利的一天。

## 拉科西的聲明

(一九三五年六月二十七日)

拉科西：如果檢察官先生早就願意提供問題的答覆，我是很高興的，我立刻從這問題開始吧。這問題，我們曾經在重刑法院的公審庭上提出過，並且在這裏，在王家上訴法院，我們又把它提了出來。這問題就是：爲什麼我的案子不會在一九二五年或一九二六年即作爲一件司法追訴的對象呢？我要立刻指出，一九二六年八月十二日“東方報”第一版曾發表過一次約佔三欄篇幅的訪問談話，並且專論這問題……

庭長：我們知道這件事。

拉科西：從這個訪問談話中看到公審早就準備於一九二六年九月下旬舉行，而且起訴書也已經擬好。然而，如所周知，訴訟並沒有進行。理由是：毫無疑問，起訴書已被撤回。我應當指出，從卷宗所搜集的文件中可以看到，曾經有一次，我因一件罪名而被控，但在幾個星期以前，人們曾宣稱作爲控告的基礎，這個罪名是不充分的。這就是一九一九年二月初的事件，這事件曾是司法部參事奧萊爾·朗蓋爾進行鑑定的對象。有人曾把情報交於他，準備作爲進行追訴共產黨人的出發點。這位司法部主管人員認爲這些情報是不充分的。然而在以襲擊“人民之聲報”報館的藉口下，把我們逮捕以後，接着在二月末發現了我們絲毫沒有參加這種行動以後，却在這位奧萊爾·朗蓋爾所認爲完全缺乏根

據的控告基礎上仍進行對我調查。同樣，司法部某某方面，可能有某種文件，內容要旨在於聲明一九二六年時，由於當時情況的要求，我的案子似乎還不準備在控告人民委員的訴訟案範圍內進行辯論，這種可能性也決不是沒有的。

對於如此明確、而同時在辯護方面又認為十分重要的問題，檢察官先生竟保持緘默，那自然要引起懷疑了，譬如，在這樣的訴訟案中，有人向某人提出一個困難的問題，而某人竟不作答覆一樣。如果這對於我，對於站在辯護的方面並對於一切關懷這個訴訟案的人們，引起了這樣的印象：有人在默不作聲中暗暗地放過一些在辯護的觀點看來是很嚴重和頭等重要的事實，這也是不足為奇的。

所以我願意由我自己來指出，對於人民委員的訴訟案在一九二六年不可能成立的理由，而現在，這同一件案子却因這些理由而成爲可能了。很明顯，根本的原因是屬於司法性質的。

在那時期所存在的情況下，由於控告準備得太不夠周密，不可能順利進行這件案子。正如人們在王家法院前舉行的公審中所聽到的那樣，在一百二十六位被傳的證人中，只有四位會提到我的名字，當時另外的一百二十二位根本沒有提到我的名字。至於這四位證人，有一位從沒有見過我，另外一個在他一生中只和我談過一次話；其他兩位是執政府的打字員和書記官。所以一九二六年我在訴訟案中僅僅是一個陪襯點綴的角色而不是被告的角色，因此這個訴訟案沒有產生人們所期待的效果。然而在這種情況下，假使人們能夠找到一絲一毫的證據足以具體證明我曾參加過所謂暴行的話，人們一定要把這司法程序進行到底，尤其是在一九二五年和一九二六年；在這兩年，貝尼斯基案、古

斯達夫·萊德雷爾案，以及法郎偽造犯案相繼發生。在六個月期間，這些舞弊案件像炸彈一樣連續地爆發出來。在這種情況下，現政權十分樂意提出所謂公社的“恐怖”，特別是我在這些所謂“恐怖”中所可能担任的角色來抵消這些舞弊案。

事實既然證明這決不會成爲問題，這從司法觀點來說，就構成爲訴訟沒有進行的主要理由之一。

顯然，同時還有政治上的顧慮。原來，這件案子牽連着無數的關係，不僅牽連到匈牙利的政治生活，並且還牽連到全部國際政治。這些政治上的原因，也是從這種情況中產生出來的。如果我們概略地談談這些年份，我們可以回憶到，這是行政機關中裁員減政的時期，也就是人們所稱財經需要支援的危機時期。在這種情況下，工人們的不滿情緒是高漲的，並且就是在這時期共產主義運動有了大規模的發展，這也不應當認爲是偶然的結果。爲了防止這種不滿情緒和運動，人們除了採取一切方法以外，還採取加強社會民主黨並使它站在反對共產主義運動的行列的手段。由於社會民主黨的重要分子當時還僑居國外，於是就批准該黨許多活動分子返回匈牙利，以便加強其隊伍。我僅想向你提出兩個人的名字：首先就是摩爾·厄爾德利，在控告人民委員的名單上，這個名字與我的名字列在一起到處出現，並且有關他的標誌和情報都已歸入卷宗。第二個獲得批准返國的名字是雅可布·魏特納。從卷宗所搜集的文件中看出，正是他以代表團團長的資格於一九一九年三月二十一日下午到過拘留所。當天晚上，就是這位魏特納曾參加了工人蘇維埃會議，蘇維埃共和國就是在這會議中誕生的。他也參加了深夜的會議，在會議上，決定了人民委員的名單——



我的名字也列在上面——，同樣他也參加了人民委員會的會議。在這會議上，通過了戒嚴法和禁酒的命令，就在這個命令上，我的名字也被列了上去。同時他又參加了一切執政府的具有決定性意義的會議。儘管有這些事情，他還是被批准回國了。不僅如此，厄爾德利立刻負責主持消費合作總社的領導工作，這是社會民主黨的經費賴以挹注的重要支柱之一。至於魏特納呢，他成了“人民之聲報”的社長、社會民主黨政治局委員和議會議員。

自然，在這種情況下，不可能進行我的案子，否則人人都將認為這件案子不公平了。因為在蘇維埃共和國時期這些人物所擔任的職位都比我高得多，而他們不僅能回國，而且還能在社會民主黨內繼續進行政治活動。根據什麼法律來判我的罪名呢？在這種情況下，沒有別的事好作，只有把我的案子擱到以後再說，檢察處曾接到撤回起訴書的命令，這個起訴書早已完全擬好，並且流傳很廣。

在分析了一九二五年和一九二六年的政治和經濟情況以後，如果看一看最近兩年的歷史，特別是德國和奧地利所發生的事變，資本主義危機及其對匈牙利的影響，我們就可以了解為什麼今天這件案子能成立了。儘管有這樣事實，這期間，除了以前的時期外，還加上一段九年的新時期。我們也了解檢察處在重刑法院或上訴法院為什麼都不願敘述這些理由的原因。並且同時應該認為，就是爲了這些相同的理由，我的案子不僅在匈牙利，而且還在國外引起了一種關切的情緒；如果我們不了解這一切同時並存的情況，我們對於這種關切，就無從得到解釋。

我現在來談談檢察官先生關於馬萊勛爵在英國上議院質詢的聲明。當然，我並不想參加檢察官先生和質詢者所

進行的論戰，儘管檢察官先生對馬萊勛爵一下子同時提出了兩項譴責，這的確是一件違反常例的事實。他首先譴責馬萊勛爵在善意的情況下甘願受到惡意宣傳的欺騙。然而檢察官先生恰恰必須證明的，這宣傳究竟是否是惡意的。其次，他宣稱他深信質詢者連特喇農條約第七十六條都沒有過目。然而馬萊勛爵是工人運動的一個老戰士，我們有理由假定，對閱讀一條他作為根據而提出質詢的條文，他是相當清醒和確切的。我們對於這樣一種方法知道得很清楚。人們要“駁斥”馬克思主義，就利用幾十年來的老辦法，這辦法在於先提出馬克思從未規定過的論綱，然後來“駁斥”馬克思主義。這好比給兔子釘上蹄鐵，然後鞭策兔子，把兔子當作馬一樣。

關於控告的具體方面，我已在重刑法院前作了答辯，那時質詢還沒有發生。當時我已經表示，蘇維埃共和國之所以被解散，首先因為社會民主黨依靠着協約國的諾言、四強會議在巴黎發出的呼籲和依靠來自官方以及非官方的消息，竟成功地勸誘無產階級說，如果他們以和平的方式解散了蘇維埃共和國，就可以獲得民主政治並停止封鎖，而且，協約國是不會寬恕反革命的。社會民主黨利用了這種論據終於戰勝了共產黨的論綱；按照共產黨的論綱，無產階級必須繼續堅持下去。如果無產階級能懷疑到諾言的不能實踐，懷疑到跟着蘇維埃共和國的解散繼之而來的必定是白色恐怖和貧困，它不僅要用武器，甚至還要用牙和手來保衛住共和國咧。

協約國很了解這事實，這就是它為什麼採取半官方的諾言的方式。

談到薩谷和范雪蒂的事件，我看到檢察官利用這事件

來對付我，使我感到十分驚訝。薩谷和范雪蒂事件已為全世界所周知。早在一九二七年，匈牙利司法界的報刊已對這一事件採取了立場，並且有很多法學家寫文章和做報告，表示他們對這一問題的意見。在匈牙利也如此，輿論採取了一致的態度：大家都反對美國法院的司法手續。但從那時起已經過了八個年頭，我不得不對檢察官先生的結論表示異議，並對於薩谷和范雪蒂事件發表幾句話。

庭長：你談得離題太遠了，你終可以談一些別的事情吧。

拉科西：除了把薩谷和范雪蒂事件來支持控訴以外，檢察官先生所引起的其他問題都是需要我這一方面作出答覆的問題。他曾宣佈道，共產主義在任何文明國家內都是遭受迫害的。這未免是一個過分簡單化的推論了：我們知道，只舉幾個例子，在英國、法國和美國，所有共產黨都是合法的組織，在議會和參議院裏都有他們的代表。為什麼把這些國家和那個以極端殘酷的恐怖手段迫害共產主義運動的德國等量齊觀呢？在一個國家所能達到的文明程度和這個國家對待共產黨的方式間，當然存在有一種相互的關係。資本主義國家的文化水平和它對待共產黨人的政策都是同一種因素的產物，這一因素就是資本主義的生產制度。這種關係可以從這事實來說明。在某一國家裏，當資本主義的生產建築在脆弱的基礎上面的時候，迫害就加強起來。結果是：由於資本主義制度經濟基礎的削弱，除非文化水平早就很低，否則文化水平也跟着降低。事實表明，當我們考察在那些國家，那裏，共產黨人自始就受到最嚴酷的迫害，和在那裏，共產黨被看作一個合法組織的時候，我們就可以肯定地說，在文明的程度和迫害之間，是存在着一種看得見的

相互關係的。只須看一下巴爾幹諸國和蘇聯邊界各國的情況吧，這些國家經常在迫害共產黨人，而在文明方面，它們是落後的……

庭長：你不要再用這種口氣繼續談下去了，毫無疑問，你是要說，匈牙利是和巴爾幹國家相等的。請你談其他事情吧。

拉科西：其次，我們被控對文明宣戰。這又是一個可以作長久討論的題目，顯然，保衛全部文明的責任並不在我一人，然而，盡人皆知，文明實際上正處在一個尖銳的危機中。事實上文明正遭受着一個重大危險的威脅，但蘇聯和各國共產黨對這方面是毫不相干的，真正的危險就是戰爭。原來科學已把破壞手段推進到這樣一種完善的程度，以致在另一次世界大戰中，將看到所有西方的文化大家庭、大城市和文化中心，同樣夷為廢墟。

蘇聯和共產主義運動，在某種廣大的程度內，遏制住威脅着文明的嚴重災禍。現在滿可以檢查一下最近十年來的事變，以便正確地估價蘇聯對保衛和平的偉大貢獻。如果這個國家不存在，世界大戰很久以前就該爆發了。共產黨是和平的最可靠的保證。

共產黨人非但不是科學和藝術的敵人，而且是它們的忠實朋友：他們是在盡最大努力來推進科學和藝術，使它們更向前發展。

早在三年之前，馬克西姆·高爾基就預言說，由資本家們準備的戰爭，將毀壞一切經濟制度和全部文化。實際上，資本主義正利用它全部的資源，以準備這次新的和可怖的毀滅工作的浪潮。高基爾曾指出，正是由於準備戰爭和動用每一分可能動用的金錢來準備戰爭，人們剝奪了文化的

所有不可或少的物質資源。結果，資本主義國家的學者和藝術家們將逐漸開始依靠蘇聯送來的獎金維持生活。

蘇聯是在世界上，羣衆的文化水平不斷高漲，科學和藝術受到最崇高的評價，最受到注意、尊重和關懷的唯一國家。

檢察官先生曾大大地強調的另外一個控告，這就是說：我們鼓勵共產黨員們去背叛他們的“祖國”，背叛祖國顯然是應當受到懲罰的。這個由檢察官先生所提出的問題，和階級鬥爭都是同樣的舊問題。當柏拉圖開始研究政治生活的基礎時，他發現在一個城市中的居民有窮人也有富人，其實是兩個國家，而不是一個國家，並且這兩個國家在戰爭。這種城市是不太穩固的，因為富人害怕發生叛亂，不敢武裝窮人，從而也不敢想望戰爭，這正是辯護律師先生所提到的關於馬拉松的故事，軍隊剛獲得勝利就立刻返回，深怕雅典的情勢會發生不利的變化。希臘的歷史提供給我們無數二元政權的範例。今天也是這樣，我們認為，彼此對抗的兩階級，正像兩個國家。

在實踐上，這個階級鬥爭的特點意味着一個階級的利益是和另一個階級的利益直接對抗的。俄國革命把這一點顯露得很清楚，當無產階級的革命取得勝利的時候，俄國的資本家們從這勝利中遭受到一切後果，並且宣佈說，俄國今後不再是他們的祖國了，他們利用一切可能利用的手段來打擊它。當同樣的情況在匈牙利發生了的時候，匈牙利資本家們在祖國問題上採取了同樣的態度。

檢察官責備蘇聯曾於去年宣佈了一種懲治重大叛國行爲的法令。但這條法令是保衛無產階級祖國的正當措施。帝國主義爲了反對它，竟不惜利用間諜和背叛的行爲來準

備新戰爭。資產階級方面却以“重大叛國行爲”的罪名來迫害和指控共產黨人，因爲共產黨人爲了反對新戰爭的危險而鬥爭。這十分露骨地證明了，資產階級已清楚地了解，在一個反蘇的資本主義戰爭或一個資本主義國家彼此互相攻打的戰爭情況下，在各個國家內部，工人羣衆將成爲資產階級的敵人。

（這裏拉科西談到托洛茨基，說他是無產階級革命和蘇維埃祖國的叛徒。）

談到蘇維埃的間諜，我也得對此說幾句話。我不了解蘇維埃關於這問題的法律，但我深知，蘇聯努力取得有關德國和日本所進行的反蘇準備工作的情報。我不懷疑，這情報工作也像蘇聯紅軍和蘇聯的經濟的基礎建築一樣好，但我看不出有任何理由可以用來責難這個國家在擴張這工作。但硬說外國的共產黨人，作爲黨派，或組織，會爲這情報工作而服務，從環境本身而言，這顯然也是不可能的。蘇聯在全世界工人和勞動人民中間博得普遍的同情，從而在某種程度內使它更容易進行這一工作，這也是很自然的。但硬說，共產黨員羣衆或者是各非法共產黨的一小部分人參加這一工作，這是事情性質的本身所不許可的。共產主義運動在軍事方面有着重大的意義這一事實，在完全不同的另一領域內表現出來，並且很自然，這事實是和間諜活動毫不相關的。原來資本主義國家自從有了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經驗，都覺得萬一發生反蘇戰爭，或兩個資本主義國家間的戰爭，它們害怕工人羣衆將起來反對內部的敵人，這也就是說，反對資本家。這就是一切資本主義國家在發動一次世界戰爭或任何一個戰爭問題上採取疑懼態度的主要原因之一。

庭長：你所說的一切可能是很有趣的，但還是請你談談

一九一九年你從拘留所被釋放的事吧。

拉科西：所以我認為檢察官先生所說的一切，既然是爲了使我的情況更趨困難，我就得運用我的權利，對於他所提出來的一切問題，表明我的立場。

庭長：好吧，但是要很簡短。

拉科西：我還想回答一個問題。爲了抹煞我的一切行爲所依據的道德基礎，檢察官先生曾誣指一整套的惡行來歸罪於我。同時他諉稱我曾沉湎於“蘇維埃之家”的放蕩生活。顯然既沒有證據足爲依據，這個控告絕不足以動搖我的活動的道德基礎，尤其是我從來也沒有住在“蘇維埃之家”。在公社以後，我們常因同樣事情受到控告，然而從卷宗所搜集的文件中所表明的以及薩穆埃利的供詞中，我們可以看出，不僅沒有沉湎放蕩的事，並且蘇維埃規則在那裏比在任何地方更受到了很好的尊重。

關於處死六百起人命案的控告，也不可能找到絲毫根據。在控訴人民委員的案子裏，人們把處死的案件作了一張完整的名單：這名單總數五十九件，其中只有二十七件是由革命法庭所提出的判決。

關於指控我逃避和放棄一切，而不效法丹東所作的那樣，對於這一點，我的回答是很簡短的。丹東曾經是資產階級恐怖的司法部長。因此，他不能和法國貴族們一起流亡，因爲這些貴族們要砍他的腦袋。後來，他成了反革命分子，並且和王室發生了關係。這就是爲什麼人們把他處死的原因。他的命運幾乎和俄國革命所留給托洛茨基的命運相似，這兩個人都陷於兩頭落空的境地。丹東用一句漂亮話來掩飾他那種無法支持的情況；然而，事實是法國貴族也流亡了，“流亡”這名詞就具有今天所指的意義。一八四九

年，很多貴族離開祖國，一九一九年，所有匈牙利貴族都流亡國外。可是我們從沒有絞死過一個貴族。相反地，我却在一九二五年作為革命者，從國外移居回來了。

現在我來談一談重刑法院判決書的各段，對於這些段落，我要做一些補充。

首先談起義的事。重刑法院的判決書是這樣寫的，我不知道頁數，因為判決書對我並沒有什麼意義：

“共產黨人用武力突然間奪得國家政權，而沒有遭遇到有效的抵抗……”

庭長：請把這些告訴我們。

拉科西：這就是判決的理由。我可以用一整套的事實來駁斥這種斷言。這裏有兩本書，我要向你朗讀幾段。第一本的名稱是：“匈牙利的布爾什維主義”。它是由古斯達夫·格拉茲同儒勒·安德拉西、山多爾·馬特列克維茨、亞爾培·貝切維齊和儒勒·弗拉雪克合作出版的；軍事部分是布萊特將軍的手筆。

摩多芬尼推事：這本書現在我們手中，由我們來宣讀吧。

拉科西：第二本書是貝拉·凱蘭門的。書名是“關於塞格德反革命的材料”。

根據判決書，我們是用武力取得政權的，從而把政權讓給我們的說法是胡說。為了支持這種論斷，判決書妄稱卡羅利政府曾向我們提供大力的援助以便取得政權。這種論斷在公審時曾起了十分重大的作用。為了支持這論斷，曾提出下面五個事實：（一）卡羅利政府曾宣佈解散匈牙利全國武裝部隊同盟；（二）這同一政府對於巴爾塔的解職，曾向羣衆的壓力讓步；（三）費斯台提希的解職也是在這種情況



下同時發生的；（四）卡羅利任命鮑姆就是把政權讓給社會民主黨人；（五）他寬恕了保格尼的暴行。以上這五件事實湊合的結果就把政權交給了我們。

如果自一開始卡羅利政府就給我們以援助，那末我們爲什麼要訴諸武力呢？這正是我立刻要證明的反面事實才是正確的。卡羅利政府和社會民主黨分子直到最後還是與我們爲敵的，只有當他們明白了他們沒有其他出路的時候，他們才自動地把政權交給了我們。注意，在這裏重點不要放在“自動”上，而是放在他們把政權交給了我們的事實上，因此，我們就不必去奪取政權了。

我很快要結束匈牙利全國武裝部隊同盟的問題，我要宣讀布萊特中將論到匈牙利全國武裝部隊同盟的作用這一段。他的書在第二一五頁上說道：

“自革命爆發時起，匈牙利軍官團就想集合在他們創立的匈牙利全國武裝部隊同盟之中；然而，自首次會議起，——於十一月十五日舉行——只聽到些假裝悲傷，充滿着自私自利思想，和要求飯碗的演說。沒有任何人提出關於祖國和軍隊前途的偉大事業的具體計劃。只有幾位發言人僅約略提到這個問題。因此，結果却等於零。繼而，在那裏，所謂“土耳其式的詛咒”，即不團結的現象，都出現了。這種加強運動統一的企圖爲時是甚短的。不僅如此，這種企圖反而替匈牙利全國武裝部隊同盟很快地掘下墳墓……”

關於這點，布萊特中將比我知道得更清楚，並且他不會被人懷疑爲了討好共產黨人而企圖粉飾真相。這證明，匈牙利全國武裝部隊同盟的作用遠非人們在公審庭上所欲吹噓的那麼重要。作爲一個共產黨員，我只能肯定這一事實，

因為我們從沒有想到要打擊這一組織。並且匈牙利全國武裝部隊同盟的主席儒勒·罕貝什，早在蘇維埃共和國成立以前，就逃往維也納去了。如果他認為這一組織有成功的機會，他一定是不會這樣做的。

我現在談巴爾塔解職的問題。自然，階級鬥爭在軍隊裏也同樣有影響。巴爾塔是反對士兵蘇維埃、反對軍人羣衆的，他努力的出發點是爲了建立一種反革命的武裝力量。所謂突擊連、雅齊克師和固曼納師……

庭長：這些我們都已了解。

拉科西：他想組織這些隊伍。保格尼在阻撓這些計劃上絲毫沒有作爲。維爾摩斯·鮑姆，巴爾塔的副部長之一，是社會民主黨人。他從沒有反對過這些組織。反抗這一方案的是共產黨的士兵羣衆。這些羣衆吭聲高呼並把他們所反對的各點提交由保格尼爲主席的士兵蘇維埃和鮑姆。等候了十天沒有結果，他們就在軍政部面前舉行示威，並且要求反革命的軍政部長辭職。他們憤怒的原因，不僅在於他們竭力堅持建立軍官的合法組織；他們也曾發現，有人從國庫裏挪用了三千萬匈幣，去交給保安師團、斯姆雷薩尼以及其他的人等。這就是共產黨所提出的把他解職的合法基礎。沒有人可以斥責這示威運動，事實上，這運動就是對於那種爲了反革命目的而浪費三千萬款項的抗議行動。

事實上，社會民主黨一直在觀望，保格尼也沒有參加示威遊行。但當示威的人們要求巴爾塔辭職的時候，他才要求說話，並聲明以士兵蘇維埃的名義擁護那些組織示威的士兵們的全部要求。這不是一個領袖的話而是由於他無法控制羣衆才不得不響應羣衆的一種個人的話。事實真相就是這樣，保格尼和士兵蘇維埃沒有站在運動的領導地位，

而是爲了保全他們的勢力才響應了運動。

這也就是社會民主黨的一般策略。一九一九年三月二十一日，當無產階級已經站在前哨的時候，它就“一步一趨地”趕上去，準備將來阻撓無產階級的前進。如果判決書妄自斷定我們爲了實現我們的目標而利用由士兵蘇維埃以強力所制服了的軍隊，那末，這種論斷在這些事實面前就不攻自破了。這本是士兵的革命羣衆，它強迫社會民主黨領導的士兵蘇維埃去採取這樣的行動綱領，如果不經過強迫，這行動綱領就早被社會民主黨所拋棄了。

至於卡羅利政府，根據卷宗所彙集的文件看來，它諉稱很早以前就不信任巴爾塔了，因爲他曾以過分笨拙而且粗魯的方式處理所謂“紀律”的問題，並且因爲他採取充耳不聞的放任態度。可是當卡羅利看到士兵羣衆要發動起來的時候，他就站在無論如何不向羣衆讓步的意見方面；他還想保持巴爾塔的職位。但當這些羣衆武裝了起來，他也就不得不讓步了。正是在這點上表現出了由厄爾諾·巴洛奇所引起的一幕歷史性的戲劇。當卡羅利、巴洛奇和洛瓦齊舉行了秘密會議，並且同意了委託後者擔任前往協約國的使命，以便要求武力援助來遏制他們所謂的“紅色高潮”。在這種情況下，卡羅利所表示的態度却嚴格地符合於一位十足大地主方面所可能表示的態度。

卡羅利的這種企圖失敗了。洛瓦齊和法國外交部長畢助取得了聯系。然而他並未能獲得一種援助。巴洛奇認爲卡羅利是由於這失敗而辭職的。“事實是這樣，法國人看到一位部長竟在總理的同意下，負責前來要求用武力來佔領他的本國而大爲震驚”。這樣的事情無論在奧地利或德國都還沒有見到過。後來法國人經過這次接洽以後，才派遣軍

隊到塞格德和其他地方，甚至到布達佩斯，連北非的土耳其式騎兵部隊也在上述各地出現了。我已經在上面說過，無論在柏林或維也納，都沒有見過這樣的事情。我們對於這些措施立刻作出解釋：這是資本主義用來對付工人運動的一種手法。在這些事變中，卡羅利和社會民主黨人都沒有起了判決書所賦給他們的作用，這是事實。

軍政部長費斯台提希的辭職也可以說是在相同的情況下發生的。這是一位沒有常識的貴族，他繼續泰然地進行組織反革命。他的副部長鮑姆也以沉着冷靜的態度來支援他。這種行爲被囚徒們稱爲“暗中望風”。由於共產黨人的警告，工人和士兵羣衆才發現費斯台提希所作所爲和巴爾塔一樣。於是運動再度開始，先向士兵蘇維埃提出警告，繼向鮑姆提出警告，但毫無結果。於是又來一次武裝示威，費斯台提希又因此而讓步。在這裏，保格尼也沒有起重要的作用。共產黨曾供給他一切緊急的情報，然而，他沒有把這些情報提到士兵蘇維埃的公開會議上，而要求全國蘇維埃成立一個秘密委員會。就在這個委員會上，他公開了這些材料，使委員會了解，費斯台提希的地位以後無法維持下去了。但是在這裏，他仍然避免公開，並避免向革命的工人階級發出號召。這就是費斯台提希垮台的經過。

現在讓我們檢查一下鮑姆在他任軍政部長時所起的作用吧。判決書和格拉茲的著作二者都認爲把軍政部長的職務交付給鮑姆，意味着把軍隊“背信棄義地交給”社會民主黨人，並且從這裏，只須再向前進一步，就把軍隊交給共產黨人了。但是，鮑姆的行動方式恰好證明相反。一九一九年一月八日，布達佩斯工人蘇維埃整夜地進行了社會民主黨人是否應當奪取政權的討論。鮑姆和蘇維埃的大部分人

主張奪取政權，關於他們的目標，我要宣讀鮑姆在此時機所發表的演說的三句話，這就是：

“現在，主要的目的不是實現社會主義的綱領，而是要針對布爾什維克問題、針對布爾什維克的宣傳，來一個根本的解決辦法；布爾什維克的宣傳佔了社會民主黨的上風，並且以政變的方式表現出來……只有一個社會民主黨政府才具備完成此任務的條件，因為工人們和士兵們在幾小時內，掃除了正擬採取堅強態度來對付共產黨人的資產階級政府……”

所以鮑姆之接受軍政部長的職務不是爲了進行反對資本主義的鬥爭，而恰恰相反，是爲了進行反對布爾什維主義的鬥爭。他之所以這樣做，因爲一個資產階級政府已沒有足夠條件來進行這個鬥爭，更因爲，按照他的意思，對共產黨的熱愛在工人和士兵們的心坎中是如此地根深蒂固，以致任何政府如觸犯共產黨人就要被工人和士兵們所推翻。總之，鮑姆的論據所證明的東西恰恰和判決書的結論相反。

然而，從其他觀點上看，鮑姆的軍政部也具有重要的意義。它證明，資產階級承認曾在反對無產階級的鬥爭中打了兩次敗仗。它也證明，資產階級已經懂得在挽救資產階級的命運方面，社會民主黨人所具作用的重要性，並且委託他們組織反革命的任務。自鮑姆被任部長以來，他就想徹底改組軍隊，照預計到的那樣使它成爲一支由職業士兵組成的社會黨軍隊。這種改編，有人在公審中把它認爲是社會黨的進步成就。布萊特中將的意見也是如此：他認爲尤其是爲了實現這計劃，在駐紮布達佩斯的軍隊裏清除了農民分子這一點更說明了這意見的正確性。爲了說明這一措施，

布萊特妄稱鮑姆了解到這些農民分子是不願意服從共產主義的。然而布萊特在他的著作第二二〇頁上肯定說，社會民主黨軍隊的建立是根據軍政部担任高級職務的專家們的提議的，這樣他就自相矛盾起來。這等於說，建立一支社會民主黨軍隊的思想不是由鮑姆擬定的，而是在鮑姆、保格尼和其他社會民主黨領導人下，由軍政部高級官員們所安排的。人們把這些人與工人和士兵羣衆混淆起來，並且假定，在社會民主黨的行列裏，可能找到成萬個像鮑姆和保格尼一樣的人，都是擁護資產階級的分。那末，既然相信農民士兵有着與共產主義不相容的“特性”，那就是相信一件虛構的事情了。鮑姆之所以從軍隊裏清除農民士兵，恰恰因為他們已經受到了共產黨人的影響。他只要收容沒有被共產主義思想所灌輸的士兵。如果我們追憶一下當時的事件，我們就可以看到，正是在貧農子弟們所服役的外省駐軍中，他們參加共產黨最快。對這問題的解釋是很簡單的：這些貧農子弟們對於我們分配土地的政策已有了深刻的印象。這就是爲什麼他們擁護共產黨的理由。

然而，當工會軍隊開始成立的時候，大家很快就發現，這些兵士們也一樣是傾向於共產主義並且在那裏也無法破壞共產黨人的影響的。共產主義運動在軍隊裏廣泛地展開了。鮑姆和保格尼立刻擁護反革命，並且開始打算依靠保安師團了。這個師團原是弗里特利克和巴爾塔的作品，他們曾使該師團脫離布達佩斯士兵蘇維埃的管轄，正像他們所說，以便阻止共產主義的宣傳不致侵蝕這個師團。直到那時，社會民主黨人對待這個師團，還是採取相當不信任的態度，因爲他們知道，一旦反革命爆發，保安師團對社會民主黨人和共產黨人之間決不會有什麼差別的。

根據巴爾那·蒲柴的意見，巴爾塔也宣佈說，如果斯姆雷薩尼的反革命企圖成功了，他們自己也要被視為革命分子了。

然而，當共產主義運動在布達佩斯駐軍中得到了不可抵抗的發展時，他們自己也開始轉向保安師團了。巴爾那·蒲柴談到社會民主黨人曾在這師團的士兵面前發表了長篇的政治演說。蒲柴引述了保格尼演講的一段話說：“誰是社會黨人，誰同時也是匈牙利人”。因此，他走到士兵中間，不是為了爭取保安師團去為無產階級事業而鬥爭，而是為了給保安師團士兵的思想灌輸“社會主義的理想”，惟恐他們與共產黨人混合起來。

證人高洛斯瓦利特別着重指出這樣的事實：用於這師團的三千萬款項是在三月份內，由此可見，這是鮑姆經手支付這筆款項的。顯然，這種措施也不再能挽救它。這措施却證明，判決書上的論斷是毫無根據的；依照這種論斷，在公社前，卡羅利或社會民主黨人曾給我們以大力的支援。

這裏不在於討論資產階級是否自動地放棄了政權。要解決的問題是：資產階級有沒有放棄政權，還是我們不得不用武力強迫它放棄政權，歷史上充滿着這些例子。我認為，既然資產階級已經知道抵抗已沒有用，我們就沒有訴諸武力的必要，所以它就把政權讓給了我們。

照我的意見，重點不應當放在“自動地”這字上這一點是何等正確啊。這是在奪取政權的前夕，力量對比形勢所得出的結論，任何具體的事實都不能比它作出更好的說明了。一九一九年三月二十一日上午社會民主黨的領導者們開會討論要做的事情。在會議過程中，表現出三種傾向，第一種傾向主張和資產階級組織共同內閣；第二種傾向主張

和共產黨人合作並和他們組織共同政府。第三種傾向——是極右派的傾向，這是一件突出的事實——主張把政權讓與共產黨人，同時要社會黨人不參加政府。以下就是加拉米對於這一論點的說明：

“社會民主黨已失掉控制羣衆的力量：它已經戰敗，現在它只有讓位的一途了。”

辯論一直延長到午後一點鐘。結果，他們決定派一個代表團到拘留所去商討如何採取措施。這聲明本身已經足夠證明，極右派的領導者們對整個工人階級都支持共產黨一點是很了解的。兵工蘇維埃在午後就熱烈地和共產黨人站在了一起的這一事實也表明，他們是看得多麼清楚啊。

由此可見，工人羣衆已站到共產黨人這方面來。顯然，這還不足以進行革命，儘管羣衆的決定性多數在決定性的地點和決定性的時間和共產黨聯合一起是社會主義革命的決定性條件。那末，在匈牙利，具有決定性的地點就是布達佩斯。而農村無產階級的支持也同樣是不可少的。

至於農村無產階級和小農的意見，再不能像工人蘇維埃從投票的結果表現出來的那樣明確、肯定了。然而如果我們仔細看一下幾天以前所發生的事變，我們可以斷定，三月十七日在卡波斯瓦爾，兩萬名武裝的農民會要求分配土地。時時刻刻，我們接到的消息說，自貝列格省直到沙拉省，農民們到處佔領地主的土地。這種壯舉比任何投票表決更好地證明，農業無產階級是擁護共產黨的論綱的。

我們現在來檢查一下資產階級的力量吧。巴爾那·蒲樂巴很好地說明了這種力量的特點，他說，在這些日子裏，卡羅利政府的資產階級部長們的權力能使人服從的程度，只足以命令他們的司機駕駛他們的汽車前進吧了。他們的



權力只限於此。根據在公審中看到的末次部長會議記錄的證明，所有資產階級部長都一致指出，政權絕對地屬於工人們，並且惟有工人是賴，我認爲這種情況本身就構成一頭等重要的事實。還有其他事實，例如激進黨，在熾熱的政治鬥爭中，在煩悶的氣氛裏，像洋臘一樣地溶解了，並且在蘇維埃共和國成立前不多幾天宣佈解散了。同時以貝特蘭爲首的極右派分子，正如同我們在凱蘭門和罕貝什書中所讀到的一樣，開始大批流亡國外。

爲了結束我的話，我要唸一下拉賓諾維契的供詞，人們在這裏沒有讀過它，却描繪了同樣的圖景。根據拉賓諾維契的說法，保格尼在下午曾發表過聲明，判決書在下面一段文字中三個不同地方曾反覆重申如下：

“……約瑟夫·保格尼由好幾位社會民主黨人陪伴着來到了，並且在和共產黨領袖們會談之後，提議立刻宣佈戒嚴法，並且爲了防止右派採取政變的企圖，士兵蘇維埃的武裝組織要佔領公共場所。”

在一九二〇年舉行的公審所發表的記錄第六四七頁上說——這裏也是拉賓諾維契所說的話：

“約瑟夫·保格尼於三月二十一日下午命令佔領公共場所。至少他曾對我們說，公共場所要在下午的時間內佔領。他宣佈說他不怕右派方面會進行政變。”

因而他的聲明是和判決書所載的論斷截然相反的；而保格尼說出了真話。我們都知道不怕來自右派的任何政變。

判決書企圖使人相信有一些突擊部隊是忠實於資產階級的，並且其中就包括有警察。多麼奇特的一幕戲劇呀！在這齣戲劇裏，警察廳長狄茨和巡官羅斯波曾對這問題發生

了爭論，終於承認警察在任何地方都沒有抵抗。想於事後把警察渲染成爲積極抵抗的角色的這種企圖使我想起，一九一九年三月二十二日我們也曾試圖採取這同樣的方法；實際上，我們藉口警察在夜間會積極抵抗以反對我們而打算解散它。但我們未能提出絲毫證據，於是社會民主黨人就斷定警察所持的態度是忠實的，從而就阻止解散它。

在形式方面，我還有一點要說。貝靈蓋政府已經辭職，資產階級部長們離開了政府。卡羅利成爲資產階級政權的唯一代理人；他代表着資產階級的合法繼承。另一種力量就是社會民主黨人。既然這兩種力量同意把政權讓給共產黨，這件事本身在形式方面就足以說明了。爲了證明它的真實程度，我要宣讀卡羅利、貝特蘭和孔恩等三人的三段簡短的話。

大家都記得，一九一九年三月二十一日，卡羅利曾發表一篇聲明，後來又刊載於一九一九年三月二十二日的“紅色報”上。這一期現存於卷宗所搜集的文件中。聲明的標題是：“告匈牙利人民”。我引用它最後的一句話：“我辭職了，並且我把政權交給了匈牙利各族人民的無產階級的手中。”

在凱蘭門所著書的第四二五頁上，貝特蘭敘述了三月二十一日這一天他所看到的一切。我引用它的最後一段：

“……資產階級黨派的領導者們晚上集合在阿拉達·齊奇公爵的家中，以便在那裏會晤卡羅利。各黨派的領袖們確會到了他家裏，但是，他們白白地等着，卡羅利送給他們一封信，說是從此沒有理由會晤了，並且爲時已晚，因爲他早已把政權讓給了無產階級。”

由此可見，他已把政權讓出了。

至於孔恩的一篇文章，我引用他的結束語。在重刑法院前，檢察官會要求宣讀這篇文章，因為檢察官對於我在這問題上所說的一切企圖表示堅決的否認。這就是爲什麼我要把這篇文章的結束語唸出來：

“這就是匈牙利無產階級沒有經過武裝起義而奪得政權，並創立了匈牙利蘇維埃聯邦共和國的事實的原因和結果。”

沒有武裝起義，是的；但並不是沒有武裝和軍隊組織。這不是在送禮的情況下，而是在壓力下，資產階級才把政權交給了無產階級，資產階級是在不能爲保持政權而鬥爭的時候才放棄政權的。

支持我的論斷的證言沒有再比我適才所引用的三段文字更真實的了。所有這三段話都證明了資產階級已放棄了政權，而我們則沒有經過武裝起義而奪取了政權。

我並須指出，如果奪取政權必須以武裝鬥爭爲代價，我們還是要奪取政權的。這正是根據預告三月二十三日有一個強大的示威運動，這示威運動將使我們從拘留所中被釋放出來。總之，我們已經決定在必要時要用武力奪取政權，這並不意味着共產黨不要進行武裝鬥爭，而只是在當時情況下在匈牙利沒有必要來發動武裝起義。

我現在來談談保安師團吧。判決書提起了這問題，重刑法院還把這問題看作是一個加重犯罪的情節。

庭長：現在不管這問題吧。

拉科西：這問題是人所周知的。大概是這樣，控訴硬說正當保安師團“保衛着領土完整”的時候，有人從保安師團的“背後撲上去”。這一指控沒有在一九二〇年的訴訟案中發生，這一次檢察官先生也沒有以這點來控告我。然而，一

些引證……

庭長：這沒有成爲判決的目標，還是回到控告主體各點吧。

拉科西：我同意不再談它。然而我還是要指出，在重刑法院前，我早以爲這問題已經搞得很清楚，誰知道它仍列在判決書中。

我現在來談下面的控訴、即對“謀殺”的控訴吧。至於紅色恐怖的問題，我已經加以說明，而且這說明是很正式的：一九一九年六月十三日，我曾在社會黨大會上發言，並且我對這問題還提出我的看法。<sup>①</sup>我仍然完全維持當時我會說過的一切。我覺得不需要在其中補充些什麼或取消些什麼。這同樣可以說，今天我表示的意見和我在這演說中所表示的意見仍然完全相同，而檢察官先生却要把這事實作

- 
- ① “第二個問題是專政的方法的問題。匈牙利無產階級專政的方法不能與直到現在所採用的方法有所不同。我們盡全力使專政不致陷於殘暴。現在已經發生的情況都是絕對不可避免的：十分簡單，這就是資產階級挑釁的反擊。

“我們記住：在階級鬥爭的戰綫之間，不可能有中立地帶。如果在某一點上，我們把我們階級鬥爭的戰綫往後轉移，得勝的資產階級就要沿着我們的脚步而追趕上來。如果在這一點或那一點上，我們自動地從我們的戰綫上撤退，這或者是承認我們的軟弱，或者是承認我們對不移地達到我們的目標不是十分堅定的。這樣做也就是把武器奉送給資產階級，而讓它利用這些武器來更加兇暴地打擊我們……

“我提醒同志們，爲了使我們換得資產階級的客氣我們曾釋放了人質；這種客氣的表現爲時只有一星期，而其表現的形式則是鐵路工人罷工。用讓步來進行階級鬥爭是不可能的”（拉科西在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工人黨全國代表大會上的講話，見一九一九年六月十四日“紅色報”）。

爲控訴主體的一點。

由於這些意見，我相信已經清楚地表示了我的看法。至於判決書上所得出的意見，我要做一些說明。實際上照判決書的想法，因反革命活動而被槍斃的人，都是完全無罪的。那末，爲了弄清楚這些死刑，從政治的角度來考察，特別是從對外政策的角度來考察這問題是有必要的。否則就不可能了解爲什麼這些人拿起武器，和爲什麼他們被槍斃。我願意對這些死刑的政治方面說幾句話，尤其是我研究了卷宗所收集的文件，我發現很多標誌顯示出這些死刑是與國際形勢有着密切的關係的。在審問證人的過程中有人曾經敘述了當時整個外交團的活動。這些外國外交官們竟也參加了反革命活動的準備工作。在重刑法院前我曾對這問題提供了詳細的說明，我認爲我可以不再在這裏重複了。在這些企圖中有一個最重要的企圖就是六月二十三日和二十四日兩天在布達佩斯發生的事件，這就是多瑙河和蒂薩河之間的地區所爆發的反革命行動。這一企圖的準備工作是精細的，並且非常周密。在策略的觀點上，形勢對它們同樣是有利的，因爲我們的部隊既然全部集中在捷克前綫，我們在後方就非常空虛。雖然如此，反革命企圖仍在一兩小時內就失敗了。失敗不能解釋爲由於準備不足，而事實是由於城市產業工人和農村貧農沒有支持他們的勾當。總之，他們是缺乏羣衆的。然而當反革命行動的失敗變得明顯的時候，外國外交官們採取了與國際慣例和外交活動規則完全相反的步驟：主要的外交使節，意大利、英國、法國和美國的代表們竟交給我們一個要求把反革命分子當作戰俘來處理的共同照會。

這種“戰俘”的命名是違反慣例的，因爲反革命分子絕

大多數是曾對紅軍宣誓過的軍官和軍官學校學生。然而從外國外交官的觀點來看，這一步驟是既正確而又合理的。判決書中把反革命活動說成是愛國運動，其目的在保衛憲法……然而外國外交官們無視匈牙利人的民族情感和匈牙利國家的憲法，這一點也是真實的。在他們方面，他們所要達到的目的是完全不同的。後來，當這些國家把特喇農條約強加於匈牙利的時候，我們就得到這一方面的證明了。

總之，在這班外交官的眼裏，反革命是根本與民族問題無關的。他們把反革命分子當作捷克、塞爾維亞和羅馬尼亞等佔領軍的輔助部隊。在這種觀點上，當他們要求以戰俘的權利來對待反革命分子的時候，他們是不乏理由的。

在此同一照會中，同樣也牽涉到人道待遇的問題，然而，這完全是一句空話。實際上，當白色恐怖來到的時候，就沒有人道的問題了。事實上，在白色恐怖下，數以千計的革命工農遭到拷打和殺害。

庭長：不要談這些。

拉科西：在這方面，我只有一點要說明。在公審的過程中，我雖多次想要問一問那些反革命分子，在當時他們是否估計到，總之由於他們的活動他們終於便利了敵人對我國的佔領，毫無例外，所有這些人——其中包括道爾曼迪將軍——的回答是否定的，而肯定他們沒有估計到這些。但無論怎樣，到處存在着蛛絲馬跡，足夠說明他們對這點是完全估計到的。因此，我引古斯達夫·格拉茲的話，他在書中宣稱，準備這些行動的人對於行動的後果都有了很好的預見。在書的三〇一頁上，他說：

“應當行動。一種進攻蒂薩河的念頭在人的思想中自然地產生着；雖然這一種念頭具有另外一種形式，但

這正是斯特隆費爾德所傳給我們的遺產。最高指揮部十分明瞭，以這樣一支沒有精神價值並且裝備惡劣的軍隊是不可能執行這樣的戰鬥的：跨過蒂薩河、接着攻擊羅馬尼亞如此完整的生力軍。這一任務就是對一支在精神上、數量上、技術上都比它更優越的軍隊而言也是極端困難的。既然毫無成功的希望，那末，要知道是否應該發動這支軍隊去攻擊蒂薩河，坐使匈牙利的領土和人民遭受偶然事變不可估計的厄運，這是一個從良心上解決問題的實例。必須在上帝和人們的面前，對於即要到來的事變、對於無數士兵的生命負起責任，這些士兵終究是匈牙利人，並且要在這一準備不足、執行不完善和在軍事上沒有絲毫成功機會的攻擊過程中丟掉他們的性命。要對這一挑釁，這一對羅馬尼亞、間接對協約國的攻擊所引起的一切後果負責。接受這些後果並對這些後果負責不是輕鬆愉快的事。這等於投向黑暗中的一跳，但人人都估計到這一跳必然要發生……這就是人人所抱的情感，並且大家在同一精神下，朝着對他們要求的方向盡了他們的義務……這是七月二十日早晨，攻擊的第一砲聲響了的時候大本營的心理狀態……”

我現在來談叛國的控訴問題。對這問題，我沒有多的話要說，我保持我在公審時所作的聲明，並且我要補充說明，在當時匈牙利所舉行的種種選舉，可拿來作個比較。最近我研究了塞格德選舉的結果：我認為這些結果具有重大的意義，因為，一九一九年四月十四日，在法國佔領時期和在一萬六千支法國步槍刺刀的陰影籠罩下，我們也同樣舉行了選舉。我們對選舉沒有施行任何壓力就得到了四萬一

千三百張選票。但在最近選舉中，塞格德城的居民已增多了兩萬人，政府只須獲得一萬五千張票就足夠確保所有候選人，而參加選舉的共總還不到兩萬五千人。這清楚地表明，現行憲法是建基於剝奪半數以上居民的選舉權的。我明確地宣佈，蘇維埃的民主是比資本主義國家的民主要廣泛得多、真誠得多的，並且蘇維埃的民主才是唯一的和真正的民主……

庭長：不要談這些，這在這裏沒有任何關係。

拉科西：其次，控訴第二點指出，我們的憲法和選舉是以我們支配下的武力的不可抗的權力為基礎，使一切反對的可能性都被擯除了。應當以極端慎重的態度來利用這說法，特別是在選舉的時期；那時可能發生——實際上已在昂特羅特發生了——一槍發出並殺死很多選民的事。這件事可讓每人想一想，依靠武力的不可抗的權力的是我們的政權呢，還是現政權？

我堅信，憲法的第二部分，即承認羅塞尼亞和德國居民的自治權是符合於正義的。我只想指出，這樣的論據：即使某一修正案足使我們對於如果沒有修正案就企圖脫離本國的居民保持下來，也不准觸犯憲法的論據，我要說，這一論據在一九一八年革命的前夕曾起了非常可悲的作用。記得在那時期，民族問題已提到日程上來。狄薩曾被派到薩拉也沃，去和塞爾維亞人開始談判。當時狄薩聲稱，南斯拉夫國家的成立是與國家的根本法相違背的。我之所以用“憲法”一詞代替“國家根本法”，是因為我得到了判決書的真正原文。結果怎樣呢？憲法依然如故，而國家却喪失了國土的四分之三。

在這種情況下，我們的民族政策可以說是再明顯不過



了。我們曾宣佈，蘇維埃共和國決不支持壓迫少數民族的傾向。我們還補充說，如果塞爾維亞人和羅馬尼亞人認為他們在塞爾維亞和羅馬尼亞國家的範圍內生活得更好，我們將不用武力來強留他們。對於羅塞尼亞、斯洛伐克和德國各少數民族，我們的政策是一視同仁的。可是有區別：塞爾維亞人可以合併於塞爾維亞人，羅馬尼亞人可以合併於羅馬尼亞人，但羅塞尼亞人和德國人却不能這樣做。因此我們要向他們提供優厚的待遇並讓這些居民在匈牙利蘇維埃聯邦共和國的範圍內保持他們的民族。如果他們還是拒絕這建議，蘇維埃共和國將不訴諸武力強迫他們繼續為匈牙利公民。在這種情況下，給予羅塞尼亞人和德國人以自治權是正確的。並且卡羅利政府也曾試用這方法，然而這些少數民族明白拒絕一切協議。實際上，它們看到，巴提安尼和洛瓦齊參加了政府。原來它們認識到這些人的沙文主義並且怕這政府不會實踐它的諾言。

在結束時，我要提出這方面的不大重要的事實，而檢察處却把這些事實列入控訴。起訴書說到人民委員們所以組織一支軍隊是爲了保護他們自己的生命和個人安全。一般說來，任何國家在革命中保護領導人物藉以抵抗任何外來的襲擊，這是很自然的。同樣在資產階級制度下，人們也保護領導人物以資對付謀殺和其他一切罪惡企圖。值得指出，在反革命時期，人們如何誇大了這些預防措施。據凱蘭門的書中說，貝特蘭每夜睡在不同的住宅，以致連反革命分子們自己也很難找到他。至於罕貝什呢，他不願意留在維也納，因爲他怕用麻醉劑謀殺他。

在蘇維埃共和國時期，這樣的預防措施是不可能實現的。況且這樣的預防措施也沒有存在的理由。實際上，蘇維

埃制度本身的性質要求領導人物要永久與羣衆保持聯系。在這種情況下，是不可能給予他們一種武裝保護的，所有的領導人物每週有好幾次參加羣衆大會。

庭長：你離開了本題。

拉科西：關於我自己，我僅想指出，我經常在前綫，在那裏，保護個人安全的問題是更複雜了。並且最後，一九二五年，我回到了匈牙利，如果我對我個人的安全如此重視的話，我也就不該回到匈牙利了。

判決書三次反覆提到另一控訴，就是指控我們曾利用我們從國外取得的款項來進行我們的運動。我一次也沒有否認過它：我不知道爲什麼我要隱瞞這個事實。我也曾指出，在國際工人運動中，這是很自然的事。在戰前，德國社會民主黨曾供給俄國社會民主黨和法國社會黨一項財政上的援助：這種舉動被認爲是國際團結的標誌。當俄國共產黨同意給予德國共產黨一種物質援助的時候，這同一社會民主黨却宣佈，莫斯科收買了德國共產黨人。匈牙利也有同樣情況：在公社以前，匈牙利社會民主黨曾指責我們被俄國人所收買。我們的答覆很簡單，如下：爲了援助匈牙利無產階級，我們曾接受過俄國無產階級的黨的金錢。相反地，匈牙利社會民主黨曾接受了匈牙利無產階級的金錢，但它却利用這些金錢來保衛資產階級。

自從階級鬥爭具備了革命的面貌以來，資產階級的國際關係本身也暴露得很明顯。在蘇維埃共和國的時期，當匈牙利資產階級向一切外國方面告借金錢的時候，就有這樣的情況。資產階級曾向法朗歇·台斯貝萊、洛希爾、和平會議的四強委員會以及其他等等請求借貸。

庭長：不要再談這些，這已經够了。

拉科西：還有關於搗毀“人民之聲報”報館的控訴，曾經在判決書的好幾個地方提到過。我必須聲明，事實上，“人民之聲報”報館已在一九一九年被搗毀了，但這事件發生在公社之後。這一著名的、本身成問題的所謂“一九一九年二月二十日的搗毀”，其實並不是搗毀。沒有一片玻璃窗被打碎，並且“人民之聲報”也沒有遭受到分文的損失。至於事實本身，我要朗誦派爾·凱利在公審時的供詞。它載在記錄第一千二百四十五頁上……

庭長：我們有它的原文。

拉科西：原文並沒有記錄在上面；這是很值得討論的一個問題。全文如下：

“共產黨人遭受到的拷刑以及其他事情引起了工人們對他們的同情，原來在事後調查的過程中，就有人發現，在攻打‘人民之聲報’報館時發出的槍彈不是共產黨人所放射的，而是由不守紀律的民兵所放射的。”

在結束的時候，我願對我的論斷的準確性說兩句話。判決書認為，我談到武裝暴動的時候沒有說出真相。根據上面所舉的許多事實，我拒絕這種說法。還有一次，一位證人想公開駁倒我的論斷之一，就是關於蘇維埃共和國毫無阻礙地奪取政權的供詞；關於這一插話，我曾描述出檢察官瓦利的作用。當時我曾受到禁止，因為有人以為我所談的是與訴訟案毫無關係的第三者。繼而瓦利却以證人的身份出現，問題又重新提出。瓦利會宣稱，我所說到的事實是違反真相的，這個事實是在公社以後被國外共產黨集團所捏造出來的，而我正是從這裏得到情報。並且進一步爲了提供關於這點的證明，瓦利還宣稱，我的論斷連一次也沒有被共產黨人證實過，他們在我的供詞以後曾幾次出庭，並且在

這個所謂插曲中他們都曾經在場。我曾參考了一九二五年的公審記錄。我特別復閱了檢察官曾要求朗誦的四份供詞，這個要求曾被王家重刑法院所拒絕。

庭長：既然禁止朗誦，你就不要談它了。

拉科西：但是，現在，這是一個事實。以下是揚錫克——他在釋放共產黨人時曾在場——在公審記錄第五百八十九頁第二段第八行及以下幾行所說的話：

“可能是八點半的時候，瓦利來了並且發表了一篇演說，他指出，有這樣一種情況，我們所有的人都要和工人站在一起……”

庭長：我禁止你繼續唸它。

拉科西：那末，我只限於指出，在這供詞的旁邊，人們可以讀到用鉛筆寫的註解如下：“無恥的謊話！瓦利。”

在結束的時候，我願意回答檢察官先生，他曾說共產主義不能歸入政治思想的範疇中，並且說我是共產國際的代理人。幾個月以前，檢察官先生曾在一本匈牙利雜誌上發表了一篇論匈牙利共產主義運動的發展的文章。

庭長：我禁止你牽涉個別人人物。

拉科西：那末這是否等於說：禁止我回答關於共產主義不是一種政治思想的見解呢？

庭長：是的。結束你的演說吧。你已享受了一次充分廣泛的辯護，並且你也同樣發表了你自己的辯護詞。

拉科西：那末，我以兩句話來結束。完全像在重刑法院面前一樣，在這裏也如此，我不想爲我自己辯護，因爲所有我在一九一九年宣佈的原則，我現在還是堅持不變。

庭長：你始終堅持這些原則。好吧。

拉科西：我將結束……

庭長：不要像在重刑法院前一樣！

拉科西：……但還是像一九二六年在王家上訴法院面前所說的：我是，並且繼續是共產主義者。我以豁達的心情面對未來：無論怎樣，未來是屬於我們的。

庭長：我停止你發言，我們要進行討論了。

一九三五年七月二日“真理報”。

一九三五年七月十一日“新聞報”。

“拉科西案在上訴法院”，維多利亞出版社，第四一——六二頁。

## 蘇聯使拉科西獲得了自由

蘇爾坦·華斯

### 我重新晤見拉科西

在這長時期內，我從沒有得到關於拉科西的消息。我所獲得的片段消息是：在八年半的監禁以後，霍爾第反動政權又向他提起了控訴。他之所以被控，因為他曾是匈牙利無產階級專政的主要領導人之一。拉科西驕傲地宣佈了和匈牙利勞動人民的革命團結，並且在被囚了九年之後，他以全部的精力竟能做到這樣：在公審庭上，真正坐在被告席上的依舊是霍爾第政權。

匈牙利反動的法庭會判處拉科西以無期徒刑。所以，正像我自己所遭受到的和我在日記中所描寫的那樣，他是被判終身受苦受難的。

在這期間，生命的輪盤會不止一次地轉動着。年復一年，光陰緩慢地繼續着。然而我以無限的信心等待着，我知道必然會到來的一天。

我知道——並且我的信心從沒有削弱過，匈牙利工人粉碎我的鎖鏈的時刻，一定會來到的。

我的期待並沒有失望。

一九二五年九月二十二日開始了我的牢獄生活。

一九四〇年十月三十日，我的牢房門打開了。我是在二十二歲少年時期入獄的，出獄的時候，我已是三十七歲，

正是有着美好的前途的成年人了。

我首先到了蘇聯駐布達佩斯公使館。偵探們監視着我，我的心臟跳動得要破碎了。

我走着，步步都使我滿懷愉快。但同時，痛苦仍抓住我的心：我還以為，最親密的戰友、弟兄，匈牙利共產黨的領袖拉科西依舊被判無期徒刑，要永遠被囚在塞格德牢獄中受罪。

在蘇聯公使館的面前，一輛汽車停在那裏。當我們從這輛汽車旁走過的時候，有人在呼喚我……這分明是他的聲音……我看到這位“被處無期徒刑的”拉科西坐在蘇聯領事的身邊，受到蘇維埃國家的庇護。

當一九二五年以及後來一九三四年的時候，法西斯分子們在世界輿論壓力下，不敢判拉科西死刑，於是霍爾第對那班耍拉科西腦袋的人們說，無期徒刑也就是死刑，聊以對他們自己解嘲。並且霍爾第還說：“只要霍爾第活着，拉科西就休想走出監牢。”

儘管這樣，拉科西現在已坐在蘇維埃公使館的汽車裏了。

幾秒鐘過去了，我也坐在了這汽車內。

是一場夢吧！

夢在繼續着：我們踏上行程，當我們看到蘇維埃領土的時候，邊防軍以紅旗如林的隊伍來迎接我們。

以前，拉科西和我，我們曾在蘇聯有過相當長的勾留時間；從那時以後，事物變得這樣，一切對我都好像是新的。

當我們在獄中的時候，蘇聯人民已經實現了人類長久的夢想：社會主義。

我們於一九四〇年十一月六日到達莫斯科……

蘇聯共產黨（布爾什維克）和蘇聯政府的代表們、同志們和朋友們在等待着我們。

第二天，十一月七日，偉大的十月社會主義革命二十三周年紀念節，從聳立在紅場上的觀禮台高處，拉科西和我，我們得以參觀了紅軍的雄壯的閱兵式，和蘇聯勞動人民、莫斯科歡度佳節的人民的遊行行列。

這正像在一場夢境中！然而，當數以百計的飛機，機身漆着五角紅星，作出轟轟聲的時候，這不可能不使我領悟到我的確是置身於現實之中。在我面前，這是勝利的新生活的遊行行列，這是勝利的社會主義的遊行行列。我在多年遭受法西斯奴役之後，看到在列寧墓旁，全世界各國勞動人民的偉大導師和領袖斯大林，由他的忠實的戰友們環繞在他的周圍，並且受到蘇聯人民的歡呼。

蘇爾坦·華斯：“獄中十六年”，第二四三——二四四頁。



## 拉科西恢復了自由

愛爾諾·芮洛

馬加斯·拉科西在十五年多的囚禁生活後，又恢復了自由，並於十一月六日到達了莫斯科。全世界勞動人民以歡欣愉快的心情慶賀這個消息。他是被蘇聯政府解放的。和他同時到達蘇聯的，是另外一位資本主義監獄中的囚徒蘇爾坦·華斯。在十五年的時期內，華斯和拉科西一起，在牢獄生活中共着一切痛苦和患難。

拉科西是匈牙利工人運動中最卓越的人物之一，他的名字不僅在匈牙利爲人所熟稔；他的聲譽越過了匈牙利的國境，傳播到最遙遠的國家。在最近十五年的過程中，勞動羣衆曾爲了釋放他而不懈地鬥爭。當他的生命處在千鈞一髮的時候，他們的行動會不止一次地拯救了他。

他的名字已成爲共產黨人在思想戰綫上進行戰鬥的、勇敢的和充滿自我犧牲精神的鬥爭的象徵；他在匈牙利法庭面前所表現的這種態度，是英勇的布爾什維克的一個典範。

拉科西於一八九二年三月九日誕生在阿達——匈牙利南部的一個鄉村中。自他幼年的時候起，他就認識了貧困和災難。在初級小學畢業後，他進了塞格德中學，塞格德城就是他後來在那裏度過十年漫長歲月的牢獄生活的地方。他的卓越的才能很早就在各種學科的學習中表現了出來；

他對化學、數學和歷史特別用功。他是一個出色的學生，同時他是以教書來維持生活的。在中學畢業之後，他考取了布達佩斯東方學院。

從他在塞格德中學讀書的時候起，他就熱心於工人運動。他曾閱讀了“共產黨宣言”，並參加了多次工人們的示威遊行。在布達佩斯，年輕的拉科西已經是社會民主黨黨員。他同時參加了學生運動，並擔任了伽利略俱樂部秘書的職務。伽利略俱樂部替匈牙利共產主義運動準備了不少鬥士，如伊姆爾·薩萊，他也是這個俱樂部的會員，因共產主義的活動於一九三二年被槍殺。拉科西曾在德國和英國僑居兩年。他參加了這兩國的工人運動，並不懈地研究了馬克思主義科學。

在世界大戰的初期，拉科西被徵入伍；在短時期的軍事訓練後，他就被派送到前綫。成了俄國人的俘虜，被送到赤塔戰俘營。在俄國二月革命後，從赤塔轉解到道里亞。在那裏他達到了十月社會主義革命，道里亞為白衛軍所佔據，但拉科西成功地逃走了。他以極大的困難為代價，到達了蘇聯的領土彼得格勒。一九一八年春天，他回到了匈牙利。

他立刻積極地參加革命運動。他與齊美爾瓦爾德左派取得了聯系，向社會民主黨的背叛政策作鬥爭，並且在士兵中組織反戰的宣傳。一九一八年十一月的日子裏，他是匈牙利共產黨的創立人之一。在黨內，他的活動是很廣泛而多樣性的。他在各省城（塞格德、米什科爾茨等等）中成立了黨的組織。他是黨裏最受歡迎的鼓動家之一，他並且寫文章。當情勢需要有精幹堅決的共產黨人，需要有勇敢的組織者和受人歡迎的良好演說家的時候，他總是在場。資產階級把他投入牢獄，但匈牙利蘇維埃共和國使他恢復了

自由。

在蘇維埃共和國政府內，拉科西曾擔任貿易人民委員會和運輸人民委員會副委員長的職務，後來擔任社會生產人民委員會委員長。他是人民委員中最年輕的一個，那時他才二十七歲。當拉科西擔任工業企業社會化的供應組織的工作時，他表現了卓越的組織才幹。他不但改組了國家的經濟生活，並且他積極參加了組織國防以反抗國外敵人的攻擊。在危急的時刻，他不止一次地挽救了當時的局勢。蘇維埃匈牙利的唯一煤田薩爾哥達仁的英雄保衛戰是與他的名字分不開的。拉科西按照真正布爾什維克的方法組織了薩爾哥達仁的保衛，爲了保衛煤田，他組織起了成千的礦工隊伍。他組織了工人團，戰勝了社會民主黨的政客們的破壞工作，制止了軍官團裏叛徒們的蠢動，並保證了全國煤炭的供應：沒有煤，所有工業都是要癱瘓的。

蘇維埃政府失敗後，拉科西逃往奧地利，在那裏，社會民主黨政府把他軟禁起來。一九二〇年，他成功地離開了奧地利，到了蘇聯；在蘇聯，在共產國際第二次大會上，他是對匈牙利蘇維埃共和國時期共產黨人的活動作出了詳盡的分析和自我批評的第一個匈牙利共產黨員。

在共產國際第二次大會後，拉科西參加了歐洲許多國家的工人運動。他爲工人羣衆擺脫社會民主黨的影響而鬥爭。他積極參加了組織共產黨員先鋒隊的工作。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科學武裝了的、說着一口流利的西歐各國語言的拉科西，對於各國工人運動的特點，具備着最大便利的適應天才。他在許多國家裏支持共產黨人反對機會主義的鬥爭，並且幫助他們掌握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和斯大林的革命教訓。他爲了在匈牙利保衛工人階級和工人們的事業，

並且也爲了組織共產黨，不顧威脅着他的死刑於一九二五年回到匈牙利。他以所有的力量從事於秘密活動。但是警察當局藉助於一個挑釁分子而找到了他的綫索。他和華斯同時被捕。拉科西被解到特別法庭。在這時期，法庭受到命令只能有兩種判決：不是死刑，就是釋放。法令並且指明，刑罰要在兩小時後執行。爲此而召集來的劊子手已經伺立於重刑法院中。絞刑架早就安排好了。

但是，拉科西、華斯以及其他共產黨人並沒有被嚇倒。他們不怕絞刑架。他們保衛的不是自己的生命，而是無產階級、人民的事業。拉科西在法庭前昂首陳詞，心中滿懷着不可動搖的共產黨員的信心。他的態度，他的堅定和他對理想的忠貞這一次至少暫時地解除了階級敵人的武裝。這時期的“日報”曾這樣寫道：

“我們應當公開承認，我們這些根深蒂固的資產階級，在拉科西和他的共同被告人面前，感到有些慚愧。這些被死亡危脅着的人，他們明知道沒有被寬恕的希望，然而他們並不力圖縮小他們所作的一切。他們什麼也不否認，並且對他們的所有行動負責。因此，我們不可能再卑視他們了。我們看到共產黨人在他們隊伍中，竟然有這班狂熱的信徒，在他們眼裏，思想的價值重於生命，我們感到慚愧。資產階級的理想却沒有狂熱的信徒啊！”

拉科西以及他的共同被告人的態度，深深地感動了匈牙利以及其他國家的勞動人民。各地的廣大羣衆提出抗議，反對把拉科西和他的同志們在特別法庭前受控。特別法庭不得不讓步：它下了一道裁定，根據這個裁定的規定，拉科西和他一起的共同被告人的審判案就移轉到普通法

庭了。

重刑法院的審訊在一九二六年七月舉行了。在那裏，拉科西和他初審時一樣地表現了英勇的氣概。他和他的共同被告人必須在被告席上，爲了保衛共產主義的思想和革命先鋒隊的政策而作出激烈的鬥爭。在審訊過程中，拉科西曾多次受到紀律的制裁。他不止一次地被關進黑牢，這就使他失去了準備辯護的可能。然而什麼東西也不能摧毀他的革命者的氣魄，他的布爾什維克的意志和他的比鋼鐵還堅強的毅力。儘管遭受黑牢的折磨，他依舊保持着慣常的笑容和他的爽快的幽默感。即使最難以忍受的痛苦，也不能使他離開真正布爾什維克所走的正確道路。

這一次，法庭判他八年半的監禁。他以鎮靜的態度並保持着共產黨人堅信最後勝利必歸於工人階級的信心，來接受判決。這一次在法庭中他高聲地宣佈了這個信心。以拉科西爲首的被判罪的人，在重刑法院的法庭上，爲了社會主義的勝利，就這樣舉行了示威。

一九三五年一月，拉科西第三次被解於法庭前。那時，他已經服滿了八年半的刑期。但法庭以一整套其他控告的“罪名”，強加在他的身上，硬說這些“罪名”是他在蘇維埃共和國時期，也就是十四年以前所犯過的。爲了對付這些控訴，拉科西在庭上聲明道：

“我同意蘇維埃政府的這些法令和布告，我對我以工農政府的名義所做過的一切負責。”

在全部冗長的公審期間，這個聲明始終成爲拉科西辯論的指導原則。這一次和從前各次審判完全一樣，他不爲自己辯護，他以工人階級和全體勞動人民的事業的辯護人自任。儘管拉科西被控爲四十四次“謀殺案”的兇犯，法庭

却不敢判他死刑！法庭把拉科西判了無期徒刑。

拉科西不僅在重刑法院上進行鬥爭，他在監獄中，在黑牢中度過漫長而困難的年月裏，一直繼續這種鬥爭。他會不止一次實行絕食，這是最痛苦的鬥爭形式之一。

並且，在十五年長期艱苦的囚禁以後，拉科西的身心仍然是如此年青、活潑、有力、滿懷着生活的愉快，這是匈牙利以及其他國家的千萬共產黨人所熟知的。

拉科西忍受了各種各樣的苦難，他承擔了一切考驗。因為他是和工人階級以及人民結合在一起的，因為他是由偉大的共產主義思想所鼓舞着的。即使在最艱苦的情況下，他也了解保衛工人們的事業，因為他是以馬克思列寧主義做他的不移的指針的，在地球六分之一的土地上，馬克思列寧主義早已贏得了社會主義的勝利。

“新聲”雜誌，一九四〇年十二月號，第三——七頁。

封面  
书名  
目录  
正文